

**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第五冊**

(上)

Collection of the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purge of the Rightists
within the Party

Volume 5

(A)

**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出 版 說 明

这本小册子里，选編了八十七件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党籍的决定和決議，仅供县委以上党委和有关党员幹部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集团头子范明 的党籍和军籍的决议（摘要）	（ 1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白云峯的 党籍的决议（摘要）	（ 11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梁枫党籍 的决议	（ 17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曾爽党籍 的决议	（ 21 ）
中共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 派分子张文澄党籍的决议	（ 24 ）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显仪党籍的决定	（ 30 ）
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陈孟汀党籍的决定	（ 33 ）
中共重庆市财政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戎 占芳党籍的决定	（ 38 ）
中共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 铁民党籍的决议	（ 40 ）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叶石党籍的决定	（ 43 ）
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文炳的党籍	（ 47 ）
共青团四川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贺惠君的 处理意见	（ 49 ）
中共云南省委财贸大口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处理党内 极右分子李文煥的意见	（ 54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加林的党籍	（ 55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梁家的党籍	(58)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全明的党籍	(62)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黄平的党籍	(65)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姜必 德的党籍	(68)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董学隆的党籍	(71)
中共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白晶五 的组织结论	(72)
山东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 反党集团的报告	(79)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村的党籍	(83)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篤生 党籍的决定	(92)
山东省交通厅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西的结 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95)
中共山东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右派分子刘健飞的定案 报告	(99)
山东省文化局、文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 馮毅之的处理报告	(106)
山东省统计局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将王梦玉定为右派 分子的报告	(112)
山东省劳动局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和坏分子 侯林翼处理意见的报告	(118)
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 花經燕的錯誤事实定案报告	(125)
中共大众日报社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方 正党籍的决定	(133)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右派分子王路宾主要錯誤事实的 报告	(136)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毅党籍 的决定.....	(144)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丛林党 籍的决定.....	(150)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成傑 党籍的决定.....	(152)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段德甫 党籍的决定.....	(156)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苗丰羽 党籍的决定.....	(157)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斌党 籍的决定.....	(169)
中共菏泽地委会(扩大)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扈国 华、杜湘、王鲁克、褚連捷党籍的決議.....	(163)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对于右派分子戴岳的处分 决定.....	(168)
中共安徽师范学院委员会对于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处 分决定.....	(171)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微党 籍的决定.....	(178)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程明远 党籍的决定.....	(180)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汪制均 党籍的决定.....	(182)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江誠党 籍的决定.....	(183)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鹤 党籍的决定.....	(185)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笠党	

籍的决定.....	(187)
中共蚌埠地方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永錫党籍 的决定.....	(189)
中共蚌埠市委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罗霞光的处分决定.....	(191)
中共蚌埠市委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王荣华的处分决定.....	(199)
中共蚌埠市委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杜宏本的处分决定.....	(207)
中共合肥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兆甲 党籍的决定.....	(213)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右派分子夏际霞的結論意見.....	(215)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薛尚突党籍 的决定.....	(218)
中共上海市妇联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先 党籍的决定.....	(220)
中共上海市財政局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如言 党籍的决定.....	(223)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楊延修的处理結論.....	(225)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李中的党籍.....	(227)
中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 子苗力沉党籍的决定.....	(229)
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涛党 籍的决定.....	(231)
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中的党籍.....	(234)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王若望的处理結論.....	(236)
中共福建省委全体會議决定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 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	(237)
中共江苏省交通厅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 鎮党籍的决定.....	(240)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二十五支部关于右派分 子楊成亮的政治結論.....	(243)

中共浙江省委監察委員會關於開除極右分子顧耕初 黨籍的決定·····	(246)
中共浙江省商業廳機關委員會關於開除右派分子黎 立堅黨籍的決議·····	(249)
中共浙江省輕工業廳黨組關於右派分子張光反動言 行的報告·····	(252)
中共浙江省農業廳黨組關於右派分子張俊升反動言 行的報告·····	(254)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普通班二十支部關於右派分子劉 德焜的政治結論·····	(259)
中共浙江大學第二次黨員大會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李 成浩黨籍的決議·····	(263)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員會人事局支部委員會關於開除 右派分子同中玉黨籍的決定·····	(269)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員會人事局支部委員會關於開除 右派分子李繼勝黨籍的決定·····	(272)
中共洛陽地委關於開除右派分子亓和勤黨籍的決 定·····	(276)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委員會關於開除右派分子石天行 的黨籍的決定·····	(278)
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關於右派分子金凱的處理結論·····	(282)
中共中央民族學院分院委員會關於開除右派分子張 文藻黨籍的決定·····	(285)
中共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關於右派分子鄧鈞洪的處 理結論·····	(292)
中共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關於右派分子蘇辛濤的處 理結論·····	(294)
中共廣西僮族自治區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 於開除右派分子徐江萍黨籍的決定·····	(297)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阮力定案与处理决定.....	(298)
广东省水产厅整風领导小组关于極右分子蓬荆的处理結論.....	(300)
广州市文教局整風领导小组关于極右分子李鷹航的处理結論.....	(302)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古念良的党籍.....	(305)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吳英民的处理結論.....	(310)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张玉华的处理結論.....	(313)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爰农的党籍.....	(316)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庄明瑞的党籍.....	(319)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會議关于开除 反党集团头子范明的党籍和軍籍的決議 (摘要)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范明，四十四岁，陝西临潼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大学肄业，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在伪三 八軍入党。

范明自任西藏工委副書記以来，对中央規定的关于西藏工作的全部重大方針、政策，都另搞一套，和中央 工委对立起来。为了实现其野心，在党内、外培植私人势力，进行派别活动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

几年来范明一贯地进行反党活动，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六至月間，利用委托他主持工委工作的机会，篡夺了工委的领导，“独霸工委，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制造所谓改革形势，提出改革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西藏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大发展”。但是实质上范明的所谓改革是投降主义的，是用这种改革为他的反党活动创造政治资本，以实现其反党野心家的目的。在这一期間，不論在党的工作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虽然几年来中央不断地对范明进行了教育（如一九五四藏工作討論會議，“九四”指示，一九五七年三月政治局會議，等等），工委也经常地对范明进行了帮助、教育和斗争，即使在一九五六年在实行他的“大发展”的五个月內，党的許多組織和党员也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对范明进行了抵抗和斗争。但范明始終

堅持其反黨立場毫無悔過之心；繼續用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態度，更猖狂地進行反黨活動，並且把他對黨的滿腔仇恨和他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的政治、組織觀點，寫成一個徹頭徹尾反黨的“新西遊記”小說提綱。范明反黨陰謀活動的全面大暴露，就是從揭發“新西遊記”小說提綱開始的。

經過幹部會議一百多天的揭露和查証，大量的事實證明，范明八年來的反黨活動是多方面的、始終一貫的，其反黨罪惡的主要事實如下：

一、反對目前黨在西藏的反帝愛國統一戰綫方針。他反對中央以反帝愛國作為劃分上層人士左、中、右政治態度的標準，說這是“主觀主義的、片面的、沒有根基的”；並提出所謂“愛國、團結、進步”的標準，和中央相對抗。

二、范明一貫地反對黨在西藏的財經方針。一九五一年他堅決反對經過西南局批准的“統一物資、統一採購、統一供應”的方針。當時工委負責同志為了照顧團結，遷就范明的意見，同意在統一政策之下，另外成立一個採購分處，負責獨支人員所需日用品的採購工作。儘管如此，范明還是另搞一套，破壞了上述的統一方針。在物資上把中央撥給工委的財產當成私有財產，遲遲不交給工委的財政機關；在採購上抬高物價，搶購物資，反對中央當時對藏鈔採取“不理、不問”的方針，公開支持藏鈔；在供應上另搞一套供應標準。主張發展西藏的資本主義，用“我們出錢出力，他們（指貴族、上層——註）得名得利”的辦法，“無形中發展了資本主義，削弱了封建社會基礎”。一九五六年利用他主持工委工作的機會，把財政方針由供給財政轉為建設財政。

“要全黨各業各行都要學會花錢”，“錢花不完要打屁股”。破壞統一採購的原則，准許各單位自行採購內貨、外貨，並且准許以領代報。由於“大發展”和因為“大發展”而來的“大收縮”，給國家造成了一億元以上的巨大浪費。

三、在青年工作的指導上發展青年主義、民族主義，培植與

支持团工委成为反党的“独立王国”。他提出与党的反帝爱国相对立的“民族青年统一战线方针”，强调“西藏青年负荷量很大……由于西藏落后，没有自己的工人阶级，西藏青年担负着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作用”。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向中央团校的藏族学员大谈革命不能输出，“革命这件事是不能输出的”，依靠“革命自己内部的力量，才能去完成……好象中国革命成功，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起来革命”。诬蔑我党我军解放西藏藏族人民是输出革命。支持与袒护团工委以团代党，拒绝各部门与政机关的检查，使团工委成为横行霸道，人人侧目的“独立国”。

四、在对敌斗争上反对中央公安部的指示，诬蔑中央公安部是“取消主义”。

五、在西藏干部的教育方针上，他强调干部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雏形”，要他们用两面手法搞阶级教育，用发动与组织学员诉苦等办法，来破坏当时统一战线的方针。

六、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把西藏日报变成他的反党工具。宣传他的反党的政治观点，如：西藏进入了改革的新阶段；改革形势的形成；“政教昌隆”；批评工委是“保守主义”，等等。夸大个人作用，提倡对他的个人崇拜。如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报纸在刊出范明关于大力培养藏族干部、发展藏族党员的报告时，地位显著，全文都用老五号楷体，接着很多消息都提到“学习了范明同志的报告，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西藏佛协分会成立的报导中说：“范明同志的讲话，一次又一次的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讲话结束时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这篇报导是范明审查过的）。利用报纸，打击好人，包庇坏人。如打击周川萍和周所领导的拉萨建筑工程处，包庇开汽车轧死人的罪犯赵洪蒙，压制群众对团工委严重挥霍浪费现象的揭发与批评，等等。

七、“大发展”。一九五六年利用委托他主持工委工作的

机会，假借改革之名，为他的反党活动创造政治资本，以实现其政治野心家的目的。他用歪曲中央指示和工委决定的手法，利用干部的革命热情，在西藏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大发展”。说西藏“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进行和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新阶段”，“西藏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和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呼声。西藏统治阶级已经在表面上不能也不敢不拥护、赞成，甚至连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不赞成”。强调他的所谓改革要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宣传、统战、组织、公安、青年、妇女、财经等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把仅供中央参考，未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地区五年工作规划作为他增设机构、增加人员、进行大发展的行动计划。

为了乞求上层同意他的所谓改革，他的赎买政策是：不问政治情况，“无一遗漏”地予以安排，大量送钱，不管收获；只强调安排、照顾、封官、送钱，不强调教育、改造。他的宗教政策是：“发展宗教”，“政教昌隆”，“共产党永远不会反对宗教的，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反对人民，所以是永远不会反对宗教的”；“喇嘛是西藏的知识分子，是将来干部的源泉”；成立喇嘛班是“宗教上的大革命”；在改革前先将喇嘛养起来，“衣食住行包下来，就是充分的政治”。说“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是在“英明的领袖”“达赖喇嘛……的直接领导下”；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是“和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和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的本民族干部”。利用他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副主任的机会，开了十七次常务会，通过决议四十七项，这些决议主要是进行他的所谓民主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实际上把自治区筹委会变成了推行他反对党的现行政策的反党活动的合法工具。

八、他一直反对中央的方针。一九五七年三月，范明为了给自己的“大发展”进行辩护，在三月二十二日给中央並主席的信中，公开地猖狂地反党反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之后，在中央严

格规定的编制方案和工委其他同志的监督下，一方面他不得不被迫地参与执行“减户、减口”的工作；另一方面却不仅保留他原有的全部的反党观点，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继续进行其反党活动。如私自在对内对外的会议上宣传改革准备工作，规定政协的六大任务，提出西藏右派的五条标准，等等。

九、他誣蔑黨，企圖改變黨的性質。他培養藏族幹部的路線是：“不要在階級成份上打圈子”，“除個別外，一律不准查政治、查歷史……只要沒有現行活動，一概不追究”。“西藏所有的官員、貴族及其子弟，商人及其子弟，廣大的農牧民，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幹部來源”。

他強調藏族幹部“本身帶着天然的馬列主義”，強調發展黨員不能“忽視了在中上層、貴族中吸收培養”，說上層的作用大，“他們都富有社會經驗”，在群眾中有威信，可以吸收入黨。方針是：“全黨全軍人人動手”，“改變這種手工業生產的方式而採取機器生產的方式”，“大膽地、大量地、正確地……發展藏族黨員”。為此還誣蔑“工委本身存在着嚴重的保守主義，大民族主義和宗派主義”。說“自己當兒媳罵婆婆虐待兒媳，自己當婆婆也虐待兒媳”。

他把工委的負責幹部分成三類，只有他和白云峯等是忠心耿耿為黨工作的，其他同志都是吃閑飯的，並且反動地叫囂“應該清黨”。

十、他反对中央对西藏所有的重大方针政策，诬蔑中央和中央的负责同志。中央对西藏采取和平统一的方针，范明就主张分治。对中央各部一些不符合他的意见的指示，采取干脆打回去的办法。如一九五六年中央公安部不同意工委社会部全部并入筹委公安处，和经中央同意的中央监委对赵洪蒙案件的决定等。

他誣蔑中央对高崗的处理有宗派。他說：“高崗可以将功折罪”。說“孙作宾定为右派是与高崗問題有关的”。在他看来到处都有宗派。

十一、他一貫地破坏工委的統一領導，污蔑和丑化工委的負責同志，企圖篡奪工委的領導權。不滿意現在几个書記名字的排列次序，曾經質問“張（經武）、張（國華）、譚（冠三）、范（明）”這樣的排列次序是誰規定的。他說：“經武是主席辦公廳主任，是中央代表兼書記”，經常不在西藏；“國華是司令員兼書記”；“冠三是政委兼書記，又分工主管軍區工作”；把仁山看成是平級中的下級，而且到西藏不久；只有他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他為了達到“當西藏的家”的目的，用一切捏造、誣蔑的辦法激烈地反對國華同志。一九五六年六至十月，他利用經武、國華離藏，中央委托他主持西藏工作的機會，“獨霸工委、上抗中央、下壓群眾”，利用工委組織實現他反黨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的政治、組織路線。他對中央的電話、電報指示和當時在京的經武、國華同志所提的意見，一概置之不理，他對分工工委和工委部門對他的作法進行的抵抗和鬥爭，都給以壓制和打擊。

范明一貫地破坏工委的統一領導，他避開工委用做報告、參加會議、私自召集會議和個別談話等方式，私自按他自己的一套去傳達、布置，有時用造成事實的辦法把他已經講過的講話記錄交給書記處處理，強迫簽字。儘管這個記錄已經他審閱過、修改過，仍然要照樣寫上：“本文未經本人審閱，如有錯誤由記錄負責。”

十二、包庇壞人，包庇反革命，打擊好人。原西北西藏工委的組成人員是極端複雜的，除從西北地區黨、政、軍系統一〇四個單位抽調和在西安招收來的一部分人員之外，當時在一野政治部聯絡部做客的、在共和公司工作的偽軍政人員（未經審查）也基本上全部隨軍來藏。僅據這次會議中查對，當時隨范明進藏的舊人員和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即達一百一十三人之多。其中：偽校以上軍官三十，偽尉以上軍官四十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十一，偽政府官員二，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分子二十八。這些人員

表我”。他把和他有关的或者过去曾經有关的人、单位、地区都划在圈里；反之，就划在圈外。圈里的亲近、重用；圈外的排斥、打击，实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他不仅在西藏划圈，而且还把宗派圈划到中央負責同志的头上。

为了实现他的反党野心，范明把党的某些組織和部門看成是他的据点。当作他的据点的有工委組織部（整編前）、团工委，看成他的据点的有青藏公路管理局、日喀則分工委。同时还在某些机关安置亲信作为耳目，收集“情报”。为了在实现其反党路綫时减少阻力，还以白云峰为核心，拉攏陈竞波（工委委員，統战部长）、夏仲远（工委委員、財委書記），組成了他的組織、統战、財經的“三关口”。据点不容許別人插手，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否則就是別人“鬧宗派”，他上書邓小平总書記，大声疾呼：“現在西藏党内……鬧宗派和不團結的傾向又开始大大地滋长”的主要原因，就是白云峰当不成組織部长，梁枫当团工委副書記还有人反对。他把党看成股分公司，李林初是大革命后的脱党分子（范的老师），一九四八年八月重新入党，进藏后由于范明的坚持提为工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梁枫入藏前是兰州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一下提为团西藏工委的副書記。

范明为了扩大宗派势力，採用各种办法，如周末聚餐会、請客吃飯、逛林卡、打麻将和提倡生活問題可以随便些，“男女都可以有情人”，和女同志拉拉扯扯等庸俗手段，来联络感情，引人上勾。只要听话，相信范明，拥护范明，他可以封官許願。一九五六年他对白云峰、陈竞波、夏仲远說：“你們現在虽然还不是工委委員，但要起工委委員的作用，你們的工委委員問題，不久就可以解决。”玩弄手法把曾突提为工委办公厅副主任。暗示刘士元可以升为統战部副部长，准备提拔付生做統战部副部长或外事处副处长、或分工委副書記。他关怀他的宗派成員，为他們爭名、爭利。給白云峰爭工委委員，要他身兼掌握西藏交通命脈——青藏公路，和培养西藏革命幹部——西藏公学的“两大任

务”，“进可攻——反党，退可守——独立王国”（白云峰語），待机“二返长安”。給梁枫爭团中央委員（一九五四年），爭团工委书记，还想讓她代替白云峰当组织部副部长，当西藏团校校长。

十四、写出了徹頭徹尾的反黨綱領——“新西遊記”小說提綱。這個提綱系統地集中地表現了他的反黨面目。在“丙、解放後的西藏”的全部六十條材料中，有五十條是歪曲、捏造的。他一開始就“打算把這個作品作為楊雄的太玄法言……壓根兒沒有想掩蓋沖突，掩蓋矛盾，避開權貴，”實現他“死以前把人罵完”的誓言，準備這個作品象太玄法言一樣，在他死後的若干年才被人刊印、流傳。為了寫這部小說形成了以范明為首的有吳健禮、黃琳、李宗清參加的所謂“四君子協定”，提出了“保密”，“不當逃兵”的要求。這裡應該指出：李宗清同志在抄寫提綱時，發現其中有問題，並且在幹部會議開始後就勇敢地予以揭發，是正確的，是應該表揚的。約四萬字的“新西遊記”小說提綱，是個徹頭徹尾的反黨綱領，反對黨的民族平等、團結、合作政策。組織上丑化黨，丑化黨的領導，丑化黨的幹部，美化自己，美化自己的親信，美化自己的姘頭。范明為了寫他的反黨的“新西遊記”小說，未經工委領導同志任何人的許可，利用職權私自調走工委辦公廳、統戰部、研究室和軍區的絕密、機密文件、資料三百份，將其中二百五十一份帶到西安交給工委西安辦事處的一個舊人員保管。

面責成已與黃×斷絕戀愛關係的×××進行檢討，黃×結婚後，還繼續與她通姦。此外，還企圖強姦某女幹部，因被拒絕，就說該女幹部有政治問題，予以陷害。

上述事實說明：范明的反黨活動不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一貫的，他是有目的、有綱領、有組織的反黨集團的頭子，徹頭徹尾反黨、分裂黨的極右分子。

范明所以墮落成為資產階級政治野心家、反黨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有他長期的歷史和思想根源的。他生於沒落的地主家庭，從很早起就具有強烈的沒落地主資產階級的个人主義思想。參加革命後，雖然黨對他不斷地進行了批評、教育和鬥爭，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其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和認真批判與改造其資產階級个人主義的丑惡思想。因此，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他的个人權力欲望和政治野心日益增長起來。把成績記在自己賬上，錯誤與挫折推到黨和其他同志的頭上。夸大個人的作用，吹噓個人的成績，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他為了實現其政治野心，必然和一些黨性不純、臭味相投、有个人野心的分子結合起來，進行派別活動，破壞與分裂黨的團結與統一，成為反黨集團頭頭，走上了反黨反人民的罪惡道路。范明的政治野心家的面貌的完全暴露，絕不是偶然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條道路展開尖銳鬥爭的形勢下的必然發展結果。

整個會議過程，范明的態度始終是極端惡劣的。在大量的事實面前，狡辯、抵賴，抗拒交代。經過一百〇四天大會、小會的揭發，逐條查證和批判之後；還在最後的交代中說：“我的反黨事實雖然鐵證如山，但思想動機上沒有反黨的影子”。

根據范明上述罪惡事實，工委決定：開除范明的黨籍和軍籍；建議撤銷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等一切職務；收回國家和人民所給予他的勳章、獎狀等一切榮譽品。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會議关于开除 党分 云峰的党籍的決議（摘要）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白云峰，四十三岁，陕西韩城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二年入党。工委委员；历任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党委书记，团西藏工委书记，自治区筹委财政处处长。现任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书记和西藏公学副校长、党委书记。

白云峰是范明反党集团的“次帅”和“军师”。其主要反党罪恶事实如下：

一、从一九五二年范明反对中央对西藏的和平统一的方针，主张采取“先分治而后统一”的方针开始，六年来白云峰的政治观点、路线和范明反党的政治观点、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他把范明作为他取得各种地位的“靠山”，对范明的私话奉如圣旨，对中央、工委的重要指示长期地一贯地采取抵抗态度。他反对中央以反帝、爱国作为划分上层人士左、中、右的政治态度的标准，他和范明一样也主张不提反帝而以爱国、团结、进步作为划分政治态度的标准，他说：“团结，主要指与汉族的团结；进步，主要是赞成改革，否则就谈不上进步。有这两条才是真正的爱国”。他诬蔑党的统战政策，攻击谩骂我们在西藏几年来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他积极提供意见，协助范明写出反党反中央的“关于目前西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中几个策略问题”，并建议范不要用个人名义，要用统战部名义提交工委。一九五六年范明搞

“大發展”時，白為范出謀策劃，提出“必須由過去的供給財政轉為建設財政”，“反對保守思想，必須把預算花出去”，“過去的編制受財政限制，今後編制不受財政限制”，“過去編制為財政服務，現在為工作需要（指“大發展”）服務”。在幹部來源上，提出在藏工作的幹部，可以介紹其子弟（包括其親朋故舊）來藏參加工作；在發展藏族黨員上，提出預備黨員可以作介紹人，提出發展黨員的“速成法”和“黨外培養的時間短，黨內培養的時間長”等辦法（即馬馬虎虎吸收進來再培養——注）；在團的工作上發展青年主義，培養與支持團工委成為“獨立王國”；在中央批准在藏族青年中建團以前，他和范明、梁楓合謀發展“團友”，並說“不讓發展團，我發展團友”；在“大發展”時，只要團工委提出來，要啥給啥。為了保證團的系統能夠隨便花錢，在工作需要的借口下，還叫團工委、財政處聯署頒發了一個破壞財政制度的關於團的系統經費開支的單行規定。

一九五六年他在北京了解了中央“九四”指示的精神之後，仍向參加八大會議的四川負責同志提出：要在四川“招收一些學生”，同時未經任何請示，告訴派到福建、廣東的招生組，把招的學生送到西安。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在“工委忙於收縮”工作時，他私自批准了實質上是反對收縮、繼續進行“大發展”的團工委一九五七年的工作計劃。在實行中央的“六年不改，適當收縮”方針之後，他對中央決定的政策極為不滿，當他受工委委託在後方辦事處主任會議上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時，他批評經武同志根據中央指示對西藏局勢所作的發言，傳達了范明的歪曲、捏造的西藏情況介紹。（工委有決定，范明所談的情況不准下達）並對他的親信說：“范書記在這次會上，講了很多政治情況，講得很痛快，過去對這些情況是不了解的，受了工委的蒙蔽！”

二、白不僅在他們的親信中傳播與灌輸他和范明的反黨觀點，還肆意的誣蔑中央，說“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國防工業

一馬當先”；“双輪双犁不适用于中国，造了很多，造成很大浪費”；“我国工农业的發展速度赶不上人口的發展速度”，等等。白云峰到处宣传范明“能幹、敢作敢为、能写文章，敢感，做的工作比其他書記多”。同时他在幹部中，主要是在他的亲信中，造謠誣蔑工委其他書記。攻击誣蔑中央領導同志和苏共領導同志。

三、自一九五二年初到一九五七年六月，白云峰任工委組織部副部長期間，一貫的包庇坏人，包庇反革命，打击好人。随独支进藏的幹部来自一百零四个单位，成分極為复杂，其中国民党的軍政人員，从排連长到师长，从三青团員、国民党員到省党部書記长（如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書記长薛文波），占了很大比例（現青管局仍有国民党校級軍官三十余人，連同反革命、历史上有政治問題和違法乱紀的坏分子共三百余人，占該局幹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仅白云峰在这次會議中交代，他認為是坏人和政治历史不清的，就有九十八人（由他私人介紹到青管局的三十八人不計在內）。这些人的情况八年来白云峰不仅不向其他書記反映，还分配他們担任重要的領導职务（有些是根据范明的指示）。

他排斥工农幹部，說他們“文化低，能力弱”。他排斥軍队轉业幹部，說他們“不懂地方工作”。他喜欢“听话”的小知識分子，喜欢政治历史不清、品質作風恶劣，但是会吹、拍、捧的人。因此在白主持工委組織部工作时，长期是非黨員和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員管理幹部工作。白云峰承認他和范明包庇的坏人和重用的旧人員旧軍官在一百人以上。

白云峰在使用旧人員上，有他一套反党理論，他說：“旧人員历史复杂是社会原因”；这些人是好人，“在旧社会不問政治，現在也不問政治”；“好人能作坏事，坏人也能作好事”。他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因此，他認為組織部門和保衛部門是对立的，“象社会部那样对待幹部的政治历史問題，就把幹部日塌了”！（變了的意思——注）一九五七年整編时，大批幹

部內調，他和范明預謀之後，為了保存親信，從拉薩各機關、各分工委決定內調的人員中，指名調出三十多個從西北進藏的幹部，

（主要是舊人員）私自介紹到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當時，青管局的幹部不僅成分極不純潔，而且還有很大缺額，但在范明的指示下，他把康藏公路管理局撤銷後的所有幹部，全部調回四川，一個也不要！為了補充缺額，他在蘭州、西安兩地，從西藏內調的幹部中、退職的人員中、他的親朋故舊中，以個人名義介紹了三十八人（有二十四個幹部）到青管局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歷史不清的人員和舊軍官。

這是包庇的一面，還有打擊的一面，僅據白自己交代，除去工委書記之外，他打擊的僅工委副部長以上、分工委副書記以上的幹部，就有樂于泓、牙含章、王華、杜舒安（以上四人已內調）、王其梅、惠毅然、朱贊良、張平凡、劉肇功等十個同志。

四、白雲峰利用工委組織部的職權和形式，在黨的許多部門中，安置他們的親信，培植宗派力量。為了拉攏幹部，提拔親信，不經過會議討論，用批條子交各業務處辦理的方法來提職、提級，實際上白雲峰就是組織部，組織部就是白雲峰。白雲峰的“有求必應”，甚至“不求也應”，不僅是為了樹立個人威信，而是一箭雙雕——既落了個“好人”的名聲，又拉攏了幹部。他私自委任工委西安辦事處副處長劉江霞為代理黨組書記，却長期排斥另一個副處長李德明於黨組之外。封官許願，他對在日喀則分工委工作的白銘章、李天民、夏時清同志說：“你們好好幹，工委有個意見，讓你們當分工委委員”。他不僅歧視婦委，謾罵婦委，而且還用組織部的名義，建議工委撤銷譚冠三同志兼婦委書記的職務，以梁楓代之。在他離開工委組織部去青管局工作之前，為了給梁楓爭地位，私自給團中央寫信說：“因西藏工委應着梁楓任書記”。

范明反黨的宗派活動，主要依靠了白雲峰的組織和策劃。他為范明策劃，拉攏工委委員、統戰部長陳竟波，工委委員、財委

書記夏仲遠，他說：“陳、夏領導的部門很重要”，“范明提的問題，沒有他們支持就難以通過”。在白云峰親自動手進行“爭取、團結”之下，以白為核心，由白、陳、夏組成了范明的“三關口”（組織、統戰、財經）和“一流幹部”來反對工委。

五、白云峰是“表面道貌岸然，實則卑鄙難言”的偽君子。一九五四年解決西藏黨的團結問題時，他在會上慷慨激昂。他說：“根本沒有什麼西南、西北的不團結問題，我們是黨的幹部，不是范明的幹部”。但卻私下對范明說：會議上的那些發言“是被迫才這樣說的。”一九五七年對侯杰同志（原工委財經部副部長）去青藏公路交通運輸管理局任副局長和黨委副書記他是很不願意的。但他認為黨內也應該“耍手腕，看誰耍過誰”，“他們越排擠我們，我們越應該顯得大方”。他和范明預謀之後，就勸慕生忠發一個歡迎侯杰去青管局的電報。慕生忠對白極為信任，言聽計從，白對慕却是表面恭維、利用，背後打擊。本來他散佈的誣蔑工委負責同志和中央的流言蜚語，數量是很多的，但由於他一貫“慎言”，“心里做事”，在人們中間驅得了一個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的“好人”的印象，甚至很多被他打擊過的同志，也沒有懷疑是他在“挾嫌報復”。

西藏地區開始整風之後，白（在西藏公學工作）“為了表示自己願意進步”，發報給工委：“要求工委將直屬機關在整風中對我的意見轉給我”，另一方面寫信給范明，說孫作賓、孫殿才已定為右派，提醒范明“警惕”。這次會議中關於范明的“新西游記”問題剛在大字報上揭發之後，他立即從范明處要去草稿，連夜閱讀，對陳竟波同志說：“新西游記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東西，如果寫成後那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在小組會上說：“寫的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當揭發出“新西游記”的人物刻劃部分之後，對梁選賢（工委委員，日喀則分工委書記）和陳竟波說：“這真寫的壞”！對梁表示：“范明這一次真的要垮了！”埋怨范明說：“你為什麼跌這樣的活呀！”並為范明划策，叫他“要

鎮靜”，“好应付过关”。范明的“新西游記”提綱被揭發后，白云峰违犯工委不准私自召开會議的規定，非法召开會議，破坏对范明反党罪恶的揭露。在牙含章和范明查对材料时，白挺身而出，猖狂地打击牙含章，包庇范明。他掩护黄琳銷毀日記，黄琳为了銷毀她和范明、白云峰等人来往的記錄，叫白把她的日記托人帶到兰州，当組織上讓她交出日記时，她用一個沒有写字的本子頂替，把日記本偷偷燒掉，明明两个本子的大小相差很大，白云峰却硬說黄琳托他設法帶回兰州的就是这个本子。

白云峰的道德也極為敗坏，和一些女同志的关系極不正常。

白云峰多年来一直不滿意党对他的使用；在进藏之前因未当上大荔地委組織部长和专員而深为不滿，进藏以后因一九五二年未当上工委委員，后来未被选为“八大”代表、西藏监委委員和副書記，一九五七年收縮之后未当上工委組織部长或秘書长，因而长期对工委领导心怀不滿。在他的历史問題上，是一連串的对党隱瞞和欺騙；从白在这次幹部會議上对他的历史所做的交代来看，他曾长期向党隱瞞一九三五年他在韓城中学考試时，曾經写过文章罵紅軍搗乱，在剿共宣传队和特务談話时說：“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等叛党行为。白曾两次与党失掉关系，並曾向剿共宣传队供出高德輝、薛何昉两个同志，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長時間与特务高雨亭、张子正在一塊鬼混，並与张子正一塊去投考伪中央軍校教导团。他对西北局所做的結論一貫表示不滿，他在一九五六年列席“八大”會議时，瞞着工委，私自将自己的档案帶到北京，假借国华同志的名义交給中央組織部，要中組部对他的历史重作結論。並和他的亲信刘江霞（工委西安办事处副处长）互相串通包庇，叫刘将他的历史材料准备妥当，白到京后又私自發電報叫刘江霞到中央組織部为他的历史問題作証。这明显的是心怀鬼胎，有意欺騙組織。这次幹部會議上被揭發后，証据确实，他还是装聋卖傻，始終不肯老实交代。

白云峰在对上述錯誤的几次交代中，态度極不老实，一貫避

白
范
，
丁
帶
頂
峰

，
當
手
打
司
打
毛
青

重就輕，遇到關鍵性的問題就“記不起来了”，企圖狡賴。

上述事实說明：白云峰是范明反党的政治路綫的忠实执行者，是范明反党宗派的積極策划者和組織者，是一貫欺騙党、对党不滿、长期进行反党活动的極右分子。为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銷其一切行政职务。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會議 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梁枫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梁枫，女，四十三岁，陕西临潼县人，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原任共青团西藏工委副書記，是范明反党集团的成員之一。其主要反党罪惡事实如下：

一、忠实执行范明的反党路綫，在青年工作上發展青年主义。

梁枫提出了不要反帝爱国的“民族青年統一战綫的方針”，強調西藏青年可以起一部分工人階級的作用；把青年团降低为“不分民族、階級、信仰、职业的”“爱国进步的群众組織”，把青年团和爱国青年联誼会等同起来；把青年要有单独的青年組織的原因庸俗化，說什麼“如果青年沒有自己的組織，……势必和成年以及老年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搞在一起，……青年人要鍛炼身体，他們要打球，而成年却不很需要，老年已不适宜作这种运动了，如果都来打，会把老人累坏了；如果都不打，你們青年就会不高兴了。……，这就說明单独的青年組織是必要的”；一九五六年提出了与党的现行政策相对立的“向社会青年进行階級教育”的方針。並在修筑机场的民工中，組織訴苦，上书要求改

革，以配合范明的“改革形势的到来”；一九五七年九月还在西藏日报上发表反对中央“六年不改”的文章说：“必须向青年讲清楚，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工作，为改革创造条件。”

二、把团工委变成反党的“独立王国”。

一九五六年她两次以团工委副书记名义在西藏日报上发表关于建党方面的带指导性的反党文章，号召“大力地大胆地放手地发展藏族党员”，“在机关和社会上发展一批藏族党员”，要订出“协助党发展藏族党员的详细规划，订出具体措施，以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她对团工委党支部委员和全体党员说：

“团工委党支部一定要发展那些作用大、影响大、经过考验、年龄大……的入党。”梁枫不仅把个人置于党支部之上，粗暴地干涉支部工作与生活，而且不经任何请示，擅自决定成立青年参观团、代表团、团校学员队的党支部，私自决定党支部的负责人。

她反对党对团的领导，强调团组织垂直领导，团的组织的建立和委员会人选的决定，应由上级团委批准，而同级党委的权力只是同意和赞成；把直属团委抓在手里，不受直属机关党委领导，反对工委关于西藏团校由西藏公学领导的决定，强调西藏团校要受团工委领导；公学团委要设在团校，称团校团委会，强调团的干部也要团的组织管理、分配，“你们组织部”（工委组织部——注）不能“拉我们的干部”，她主动地用团工委名义提出工委青委的组成名单。一九五七年不经请示，擅自决定取消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

在梁枫眼里没有党的组织，一切工作请示只找范明，要干部直接找白云峯。她忠实地执行范明的反党路线，反对中央和工委的正确路线，抗拒工委的领导，和工委唱对台戏，拒绝工委各部在业务上的领导，几次拒绝工委监委、组织部、直属党委和筹委财政处的检查。一九五七年因为没当上团工委书记，就在工委负责同志面前大哭要求内调。

梁枫对团工委实行家长领导，一贯个人决定问题，即使通过

會議形式，也还是她“說了算”。她也不尊重团工委委員的职权，說“不作团的工作的委員不了解情况，提不出多大意見，委員会討論了，还不是按我們的意見办。”事实上团工委即梁枫，梁枫即团工委。她一方面強調下級对她把持的团工委的服从，但是她概不尊重团中央的領導，一九五三年团二次代表大会时，因为爭代表，爭中央委員（原来她没有准备出席，后因范明在京开会她才去的）未达到目的，控告团西南工委“不公道”，同时对于沒有讓她在大会上發言，書面發言又沒有登报，也提出質問，一九五六年罗毅同志同中央代表团来藏时，召集直屬机关团的幹部开会，了解情况，她因为忙于看戏不去参加。还誣蔑“中央青年代表团不了解情况，提的意見沒价值，工作不好。”

她对团工委实行家长統治，和地主家庭的泼妇一样，横行霸道，蛮不讲理，打击給她提意見的幹部，她搞宗派，分亲疏。团工委有梁（枫）派、丁（心）派，吹拍派、挨打受气派之分。以梁枫为中心，“五虎将”为骨幹，把团工委搞得烏烟瘴气，邪气十足，毫不正派；办公会上自由主义滿天飞，这个机关长，那个幹部短，制造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語，黄色情調自由泛滥，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互相恭維，自我吹嘘。凭个人好恶对待和使用幹部，凡是对她唯命是从的，会吹、拍、捧的就是好幹部，就吃得开；凡是“不順手”的，提过她的意見的就坏得要不得，就打击、排斥、調走。张生蓉的能力不强，作風也不好，因为她是她的学生，就从拉薩小学要来提为团工委少兒部副部长，但是却想讓胡琮（团工委统战部副部长）給张作幹事。赵洪蒙是肃反中的重点分子，因为他可以替梁写文章，尽管赵思想反动，品質恶劣，还是把他提为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因开汽車轧死人被逮捕后，她通知社会部說“赵洪蒙不能和一般犯人一样看待，如有条件另找房子关押，房子和生活应予照顧”，打电话叫社会部讓赵回机关工作，（被拒絕）写信、送苹果表示慰問，在討論赵的处分时，她強調“赵洪蒙在思想意識上有毛病，但在工作上优秀

的”，“如果开除党籍，押三年这个干部就完了”。由于她的包庇，范明的支持，改变了工委监委对赵的处分决定。

三、梁枫不仅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她的母亲是改嫁之后死掉的，解放后，她硬把她母亲的棺材弄出来和她的父亲埋在一起），还十分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极端讲究阔气、排场。虽然她对自己的钱“锱铢必计”，她派公务员到街上给她买毛线，借口颜色不合，坚决不要，迫使公务员不得不把这些毛线自己买下。但是她对公家的钱，却是挥金如土。

一九五六年团西藏工委召开的全区青年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六百一十名，工作人员三百多，开了十天会，花了二十五万元，平均每人每日四十二元，除布匹、绸缎、口红、雨衣、香粉、洋伞、被子、毛毯都要购置和每人每日平均十一元的伙食以外，买的招待品平均每人每日有纸烟五十支，点心一斤，糖果半斤，苹果五两（从印度进口的）。一九五六年举办的儿童夏令营，有二百九十六个儿童参加，搞了十天，花了七万多元，平均每个儿童二百四十元，夏令营购置的物资达二百零九种，除了文娱、体育用具，化学药品与仪器等应有尽有之外，平均每人每天有：面包一斤多，白糖近四两，每人被褥一套，洗漱用具一套，棉花七点六斤，红领巾一点四条，暗扣七个；二点二八一个帐篷、一个垫子。梁枫还在总结中写道：“在物资准备上，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有关活动物资未能及时从内地运到，搞起活动来缺这缺那，因而限制了活动更广泛多样的开展。”这样，团工委从一九五六年三月到一九五八年四月挥霍国家财产达二百万元之巨。

梁枫对整风的态度一贯恶劣。西藏地区开始整风之后，很多单位对团工委有意见，她不仅压制批评，给部分工让他们反驳那些对团工委意见最多的单位，还想把提意见最多的同志调到团工委进行斗争。干部会议开始后一贯避重就轻，包庇范明，不肯老老实实交代。

上述事实证明：梁枫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党籍，

撤消一切行政职务。建議团中央撤消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員的职务。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會議 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曾实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曾实，四十岁，广东揭阳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一年因地下斗争尖锐要求退党，为当地党组织秘密放棄（即开除党籍）。一九四五年一月环境好转后参加部队并同时重新入党，原任工委办公厅副主任，工委書記处秘書。系范明反党集团的成員之一。其主要反党罪恶事实如下：

一、曾实是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据他在这次整風中交代：一九四六年东江縱队北撤之前，他由本地游击队员王砲光口中得悉，我一游击小组准备攻打当地地主陈美記（与曾实有亲戚关系），由于曾实事先向地主的兒子陈应恭告密，陈美記作了准备，致游击队员伤二、牺牲一。陈应恭当即酬謝曾实伪鈔二万元，並繼續給曾的家庭以生活照顧。（陈应恭写来的証明材料为酬十元）

二、曾实是范明反党集团成員之一。他为了达到依靠范明解决历史問題，和向上爬的目的，主动和積極地鑽进了范明的反党集团，成为范明在工委办公厅的“情报員”和范明忠順的“狗腿子”。他为范明吹嘘說：范明在民主改革中提出的所謂依靠上層的階級路綫是“创造性的馬列主义”，說范明“有魄力，綜合能力强，是少有的优秀幹部”；整風开始后又为范明的所謂“大發

展”进行辯护和开脫，說：范明所主持的“大發展”工作，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其他几个書記又不在，能搞到这样是不錯了。他主动地在范明的宗派成員之間联络感情，消除誤会。他給范明組織周末聚餐会，拉攏幹部，並假借各种机会与名义，設法滿足范明喜欢排場、闊气的生活，他在負責同志面前察顏觀色，十分殷勤，但是他承办的事情，总是根据范明的意圖和顏色行事。在范明的意圖下，打击牙含章，散播牙含章的坏話；掌握办公厅的工作与“情报”。他給范明搜集、匯集各方面的“情报”，据他交代：在范明面前，曾給二十多个同志进过讒言；使办公厅的許多同志互相猜疑，有人人自危之感。他在內地治病时还給范明通風报信，告訴范明：“田璞可能定为右派，来往要小心！”

由于曾突的“忠突”，范明也为曾爭級別，爭地位，不遺余力，不顧有关部門和其他同志的反对，玩弄手法提曾为办公厅副主任。白云峯則两次告訴审幹办公室恢复曾突在重新入党以前的革命历史（实际上是恢复党籍），由于审幹办公室的同志反对，未成为事实。（龔彬同志有电报証明，曾突亦自行交代；白否認有此事）

他为了回內地治病，在几个書記之間鑽空子，挑拨关系。在国华同志面前說范明已經同意他回去治病，在范明面前又說国华同志已經同意他回去治病！他假借国华同志的名义，給范明买送礼的手表，用国华同志的錢給范明的亲信买东西。关于工委妇委的組成人員問題，周仁山同志因不了解情况把梁枫（范明的老婆）的名字勾掉了，曾突不向仁山同志說明，而專門把这个名单拿給范明看。从中挑拨仁山同志与范明之間的关系。他从范明处知道仁山批評他沒有“稜角”（沒有原則的意思）之后，对仁山極為不滿，在下面說仁山同志的坏話。

三、曾突为了把持工委办公厅使办公厅，成为范明反党集团的障地，一貫採用極端卑鄙的手法拉攏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为了拉攏人私自許官許願，答应温万华任秘書处副处长，赵景仁

任保卫科科长，王亮炳（历史不清楚）可以入党。把党的机密文件交给不应阅读的同志阅读，还说“这样可以搞好关系”。他排斥、打击对他“不顺手”的干部，骂这些同志“笨蛋”、“混饭吃的”、动不动就要“撤职”、“停发工资”甚至叫“小心你的脑壳”。在打击之后又常常用请客送礼等办法进行拉拢。对一直不顺从他的干部，就利用职权把这些同志搞走。他为了“效忠”范明，撤开工委秘书长和办公厅其他负责同志，自行处理办公厅各处的工作。为了给范明搜集写“新西游记”小说的材料，私自从工委办公厅、研究室等机关拿走了大批党的绝密、机密文件和资料。

四、机关开始整风之后，他为了给范明打掩护，破坏鸣放，私自组织几个书记的秘书开会，规定他们，“鸣放前要经过我审查”。同时用工委整风办公室名义自行布置直属各单位找“毒草”。在办公厅秘书处散播：“内地整风开始时，有些年轻人，没有受过锻炼，在鸣放时提出很多意见，结果到后来整成右派”。又说：“你们鸣放时要站稳‘立场’，提意见要好好的考虑”。

上述罪恶事实说明：曾实是反党分子、叛徒。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送回原籍处理。

中共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文澄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和市委第八次全体委員（扩大）會議，在省委领导下，遵照中央的整風方針，通过大鳴大放、大爭大辯，揭發和批判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的右派面目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彻底粉碎了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企圖篡夺党的领导的阴谋。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是重庆市党组织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和純潔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加强全市各级党组织的坚强团结，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向党进攻，同我們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紧要关头，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为了实现他們企圖篡夺市委领导的个人野心，就瞅准了这个时机，糾合一批党内右派分子，同资产阶级右派，里应外合地向党發起总攻击。张文澄利用市委常委和市委宣传部长的职权，处心积虑，百般曲解党的方針、政策，打乱市委的整風和鳴放部署，把他所领导的党的宣传文教部門，作为向党进攻的障地。他积极支持与指使宣传部門和报社的党内右派分子向基层煽風点火，力圖使当时的大鳴大放脱离党的领导，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计划發展，把运动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向，以便于资产阶级实行复辟。

张文澄为了实现篡夺市委领导的罪恶目的，在市政协第二届第一次全体會議前，他在市委召开的参加政协会議的党员大会

上，公开反对市委关于“黨員必須維護黨的方針政策，對於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論要坚持說理斗争”的正确指示，曲解黨的政策，取消階級斗争，解除黨員的思想武装。並竭力替資產階級右派吹捧，貶低黨的領導作用。在市政協會議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的进攻已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却得意忘形地为右派分子捧場、撐腰、鼓掌欢呼。在大会發言中，他以故作自我檢討的姿態，惡意捏造許多口實，污蔑市委、攻击市委，明槍暗箭，極盡惡毒攻击之能事。在市的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界座談會上，張文澄又公然違背市委指示，把座談會完全變成右派分子嬉笑怒罵向黨进攻的場所。當右派分子的进攻达到登峰造極的時候，別的同志都極為憤怒，主張反击，而他却仍認為“放”得不够，助長右派分子的囂張氣焰。會議結束前，他又在發言中，對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会主义言論大加贊賞，說“在这次會上找到了共同語言”，“我們的愛和憎是一致的”，並同右派分子異口同聲地說“牆和溝主要是黨造成的”，為資產階級右派增加了向黨进攻的資本。座談會後，黨內外不少右派分子就趾高氣揚地拿張文澄的講話來煽惑群眾，對各基層黨組織施行猛攻。這就充分說明，張文澄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黨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模一樣，而且實際上已成為匯合黨內外右派分子向黨进攻的“統帥”。

張文澄一方面對黨是这样的刻骨仇恨，瘋狂进攻；另一方面對右派分子則情長誼深，愛護備至。他公然違抗組織決定，替右派分子劉盛亞在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時期所寫的、曾受文藝界嚴肅批判的、為反革命分子辯護的反動小說“再生記”翻案；並且批准報紙刊登解放前專寫反共文章的反動文人王向辰（老向）向黨進行新的进攻的文章，為其恢復“名譽”。直到反右派斗争期間，他還竭力替一些右派分子進行辯護、開脫。

張文澄還以封官許願和私人拉攏等手段在市委宣傳部、文教部和報社內部拉攏王匡時（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謝子（市委宣傳部馬列主義教研組組長）等右派分子，結成右派反黨集團，進

行反党阴谋活动。

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手法，是利用掌握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门的便利条件，在党内外散布修正主义思想，百般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假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目，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天资兴无”的任务。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积极主张开放思想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市场，为资产阶级思想争夺地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争“自由”，他们搬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提倡“要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立场”来办报刊。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办报刊，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他们主张用不要界限，不要是非标准的鸣放，来代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以便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自由地向党冲击；他们並以反“教条主义”作幌子，借“独立思考”、“自由争论”为名，公然地大量地散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等思想毒素，从思想上腐蚀党的队伍。

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的另一个反党手法，是利用合法的工作职务和党内民主权利，进行非法活动。张文澄为了实现其卑鄙的个人野心，曾一再在市委直属机关党代表大会、市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省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兴风作浪，狂妄地攻击省委和市委。在省党代表大会上，张文澄因为想当八大代表的野心未能达到，就反对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八大代表候选人，企图破坏省党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去年春季，他利用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机会，故意歪曲全国宣传会议精神，污蔑省委“把中央的精神传错了”，公开反对省委的正确领导。

在党的生活中，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来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经常利

用作报告、講課和學習会等合法形式，以“探討理論”为名，散布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攻击党的領導，丑化党的領導幹部。

张文澄还恬不知恥地以四川地下党的“头面人物”自居，一貫散播地方主义情緒。以虛偽的“关心过去四川地下党的同志的利益”，“替地下党的同志說話”的面孔，拉攏某些思想上不够健康的人，在党内划小圈子，挑拨地下党的同志和老区来的同志之間、本地幹部和外来幹部之間的关系。企圖利用这种地方主义的情緒和宗派活动，挑起党內的爭論和混乱，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以實現其个人野心的目的。

张文澄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长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入党以后，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阶级立場，把党看成是猎取名利、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在党内搞个人野心活动。在历次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他总是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場，向党两条心。例如在土改和“三反”中，曾包庇过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他在市委的集体领导中，一貫以反对派的面貌出現，与党唱对台戏，破坏党的統一领导。几年来，党组织曾多次对他进行过严肃的批評教育，但他不仅沒有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反党活动更变本加厉，当此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他就不能繼續在党内隱藏下去，終于現出原形，公开叛党。

代表大会一致指出，张文澄的这些活动，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願望，是与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的利

。像张文澄这样已經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领导权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对于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較之一般党内右派分子更为严重。应当看到：由于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市人民和全市各级党组织的努力，重庆市几年来的工作成績是巨大的，市委对于中央和省委的方針指示是坚决貫徹执行的。全市各级党组织是团結的。所以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的阴谋未能得逞，而是被徹底的粉碎

了。但是，由于张文澄所进行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反党活动，已經严重損害了党的团結，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的統一和集中領導，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給党的思想工作和文教工作造成了一定損失。他已經成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因此，必須把他清除出党。代表大会經過討論以后，一致決議：开除张文澄的党籍，撤銷他的各項职务。鑒于张文澄的各种罪恶活动在許多地方遺留的毒害和影响，必須繼續徹底进行消毒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維護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

代表大会認為，全市各級黨組織和全体黨員，應該从张文澄的反党罪恶事件中認真吸取教訓，百倍地加强党的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導下，为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任务，保持党的純潔和加强党的团結統一，作經常不懈的斗争。

一、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作用，時刻警惕地保衛社会主义建設，善于引导千百万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經在各个战綫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个革命还在繼續进行，特別是思想战綫上的革命将是較长时期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斗争，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之間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各級黨組織必須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領導，把灭資兴无作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不仅要站稳工人階級的立場，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必須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团結群众与党内外各式各样的企圖削弱党的領導、削弱无產階級专政、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巩固革命胜利，保衛社会主义建設。

二、努力不懈地學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增强党性鍛煉，堅定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把自己真正的武装起来，不断地提高政治水

平和思想水平，使自己能够銳敏地鑒別什么是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反馬克思主义的。学会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指导实际工作。特別要反对那些叛党分子用来作为反党工具的修正主义。

三、發揚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在党内清除一切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与共产党员的党性絕不相容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徹底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必須經常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蚀，反对鬧名誉、鬧地位、爭权力、爭待遇。必須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不能把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必須虛心謹慎，戒驕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畏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絕對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則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四、維護党的团結和統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各級党組織必須加强党的統一和团結的教育，进一步發揚党内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加强党的集中統一的领导。必須严密党的組織，坚决把一切混入党内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反党分子从党組織內部清除出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党的組織，自觉地遵守党章党纪，牢固地树立党的团結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把个人严格置于党組織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党内民主必須保証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原则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团結。絕不允許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利用党内民主生活来分裂党和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

五、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与一切削弱党的领导，危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幹部都必须有維護党的领导威信和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的高度自觉性，都必须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綫、党的方針政策和党組織的決議。有无这种自觉性，是測驗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重要

标志之一。

我們徹底粉碎了張文澄及其右派反黨集團的罪惡陰謀，取得這一鬥爭的勝利，証明了黨的整風運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全市各級黨組織應將本決議向全體黨員深入傳達，結合實際情況，認真組織討論，用高度的党性原則教育黨員，克服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傾向，在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同時，必須繼續深入整風運動，有系統地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中，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爭取全民整風運動的完全勝利。為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奮鬥。

中共重慶市委關於 開除右派分子張顯儀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張顯儀，男，現年四十歲，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學生成分，一九三七年八月入黨，同年參加革命工作。歷史上曾因洩露黨的機密，暴露組織，受過黨內警告處分。原為重慶市委候補委員、中共重慶市工會黨組書記，重慶市工會主席。

張顯儀在擔任市工會領導工作期間，在政治上搞工團主義，組織上開獨立王國，發展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和另一反黨分子鄧平結成張鄧聯盟，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惡罪活動。

其主要惡罪事實如下：

一、有一套完整而系統的工團主義論點，反對黨對工會的領導。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向全總提出的“關於工會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反黨文件上，他認為：“重慶不是那樣標準的工團主義、

經濟主義”，“自從全國和本市在一九五三年反工團主義和經濟主義後，多數工會組織獨立作用發揮較差”，以此為他進一步反對黨中央的正確工運方針開辟道路；他認為：“工會組織沒有很好發揮作用的原因，不是工會保證與服從黨的領導有問題，主要是黨對工會領導有問題”。“黨對工會支持不夠，干涉過多，卡得過死，限制了工會獨立活動”。他還認為：他“自己是最了解工會業務的，最能代表群眾利益”，“市委不懂得市工會的具体業務，不了解工會的情況”。因此“市工會不聽市委領導是很有理由的”。他狂妄地要求：“首先在全黨再一次大規模地發揮大辯論，進行依靠群眾、依靠工會、正確認識工會作用的教育”，這就十分露骨地反映了他擺脫黨的領導的反動工團主義思想；他反對中央既定的工會工作任務，提出“發動、教育與監督”作為工會的工作任務。他片面強調“人民內部矛盾突出了”，要求無限制擴大工會權力，並且“要用法令加以明確，從制度上加以鞏固，工會工作才有合法依據”，“只有如此，工會說話才算，腰杆才硬，才有法令制度向行政監督”。“不改變配合地位，要改變‘工會是行政的尾巴’，是不可能的”。他甚至主張“工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他還有“現在廠礦企業內部組織和工作有互相打擠，重複勞動”的論調，言下之意，廠礦企業只要有工會獨立存在，獨立活動，其他的群眾組織似乎都可以退出。

二、長期來搞獨立王國，與黨分庭抗禮。

一貫借口垂直領導，歪曲全總指示，在重大方針政策上，公開抗拒黨對工會的領導。例如一九五五年的基層工作會議，市委指示以貫徹增產節約為中心，張竟一再抗拒執行。又如不經市委指示，擅自搞工會積極分子活動月；拒不執行市委批准的幹部編制數；頑抗市委對運輸電影院鐵椅問題的指示；拒絕移交文化宮、招待所等等。在工人整風中，更猖狂地以“發揮工會組織作用”為名，向黨爭奪領導權，露骨地表現了他的反黨野心。

三、与反党分子勾結，操縱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张显仪一貫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市委委員，經常无耻地与市委負責同志比高低，当其个人野心未得滿足时，就不择手段地勾結反党分子邓平，操縱反党集团，猖狂向党进攻。例如，在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由于他未被选为市委委員，竟不惜与反党分子邓平勾搭，利用大会主席团成员身分，私自把代表們向主席团提的有关工会問題方面的紙条，拿給邓平看，暗示要邓平也遞条子去要挾重鋼党委作检查交代，並为张活动选票。张还鼓动邓平煽动陈孝篤同志收集資料，攻击市委，又如三届工代会前，张有意洩露桑林、邢广信同志回市工会工作的机密，唆使邓平召开反党集团密会，拒絕貫徹市委对市工会領導幹部安排的意圖。事后，邓平还向张作了“彙报”。就这样与反党集团一唱一和，狼狽为奸。

四、破坏党的幹部政策，实行資產階級的幹部工作路綫，維護家長統治，扩大个人反党势力。

——张显仪歪曲、破坏党的“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执行資產階級“用人唯才”的路綫。一貫重用資產階級右派和未經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的政治面目不清），打击、排斥工农幹部；取消思想斗争，麻醉、腐蝕幹部。

为了扩展个人反党势力，他竟不惜利用职权，封官許願（經初步統計，张曾当面对六人許以提职加薪），拉拉扯扯，进行宗派活动，以維護家長統治，扩展独立王国資本。

五、长期以来不过党的組織生活，成了市工会的特殊党员，不遵守党的紀律和保密制度，将中央、省和市委發給市工会党組的絕密文件，随便拿給他的爱人、反党分子袁振邦和他的女兒看，並給袁带到印制公司去传閱。入城初，掉了大烟，私自辱打警衛員；回家接小孩，随便带手槍、警衛員，炫耀个人身分；滥用职权，破坏劳动就业法令，私人介紹一些亲友入厂工作等等。

张显仪走上叛离工人階級的反党道路决不是偶然的。他长期

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在政治上發展工團主義，在組織上搞獨立王國和擴張個人野心，最後就必然發展到進行反黨活動。

張顯儀的反黨活動，嚴重地損害了黨的威信，破壞了黨的團結和統一，特別是他在工會工作中，放毒甚廣，腐蝕和毒害了不少革命幹部。因此，給黨的事業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

市委對張顯儀的錯誤，早就有所察覺，曾多次幫助、教育和批評，尤其是近年以來，對其教育幫助更為殷切。但張顯儀竟採用了一貫施用的卑鄙伎倆，公開拒絕黨的監督，因而其錯誤一犯再犯。

市委第八次擴大會議期間，當其反黨錯誤被全面揭發和批判後，張顯儀的態度仍極不老實，企圖減輕罪責，蒙混過關。

上述事實說明，張顯儀已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經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市委第十一次全體委員會一致通過，開除張顯儀黨籍，並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中共重慶市委文教部支部大會關於 開除右派分子陳孟汀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陳孟汀，男，四十四歲，四川省達縣人，地主兼資本家出身，學生成分。一九三八年七月入黨，曾任區委書記、縣委委員、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處副處長等職，現任中共重慶市委文教部副部長。

陳孟汀是以張文澄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在文教戰線上的一員悍將。在去年大鳴大放期間，他與黨內右派分子張文澄、王匡時等串通一氣公開叛黨。他利用具體領導文教、衛生系統整風的便

利条件，四出作报告、演講，大肆煽風点火，鼓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在三月十六日市民盟高等学校基層工作會議上，他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对党进行攻击，他說：“馬列主义者不迷信自己的学說”，实际上就是号召盟員不要信仰馬列主义；他說：“如果相同才談那是逢迎”，实际上是号召盟員同党唱对台戏；他說：“思想工作的任务”和“團結知識分子的先决条件”是“使大家思想活泼起来，敢說，願說”，实际上是煽动民主党派向党进攻。六月上旬資產階級右派向党进攻已达到登峰造極，但陈孟汀意犹未尽，竟进而明目张胆地号召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师专对学生講話說：“党的荣誉是不能保証的”，公开号召学生要“破除对共产党的迷信”，要象儲安平那样的“放”，“要用‘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来对共产党进行一次总检查”。他还在大会上攻击市委書記辛易之同志要黨員站稳立場的指示，公开号召党、團員不要立場，不要原則。並提出“愈鬧得兇、愈能發現人才”，“向党提意見最多的才是正面人物”。他还支持右派分子推翻学生会說：“要是学生硬要推翻学生会，那就讓他推翻，推翻了还好些”。八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陈孟汀仍有意违抗党的領導，在普通中学教職員大会上，公开号召要“破除对共产党员的迷信”。

在此期間，陈孟汀还竭力反对中央、省、市委关于鳴放的正确指示，積極主张不要領導，不要有計劃地放。在三月十六日市高等学校院长、党委書記會議上，他歪曲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公开反对党委对鳴放的部署，污蔑省委扩大會議精神是“收”；在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北碚区和沙磁区高等学校會議上，他公开反对当时中央关于学生暫不鳴放的指示，認為“学生的問題不在于如何放而在于放够”，主张“学生应立即鳴放，以爭取主动”；六月在师专他违背了市委关于控制广播电台的指示，放任右派分子繼續控制电台，在八月十二日中专幹部大会上，他公开反对市委書記辛易之同志关于整風应馬上轉入反右派

斗争的指示，主张继续鸣放和辩论下去。

陈孟汀这一系列反党罪恶活动，助长了文教系统右派分子的猖狂气焰，特别是师专由于他的亲临兴风助浪，情况更为严重，牛鬼蛇神一时十分嚣张，以致激起周围农民的愤怒，都抱着标语，提着浆糊桶到学校来向他们兴师问罪。

在反右派斗争中，陈孟汀公然篡改党中央反右派斗争的方针，竭力保护右派分子过关。他公开提出“既有右派言论，又在鸣放中积极煽风点火的人，不能算是右派”；他主张不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公开提出对右派分子要本着“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实行和平谈判，不要逼之过甚；他主张不要对右派分子进行严肃处理，公开提出“对右派分子，不论罪恶大小，只要自动坦白交代，一律不登报、不斗争、不处分”，并号召群众“不要对右派分子过分歧视”。陈孟汀对省委关于右派分子教师应向学生作检讨的指示，他擅自决定中学党委不予执行，当中学又查出一批右派分子需要及时进行斗争时，他却强调要中学党委“在各校一律开展大辩论，并把右派分子摆进去一齐辩论，不单独进行反右派斗争”，以致使中学在查漏中已查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一直无法展开斗争。

陈孟汀还利用文教部口审批右派分子的职权，反对和阻止基层党委把一些罪恶昭著、众所公认为右派分子的人划为右派。他曾反对和阻止西师、西农、师专将右派骨干分子罗容梓、任达远、蒋同庆等划为右派。并多方保护右派分子张文澄、戴燦光、李忠祿等人，阻止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斗争。

陈孟汀这一连串的破坏、阻挠，给文教、卫生系统的反右派斗争造成了很多困难和一定损失。

陈孟汀还妄想从思想上瓦解和腐蚀我们党的队伍，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明目张胆地系统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他竭力取消党的领导 and 贬低党的领导地位，在民盟干部会上公开说：“党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盟的力量可以达到”；在普中和南

生界的整風报告中，公开提出要与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集体领导，並称他們为“高級将領”。他公开反对批評“先专后紅”的思想，說“不能要求先紅后专或先专后紅”，实际上是主张幹部只专不紅，他还污蔑省委批評某些人“向科学进军变为向人民幣进军的提法是一竹桿打死一灣灣人”；他恶毒咒罵党的积极分子：“是教条主义与經驗主义的天才結合家，是对上唯唯諾諾，对下打击的人”，声言“要以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心情来处理共产党员”，以平所謂“民憤”；他竭力取消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灭資兴无”的任务，否定思想工作中馬列主义的指导原則，公开污蔑“典型批判是牺牲一个人”，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作法”，污蔑“省委对毒草‘草木篇’的批評是引伸，不能服人”；主张“以‘能言’、‘能辯’、‘能合’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标准”，主张“香花与毒草应有平等地位”，主张“思想工作应求同存異”，他混淆敌我界限，甚至袒护反革命分子，把有的反革命分子当作是有缺点的好人，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还为反革命分子、贪污盜窃分子翻案，恶毒攻击历次政治运动，污蔑“三查三整”、“三反”、“肃反”、“思想改造”都左了，並在民盟幹部会上講：“三反前重庆工作是粗暴的”等等。他歪曲党的民主集中制，認為“尊重少数人的意見是新的民主的含义”，他竭力污蔑、詆毀苏联，散布各种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結的言論。在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發生后，他公开說：“社会主义陣营内部也有分裂的危险”。

为了篡夺党的領導，陈孟汀除与党内右派分子张文澄、王国时等相互吹捧、勾結，結成右派反党集团，站在一个政治立場上，共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以外，並以封官許願和加高薪等种种私人拉攏办法，在党内外竭力培植个人势力，同党对抗。他还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情长誼深，亲如兄弟，如右派分子管相恒給他私通密信，无話不談，管在給他的信中恶毒攻击“党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假手群众，借刀杀人”，但却称陈孟汀为“家长”，並

叫他不要把此事告訴黨組織，而陳孟汀就照辦了。陳孟汀自解放以來還安插了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政治面貌不清分子王良樞（肅反對象）、楊開助（歷史反革命分子）等多人在國家機關和事業機關工作。在作市文教口肅反辦公室主任時，陳孟汀還曾違抗黨的政策，甄別時他對該定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主張不定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對該捕的主張不捕。如對銀行學校的反革命分子郭作仁，他認為是政治歷史問題，主張“不以反革命分子論處”。對地質學校毆打領導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鄭寶琪（已捕），他認為開除也不好，送去勞動教養也不好，學校開大會鬥爭也不好，“主張把他調離學校就行了”。最為嚴重的是市廣播電台反革命分子康捷，市委已批准送勞動教養，但他却擅自將他留在機關工作。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陳孟汀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是一個窮兇極惡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黨的叛徒。他之所以成為右派分子，決不是偶然的。他出身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從小就立志要揚名顯親，光耀門庭，做地主父親的“忠順兒子”，而且被家里人譽為“少有大志”。他抱着這種資產階級個人野心混入黨內，二十年來，雖經黨耐心教育，但他一直堅持原有立場，不願接受改造。他對地主資產階級生活念念不忘，直到解放後，他還為他父親画像“重溫兒時舊夢”。他一貫在黨內爭名譽、爭地位，同黨离心离德，對黨極不老实。一九四二年整風，為入黨時隱瞞參加復興社外圍組織“忠義救國會”的歷史，曾受過審查鬥爭，而對黨不滿。一九五三年在西南文教部工作時，因鬧分散主義，搞獨立王國，又曾受撤銷黨內職務和行政撤職降級的處分，因而對黨更加仇恨，竟至當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緊要關頭，公開出賣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並和張文澄等右派分子結成反黨集團與黨外右派分子里應外合，猖狂向黨進攻。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態度極端惡劣，經過多次鬥爭，非但毫無悔改誠意，反而猖狂向黨反扑，對黨進行惡毒污蔑，為了嚴肅黨

紀，純潔黨的队伍，經支部大會討論決定，開除陳孟汀黨籍，並建議撤銷其一切職務。

中共重慶市財政局支部委員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戎占芳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戎占芳，男，四十歲，中農（土改前為富農）出身，學生成份，山西省山陽縣人，一九三七年四月參加革命，一九四〇年四月入黨。參加革命後歷任指導員，軍分區供給部副部長，軍區后勤部軍需處長，重慶市財政局副局長等職。原任市財政局局長，黨組書記。在一九四八年因犯本位主義的錯誤和有嚴重的腐化墮落行為，黨內曾受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在整風期間，市財經單位三級幹部會議上揭發了戎占芳很多極為嚴重的反黨罪惡。

戎占芳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有濃厚的個人名利慾望。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長期對黨不滿，以致一步一步地走向反黨道路。一九五六年省、市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戎極力詆毀省、市委領導，破壞省、市委領導威信，否定工作成績。說市委領導作風是“大小都抓，主次不明，零敲碎打，步子很亂”。說省委的報告“談工作成績多，談缺點不夠”。並毫無根據的利用他堂侄虛構的事實，在會上質問省委“遂寧專區×縣在統購統銷中严重违法亂紀，捆綁了貧雇農四、五百人，省委不知道？處理了沒有”。同時還在會外說“为啥這樣大的問題，縣委書記都不敢反映”（經調查並無其事）。惡毒的攻擊黨在农村中的階級路線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討論八大代表候選名單

書籍，並

主

生成
20年四
區后
長，
附

很多

濃厚
一步
上，
成子
无
只
知
，
农
单

的时候，我表示不满，与右派分子张文澄一唱一和，反对中央分配省的八大代表名单，主张“拉下几个，添上一些”，並同意打电报給中央“顶回去”。选举新的省委委員和市委委員时，我也有意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去年夏季我占芳在中央高級党校学习，当资产階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我附和右派的言論。右派分子徐光攻击中央說“中央对反右斗争的形势估計錯了”。他也表示贊成，並和徐光站在一起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长期以来，我占芳一直对市委的领导是採取抗拒的态度。如市党代表大会經費开支問題，本来市委負責同志已經同意了，不应成为問題，但由于我对市委一貫不滿，因此就借机向市委写报告，要市委責成有关經办同志检查，其实是要市委檢討，更恶毒的是威胁市委承認所謂錯誤。与市委唱对台戏，将市委的“军”。当市委答复“特殊情况經领导批准可以报銷”后，財政局还打电话質問市委說“請問市委什么叫特殊情况。請予解釋”。与此相反，我占芳对其它方面經費开支，就不是这样，如对民主党派的經費，則叫幹部对他們不要“扣”，並說“多給点錢，他們就笑哈哈了”。由此可以看出，問題的本质並不是执行制度的問題，而是蓄意和市委对抗。他还極力主张在市人委成立总党组来与市委分庭抗礼。

我占芳上述反党活动，經過財經单位三級幹部會議和財政局党支部、財政局系統幹部大会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了他的右派面目和反党罪行。当其反党罪恶被揭露后，在經過組織教育和批判下，我占芳尚能低头認罪，对其錯誤有一定認識，並有悔改表现。根据上述情况，經支部大会討論通过，决定开除我占芳党籍，並建議行政撤銷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降兩級。

中共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鉄民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张鉄民，男，山东平原人，現年四十二岁，文化程度大学毕业，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八月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轉正。历任民运股长，政工科长、宣教科长、警衛团副政委，华东軍区及山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青島市軍管会交际处处长，青島市委統战部副部长，上海幹部学校副校长、校长，党委会副書記、書記，一九五七年四月調我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員。

张鉄民虽然入党多年，但是由于他的地主資产階級本質沒有得到改造，存在着严重的个人野心及修正主义观点，因而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即和党的关系發生距离，一九五二年任青島市委統战部副部长期間，政治上即开始蜕化变质，工作消極，生活上享乐、腐化、个人主义严重，因此，三反中被撤銷打虎司令員。当时，本拟給予留党察看处分，后見其檢討尚好，有轉变，未予处分。但其本性未改，竟發展到大鳴大放时公开与党对抗，誣蔑中央的鳴放方針，对党委的決議拒不执行，並以装病不上班来要挾組織，和党内右派分子范雨舟、齐銘盘及更有严重反党錯誤的潘怀曾勾結起来，进行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从内部向党进攻，对党外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支持和配合的作用。反右斗争后，党委进行整風时，其反党言行被揭發出来后，曾多次进行斗争，並在党委扩大会上和四川省委召开的四級幹部整風會議上进一步进行了揭發和批判。其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抗拒誣蔑中央方針政策：他首先反对重庆市委派来帮助我院工作的刘家栋同志（市委常委、建交部部长）坚持貫徹中央和省、市委抓紧时机大鳴大放的指示，在党委会上蛮橫无理地与刘冲突說：“只有你刘部长才是真正的革命，你才能領会中央鳴放精神，我就不能。”“你当过部长，我也当过部长，也带过工作组去帮助工作，沒有见过像你这样的领导。”党委决定停課鳴放，由张鉄民向教师交代，张竟拒絕执行党委决定，並装病不上班达一星期左右。在这期間，又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党謬論。他向院长助理牛富海同志說：“停課我不管，我不負責。刘部长决定的你去找刘部长。”“我們不能这样作，我們不能將純潔的青年推到敌人那边去。”又向其他党委委員說：“为什么我們要自己制造匈牙利事件。”“青年人是單純的，脑子一热什么話都能說，什么事都能作。”尤其严重的是市委要党委書記石昌杰同志向张鉄民提出警告后，他在一次党委会上竟又繼續放毒說：“中央北京吹来一股風，我院不能跟着去赶浪头。逼着共產黨員反党是最反动的。”这一系列的言論，其中心思想就是否定階級斗争的客观存在，把右派分子向党猖狂的进攻說成是党制造出来的。这不仅是对党的恶毒誣蔑，實質上是企圖在階級斗争紧要关头袒护包庇右派。此外，在反右斗争后，他竟然不同意对畢業生进行政治审查，对人事处幹部說：“这些青年娃娃有些什么问题呢？”这說明他修正主义的系統性和頑固性。

二、严重的个人野心，一貫的反对党委和党委書記石昌杰同志，他一来就对石昌杰同志在行政会上所作的介紹極为不滿，認為石和他都是同級副院长，为什么石走了，他才負党政工作全責。他对党委集体领导也極不尊重，党委和四人领导小组（党委正、副書記，黨員院长，院长助理組成的）常不参加，或中途賭气退席，有时还睡覺。平时工作消極，党委会分給他的工作，他往党委書記身上推，坚持要他作时，他就說用党委的帽子来压他。背后，又向幹部說：“石、韓（党委副書記）是掛帅的，我

是当将的，”發洩不滿情緒。他在負責處理人民來信工作中，對壞分子楊熙麟誣告石昌杰同志在肅反中誣害好人，因而是反革命問題，他不但未及時交黨委討論，相反為楊熙麟捏造的所謂戀愛問題還派院長室秘書主任去調查，以表示對楊的關懷。壞分子余恭禮誣告石昌杰同志打擊報復，他又別有用心的壓了一個多月才交給黨委。

三、他與齊銘盤、范雨舟、蒲懷曾四人由於氣味相投，逐步的結成了一個反黨小集團，張鉄民是首腦。如范、蒲鬧個人情緒，要求調動工作，石昌杰同志不其同意，張就背後進行拉攏討好，向蒲說：“沙坪壩這個鬼地方，蚊子有幾十種，有機會到部里（中建部）替你反映。”答應范在黨委會上支持范調動工作。蒲平時對石昌杰同志態度最兇，張說蒲雖有些急燥，但精神是好的，今後，黨委應發揚這種精神，拉蒲反石。有的黨委委員說齊的缺點，他就替齊開脫，說這是石昌杰同志的缺點。並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常一唱一合，與黨委唱對台戲，使黨委會常陷於僵局，分裂與破壞黨的團結。

四、反右鬥爭中消極怠工，在不少關鍵問題上，支持右派意見，與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反右鬥爭中，有些重大會議，他常無故缺席，黨委分配給他的鬥爭任務，很少主動抓，甚或推了不管。並說：“右派言論是資產階級思想，”“對右派完全認為是敵我矛盾是左傾，完全認為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右傾。會相互轉化，”以此來混淆敵我矛盾，並在院務會議上支持右派分子趙長庚一九五七年建築系不招生的主張，對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不加理睬，會後還買糖果請趙長庚召開座談會，會上右派分子指着黨員教師罵，煽動師生併系，他却一言不發。更奇怪的是在他罷工期間，他還主動接見學生，說：“供熱專業在重慶不能辦，我院師資也差。”直接支持了右派分子大鬧併系併專業的陰謀活動。

上述事實說明，張鉄民已經墮落到右派分子的泥坑，完全喪失了共產黨員起碼的條件，為了嚴肅黨的紀律，純潔黨的隊伍，

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根據中央三中全會關於處理黨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經支部大會及黨委會通過，四川省委批准開除張鈇民的黨籍，行政上撤銷其原有一切職務，工資級別從十一級降為十五級。

中共成都市委關於開除右派分子 葉石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葉石，男，四十五歲，山西省汾陽縣人，自由職業者家庭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參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黨。歷任七月劇社社長、魯藝分院秘書、文化服務團團長、晉綏分局教育科科長、宣傳科科長、成都軍管會新聞處長。現任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市人委副市長。

一九三九年因浪費公款十余元，受党内劝告处分。

葉石攻擊省委，否認階級鬥爭，反對階級分析，散布修正主義的反動觀點。

去年三月，葉石在北京參加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時，曾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小組會上攻擊省委，他說：李井泉同志去年二月在省、市級機關黨員科長以上幹部會上，傳達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的報告和主席的報告精神不一致，他認為李井泉同志過分強調了階級鬥爭，對去年知識分子思想亂不亂的估計過分了，他特別對李井泉同志報告中提到的把敵對思想搞臭很不滿意。在宣傳會議期間，他給市委宣傳部肖菊人同志打電話叫停止傳達他在學校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總結（這個總結大體是根據李井泉同志報告的精神作的）。由京回來後，他又召集中學黨員校長開會，

进行学校政治工作会议的所谓“补课”，他在这个会上说：“不能用粗暴的办法一棍子打死，不能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要正视我们的错误”，“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否则与国民党一样），但那个具体单位则当具体分析”，“闹事说明了有官僚主义”，“保护人民，不保护官僚主义”，“香花毒草是要分，但在某些时候，一时划分不清，不要着急去划”，“不能迷信经典著作，要考虑我们的民族特点，传统要求”，“学苏联不结合实际，把凯洛夫、申别廖夫捧为圣旨”，“教育界的最大危险不是修正主义，是机械的学习苏联，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

叶石並在市委宣传部部分科长幹事中间散布“李井泉同志的报告和主席报告的精神不一致”的謬論，在他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宣传部科长馬錫祿、吳其茂、李友竹等在座談杜心源同志准备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的座談会上攻击省委說：

“省委在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导思想上有教条主义”。会后馬錫祿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向省委宣传部写报告，要省委从指导思想上检查“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召开市团代会之前，陈光澤同志向他請示对团委准备的报告有何意見，他說：对新的問題提得不多，主要是能解除对青年束縛、限制，使他們更活跃，他在这次团代会的开幕式上講話时，也強調要解除对青年思想的束縛和限制。

在大鳴大放时期，他进行煽風点火活动，攻击党的领导和党领导的各項运动。

叶石煽風点火的反党活动，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市話剧团的講話。他在講話中說：“过去是敌我矛盾为主，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乱說乱动，有些人就扩大化了”，“过去对敌斗争养成了党员怀疑群众，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敌我斗争，把思想問題与政治問題混淆起来”，“我們党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就是整人，学会了一套整人的方法，因此就

“培养出整人的党员”，“过去我们党对群众太粗暴，很过分，这应是领导上的责任，今天不能再站在统治者地位，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扭转脱离群众的作风”。“偏激是难免的，压了很久怎能不偏？否则就是‘收’而不是放，要放就不要怕偏激”。“我们入城以后，住洋房，坐汽车，层层影响，养娇了干部，这股风是从上面吹来的，所以整风就要先整领导”。“党员因为有组织，党是执政的党，因此党员敢讨便宜，群众则向隅”。“希望大家大胆地谈，以后再不会有肃反那样的运动了”，“以前那些运动，党员都是整人家的，现在人家整我们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过去有些同志犯错误就记一笔账，运动来了就整，这就是‘零存整付’，以后不会这样了”。“这正是鸣放的机会，目的是教育领导，而不是教育大家”。

叶石还歪曲党的干部政策和建党工作。他说：“过去是军事时期，培养的军事干部多。今天大力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几年来发展党员未走群众路线”。

叶石对于省委宣传部批评市话剧团演出的“雷雨”、“桃花扇”极端不满，并借此事公开攻击省委宣传部。他明知话剧团演员对省委宣传部的批评不满，竟在市话剧团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演出‘雷雨’、‘桃花扇’外边意见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演？我是硬着头皮，没有表示态度”。并且说：“有两种艺术，一种是能够立刻产生教育效果的，如在老解放区，演出一出参军的戏，台下的人就踊跃报名参军；另一种艺术是曲曲折折为政治服务的，如‘雷雨’、‘桃花扇’就是”。他主张把话剧团固定下来，建立剧场艺术，不必下厂下乡。这说明他和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是有严重分歧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发生“二师事件”时，市委指示叶石亲自去处理，叶却说：“他们正在找我，叫我去挨打呢。”因而不敢前去。

此外，叶石在去年以前，就先后散布了许多不满和攻击省委

負責同志的流言蜚語，有些完全是造謠。

叶石反党並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虽然入党已二十年，但是，他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場，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名誉地位观点严重，有浓厚的驕傲自滿情緒。他認為党对他的“提拔慢了，参加常委迟了”，因而对党不滿，对副市长名次的排列，他也認為把他排后了，表示不滿意。他願意听人奉承、贊揚，不願意受人批評監督，当党的組織对他进行了批評的时候，他就对党表示不滿。在一九四二年整風运动中党曾对他的历史問題进行过审查，就对党不滿，和党有了距离。由于他的个人慾望得不到滿足，对党不滿，几年来，工作日益消沉，散布流言蜚語，甚至採取造謠的手段，对領導同志进行攻击。他貪圖享受，生活特殊，想做官不想做事。在两性关系上不够正派，曾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一个有政治問題的女护士拉拉扯扯，关系曖昧。一九五四年，有一次他还託人由成都帶皮袄到北京出售。由于他长期缺乏自我改造一直保持着資產階級思想，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一种本能的不滿，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和資產階級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头脑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就活跃起来，接受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影响，这种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相結合，就使他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最后墮落为党內的右派分子。

叶石的問題是在去年八月間开始揭發的。去年十一月市委扩大会上又作了揭發批判。在省委四級幹部會議以前叶石虽然作了几次檢討，但未接触主要問題。並在去年十一月市委扩大会前后收回有关筆記，以圖应付。在省委四級幹部會議成都市小組会上，一开始态度就比較老实，接触到主要問題，三次檢討一次比一次深入。由于党和同志們的帮助，在最后一次交代中除承認了大家揭發的重要事实外，並主动交代了一些問題，也有所批判，态度較好。

根据以上情况，經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中共成都市委第七次

全体會議討論決定：开除右派分子叶石的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工資級別降三級）。

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 謝文炳的黨籍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謝文炳，男，五十八歲，湖北人，中農出身，教授成份，一九四八年七月入黨。原任四川大學副校長、校黨委常委。

一九二八年後歷任武漢大學、成都大學、安徽大學、廈門大學、燕京大學、四川大學英文教員、外國語文教授，一九五〇年後任四川大學校委會主任委員、支部書記、副校長。

一、主要反動言行

1、攻擊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反對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謝在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認為“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就其本質說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已經過時了”，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省委宣傳工作會議的發言中，惡毒地攻擊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反對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他說：“我們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到了這階段，即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一般不僅在政治上起了根本的變化，就是在思想上也基本上具備了社會主義思想”，“思想改造在根本上不應當一生，而知識分子個人主義根深蒂固等等提法，都不恰當”。

2、在大鳴大放時期，伙同校內校外的右派分子李崇等和四川的右派吳昌浩大達等人向黨進攻。一九五七年五月吳大達在

家中与謝进行密談，潘告訴謝“罗隆基說党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是党的小知識分子和党外大知識分子的矛盾”，謝說：“这話有道理”，並認為川大黨員校長外行多內行少。又向潘說：“农院迁院是有問題的，沒有詳細討論，我当时想把這個問題拿下去討論，但戴校長說省委已作了決定，拿下去討論會搞亂”。謝又攻击当时川大整風說：“川大鳴放還沒有很好展开，大家有顧慮，李政委在川大作報告，沒有讓所有的人听，可能是李政委放不开”。一九五七年五月，謝到極右分子李景清（川大總務長，偽四川省府統計處統計長，統計處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家中与李策划向党进攻，他們主要攻击党的領導：“成都市高等學校的黨員校、院長有很多外行，電工學院有五個外行，成都工學院有兩個外行，川大有兩個中學生”，“越是老幹部，宗派主義越嚴重”，“省委對整風沒有決心”。又支持右派分子徐守愚（川大教授）在党委召開的座談會上放农院迁校不當的問題，準備“將省委一軍”。

3、抗拒党的領導，在党内和党外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動。一九五一年，中央和西南局決定由周太玄來川大接替謝文炳擔任主任委員，調謝文炳去西師，當時川大在倪受禧、謝文炳等人的策動下，掀起了一个反對周太玄，挽留謝文炳的風潮。一九五三年秋，中央和省委決定彭迪先作川大校長，謝表示不滿，認為彭不能作川大校長，謝對戴伯行同志作第一副校長也表示不滿，認為应当由他作第一副校長。又先後与省委派到川大工作的魯光同志和趙光榮同志採取不合作態度，在幹部中散布，“戴伯行不果斷，保守，不抓中心工作。丁耿林是個病号，他當党委書記，不僅不能加強党委領導，反而使戴的工作不好搞”。又積極樹立個人威信，与倪受禧互相吹噓，与倪、李等人搞小集團。在今年二月省委四級幹部會議上，還說把李景清划成極右分子，把徐守愚划成右派分子，他“想不通”。

二、斗争中态度

态度不好，在许多问题上进行辩解，检讨缺乏诚意，交代问题不彻底。

三、结论和处理决定

省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批示：将谢文炳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其四川大学副校长职务，保留教授职务，降级（由教授三级降为五级）。

共青团四川省委整风领导小组 对右派分子贺惠君的处理意见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贺惠君，（女）四川成都市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七年入党。历任青年团成都市委学生部副部长，学校工作部部长，青年团四川省委学校工作部部长，现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

贺惠君的错误事实：

一、攻击肃反

贺惠君对党审查她的历史心怀不满，到处散布诬蔑肃反的反动言论。如说：“省委对敌情估计过高，采用的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次肃反，地下党同志都没有跑脱……，这完全是省委宗派主义情绪的错，是扩大化”。还说：

“省委把地下党看得太糟了，总认为地下党的复杂，省委有宗

派主义，整地下党”。她对于去年二月李政委报告中所說的“肃反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很不滿意，並說：“說得那么容易，把別人搞錯了，說个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了。”又說：“現在听說民主人士要复查肃反，才忙着修改結論”。

她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和一九五七年四月先后写了約一万字的“意見”，企圖推翻党对她的全部审查結論，她誣蔑党組織不是“全面的、历史的”看待她的問題，完全否認受了胡風思想影响。她写道：“我的思想与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思想不仅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是毫无相似之处的”，“無論就我的思想面貌和实际行动来考查，是根本沒有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任何跡象的”。她甚至誣蔑說，“沒有看出胡風集团是反革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問題，这是全党的問題”。

她还煽風点火，挑起受审查的人对党不滿。她向黃桂芳說：“你不要那么简单地对待結論，可不要輕易放过。我对結論非一个字一个字的扣不可”。又叫陈賢聰向組織上要結論看，並說：“这是一輩子的事啊！”

二、反对省委去年二月扩大會議的精神，反对階級分析， 散布修正主义的反動理論

她說：“省委二月扩大會議过分強調了階級斗争，硬是有問題，与中央精神不符，省委在这个問題上有教条主义”。又說：“李井泉同志对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精神有抵触情緒，思想不通”，“李井泉同志如果有自我批評精神，就應該公开承認那个會議的偏差。”她反对去年省委宣傳工作會議和省政協會議上印發“草木篇”等材料說：“会上老是發这些文件，好讓这些問題严重得很”。李政委批評了她在政協會上的發言对学生思想缺乏階級分析，她很不滿，散布說：“根本問題是省委和我們对青年的估計看法不一样”。“李政委死死抓住這個問題不放，我看硬有点教条主义”。他把长寿中学团的幹部进行思想工作中有简单

“肅
“說
”

字的
不是
是影
共同
夾際
，。
個人

說：
作一
說：

時間
免：
思想
想那
幾上
個開
缺
年
顧
單

粗暴的缺点至曲說是传达了省委二月扩大會議的結果，並亲自在这一調查报告上加批語說：“对有敌对階級情結的学生，也只能採取长期、耐心的團結教育的方針，不能歧視打击。”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她在川大講課時說：“土改、三反、五反等階級斗争的經驗已經过时了，要放到博物館去了”。

她还散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反动理論說：“大规模的階級斗争既然已經結束，就意味着国家机器作为鎮压敌人的作用就要逐漸減少了”。“南斯拉夫大力精簡机构，运用工人委员会去代替。这样就使国家权力逐漸削弱，国家逐漸消灭，这确是一个理論性問題，南斯拉夫是有他的理論根据的”。又造謠說：“中央正在考虑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的明文規定，党将依靠自己的党员在群众中取得信任，通过他們来实现党的主张”。

三、在鳴放期間，把矛头指向省委，向党进攻

当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賀惠君心情激动，跃跃欲試，写信給范毓英(团重庆市委組織部副部长，与賀惠君是中央团校同学)說：“去年我在北京醞釀着的許多思想、許多观点在这段時間突然成熟起来……好几天来，我总是手痒痒，想写点什么……”。他煽动赵万忠說：“现在是大变动时期，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管是那个，不对就要斗争”。

她到处散布惡意省委說：“省委不敢大胆鳴放”、“省委有顧慮”，“成都市各中学停止鳴放一定是省委的意见”，“省委不讓鳴放完全是錯誤的”。又說省委和各大专科学校党委思想不通，“把中央精神捏着捏着的，不敢与群众見面”。她向四川日报記者說：“四川日报怎么沒有文汇报放得熱鬧？”；向文匯报記者說：“隨便啥事，开始总有人思想不通，你們批評了好嘛！”她曾多次表示要向中央写报告和向邓小平同志反映她对省委的“意見”。去年团中央大学工作部长曾德林同志来成都时，

賀惠君向他“反映”了她對省委的“意見”。章澤同志隨小平同志來成都時，賀惠君又向他反映說：有些大專學校黨委對學生鬧事問題的看法和我們不一致。

四、大量散播流言蜚語，咒罵各級領導同志

她對省委書記李井泉同志進行了許多惡毒的攻擊，想要李井泉同志下台。甚至說：“中央正在下放幹部，若是放個省委書記下來，把李政委調到中央去就好了！”她還攻擊杜部長“沒有主見，李政委說啥就是啥”；戴伯行（川大副校長）“很空虛”；吉喆（四川師範學院院長）“老朽昏庸”；崔雄崑（原團四川省委書記）是“偽君子”；史立言（原川西團委書記）“夸夸其談，作風不民主”；李培根“講話羅嗦，不接受意見，在團省委沒有威信”。

五、與賀天熙、蘇良沛等結成反黨集團，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地向黨進攻

賀惠君為了達到她的個人野心，一貫進行宗派活動，破壞黨的團結。她把黨分成“外來”與“地下”。一九五零年她對牛耕（團成都市委常委）說：聽說武漢就因為老區同志對地下黨同志不信任，現在全體地下黨同志已提出罷工。又對黃桂芳（川大團委書記）說：其實地下黨的同志差不多都有能力，都作了不少工作，而老區來的幹部，工作能力不強，鬧了不少情緒和問題，黨對他們並不怎麼計較，對我們反而過不去。她被提為團省委副書記後，認為是“配角”，還說“副書記可當，組織部長絕不會讓我們當的”。

肅反後，以賀天熙、蘇良沛、賀惠君為首，包括李曉雲（蘇良沛的愛人）、詹大風（賀惠君的愛人）曹淋（賀天熙的愛人）共六人互相勾結，結成了反黨集團，利用“茶會”的形式，大量散布反對肅反，攻擊省委，攻擊領導同志和修正主義的反動理

論，在鳴放期中就更为猖狂，活动和联系更为頻繁。反右派斗争开始，賀惠君听了党内的报告以后，即向其反党集团成员洩露机密，打招呼，並且互相訂立攻守同盟，彼此通風报信，企圖抗拒运动。

本人認識和交代程度：

反右斗争开始后，賀惠君想借口生病蒙混过关。領導上通知她回机关检查，开始也是避重就輕。經過大、小会批判和个别談話，才交代了她的反党思想言行及与賀天熙、苏良沛等結成反党小集团及訂立攻守同盟等主要問題。参加省委四級幹部会后，承認了她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表示願意悔改。

結論与处理意見：

賀惠君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受了十几年資產階級教育，抗战末期，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追求个人出路才参加了党的組織。入党后未認真进行思想改造，反把党的地下工作成績看成是个人的功劳。虽然她一再受到党的重視和提拔，仍然說党对她不信任。解放初期認為党有宗派主义，肃反后对党就更加仇恨，与賀天熙、苏良沛等結成反党集团。在大鳴大放和国际修正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她便完全站到了右派立場，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員之一，与其他成員一道，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地向党进攻。大量散布攻击肃反、攻击省委、攻击領導同志和修正主义的反动言論。因此，賀惠君已自覺成为党内的極右分子。但賀惠君是最早交代他們的反党集团和訂立攻守同盟的人。因此，建議从寬处理。即：开除党籍，撤銷一切职务，由十五級降为十八級，留用察看。

中共四川省委批示：同意将賀惠君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由十五級降至十八級，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中共云南省委財貿大口整風領導小組 關於處理黨內極右分子李文煥的意見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

李文煥，男，現年四十二歲，河北省完縣人，中農家庭出身，本人學生成份，漢族。一九三八年八月參加革命，同年八月入黨。參加革命後先後曾任過科員，會計主任，廠長，科長，站長，辦事處副主任，副處長，處長等職。一九五五年七月由西南區合作辦事處調來省供銷社工作，任省供銷社副主任。

從李文煥的歷史上看，他自參加革命後，屢次動搖，貪污腐化，對黨一貫不老實，兩面三刀、陽奉陰違，舊商人意識嚴重，和私商勾勾搭搭。在軍隊搞生產時，屢次違反黨的政策，破壞市場和軍政關係等。一九五七年阻礙和破壞省委財經會議的決議，反對和篡改黨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和供銷社以採購為主的方針，強調雲南特殊，不執行總社關於開發山區經濟的指示。在反右鬥爭和整改中，利用職權包庇右派分子，並支持其愛人李培芝向黨進攻。在任用幹部方面，重用地、富、反、壞、右，排擠打擊工農幹部。在組織上陽奉陰違，對抗領導，挑撥離間、破壞團結和黨的財經紀律等等。但是李文煥在檢查時，不正視以上錯誤，態度極不老實，採取拖、推、賴、抗的手段，拒絕黨對他的批判和教育。經省委六月十一日批准，劃李文煥為極右分子。

根據李文煥上述反黨罪惡及其態度，財貿大口整風領導小組於七月十日會議上研究對李的處理意見是：開除黨籍、降職降級，工資由原來的十一級降為十五級，撤消現任黨內外一切職務，分

配到基層工作。作什麼工作請省委決定。當否！請省委指示。

中共云南省委批示：開除李文煥的黨籍，撤消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工作，到內地農場擔任生產隊副隊長，工資由十二級降至十六級。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開除右派分子 謝加林的黨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謝加林，男，三十五歲，雲南建水縣人，地主兼資本家家庭出身，學生成份，一九四三年四月入黨。歷任縣委書記，地委組織部副部長，省委組織部處長等職，一九五六年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謝加林是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是未經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抱著個人做偉大事業的不純動機入黨的。入黨後，拒絕黨的改造，一直追求個人的名譽地位，想當城工部長，地委宣傳部長，達不到就與黨离心离德。謝因公外出，別人代理其職務時，就對黨懷疑不滿，以為黨看不起他，不尊重他，不把他當個地委委員。當上地委秘書處長後，又不合“興趣”。任宣傳部長時，仍然不滿說：“一切工作有地委書記抓，我落得個清閒，幹多少，算多少”，工作消極不負責任。謝加林在整風鳴放中煽風點火，向黨進攻。反右派鬥爭中，又支持包庇右派，破壞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也是站在地主、資本家的立場，處處為他們着想，征糧時怕侵犯工商業，對地主則強調“說服”。謝執行的鄭、王反黨集團的一套幹部路線，在過去收買特務時，也把許多特務分子安插在我軍重要崗位上。他的反黨是一貫的，

由来已久的。除其主要反党言行与郑、王一摸一样外，他与郑、王反党头目以及反党骨干分子梁家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九五七年春谢到思茅后，即与梁家互相吹嘘，梁家写给昌恩泽的反党诗，谢甚为欣赏，並为之传颂，继续为梁家拉拢昌恩泽，以便更好的为梁家服务，並为梁家的“精神爱人”“棉花姑娘”题字留念等等。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幹了许多反党的勾当。

(一) 整風鳴放中，煽風点火，破破反右派斗争。整風开始，谢加林在郑、王反党头子指使下把省委的反右派重点，当成了反党的据点。郑敦到广播电台，王鏡如控制党群大口，谢加林则分掌人民出版社，谢在出版社等地完全按照郑、王意图进行反党活动。谢煽动出版社的右派向党进攻說，“現在是大变动时期，阶级斗争已基本結束，内部矛盾突出了”，“大家不要顧慮，要抱着主人翁的态度。国家和党有錯誤，應該提出意見”，“我們没有什么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希望大家开誠布公，决不报复”。到处找右派談話，鼓励右派，頗得右派的信任和尊敬。組織部出現了反党大字报后，郑敦、王鏡如、谢加林、臧野农开了秘密會議，謝等坚决主张不批判，要保护右派的积极性。以后謝又将出版社右派的言論加以总结和提高，提出了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問題”，猖狂向党进攻。反右派以后，謝又以沒有右派，挑拨离間，人人过关，組織幹部下乡，混淆大是大非，为右派辯护等阴險的手法，以圖保存右派实力，破坏反右派斗争。謝离开出版社后才反出了右派，右派分子还来找謝保护。謝到昭通后，仍抗不执行地委关于反右派的指示，使右派反不下去。

(二) 执行郑、王反党集团的幹部路綫。

謝不提工农幹部的培养和提高，而強調“必須克服輕視知識、輕視技术的傾向，充分發揮技术幹部的潛力”，他在組織部所依靠的也是一批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反、坏、右分子。肃反时文山地委拟定刘振江为阶级異己分子，謝不同意說：“地委也

有缺点……”。不同意开除抽大烟的女流氓出党，对右派分子苏
激、李茂奇等十分赞赏，还准备将李提为副处长。学习“八大”
文件时，以谢加林为首的，成立了“提高研究小组”，其成员全
是右派分子。因此，在他们领导下，放出了大量的反党言行。省
委党校的四个教研室五个正副主任及实际负责人中，有四人是有
严重问题的，对这些人，谢都极赞扬。省委决定加强党校的干部
配备，谢则执行郑、王指示，强调党校潜力大，不给配干部，而
将自幼受法西斯培养的李耀东提为党委副书记，陈尔弼（反革命
分子）、童泽民（坏分子）安排到文化学校，并吸收童重新入
党。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郑汝馨，谢也一贯吹嘘。使右、反、
坏分子篡夺了党校、文化学校的一定的领导权。反之，他却丑化
和打击老干部和工农干部，诬蔑农民干部“放债、买田、雇工、
出租土地做生意、抢购粮食者佔三分之一强”。四级干部会
期间，与郑、王一起要打击王静同志，发动干部处同志攻击阎南君、
李清祥等同志，诬蔑阎“机械，头脑简单”，“田芳泰蜕化
了”，企图将老干部致于死地。此外，谢借口干部地方化，说内
地民族自治县要配民族干部来当第一书记，“要把是否能联系民
族群众，真实地反映民族群众的意见与要求，作为挑选与考核民
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与郑、王同出一轍。在稳定提高干部
的方针提出后，一九五七年谢受郑、王的指使到思茅后与梁家一起
布置地委组织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技术干部和民族干部，并
规定了调整第一书记的三个标准是：（1）不称职；（2）文化
低；（3）历史不清。要对全区的县委第一书记作普遍的调整。
阴谋把老骨干撵走，由地、富、反、坏、右来篡夺党的领导权。

（三）不执行党委的决议和指示，攻击省委。

省党代会后，攻击省委不虚心，不民主，并参与臧野农向省
委写的“最后通牒”，在盟以下放到昭通工作时，又拒绝执行地
委对反右派斗争和生产大跃进的指示。

谢加林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开始说自己没有个人主义，最

多只是思想問題，第二次檢查雖戴了帽子，但具體事實全部否定，並說，不是有意識的反黨，他還有正確的地方。領導小組三次要他寫書面檢查交代，抗不執行。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開除右派分子謝加林的黨籍。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 開除右派分子梁家的黨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梁家，反右鬥爭前任思茅地委書記。

（一）污蔑省委領導同志，反對省委領導，破壞地委集體領導。他到處散布說：“宋政委在的時候待人很熱情，現在的省委接近不上”，他在幹部面前到處污蔑謝富治同志說：“謝政委不了解情況，亂批評我們”，“二月地書會上謝政委罵了我二十八次，罵黃天明三十一次”。高喜峰在元江開會，電話傳達謝政委的指示，梁家每看到電話記錄就說：“哼！傾盆大雨又來了”。高喜峰從元江開會回地委，當講到謝政委批評思茅的時候，梁家就惡狠狠的說：“謝政委就是罵人”。污蔑于一川同志，“沒有鍛煉，說話沒有講氣”。他對省委各部門的負責同志，也統統進行過人身攻擊。他對省委兩位主要負責同志這樣的丑化污蔑，絕不是一般的不滿，而是證明他對黨有刻骨仇恨的實際表現。

對省委請示問題，梁家說：“我有一策經驗，請示省委解決問題，要放連珠砲，機關槍，一個接着一個，否則，不解決問題”。他就是用這個“經驗”，為調治伙食問題，接連向省委發了十三份“通牒書”（這是鄧敏在那兒時發的），煽動幹部反對

省委說：“對省委各部和上級黨委不要迷信，思茅區的幹部對省委太老实了，老实人会吃亏的”，“省邊委就是只從民族方面考慮問題，省委宣傳部就是不行，它下發的東西要頂回去，雲南日報沒有思想性”。對調幹部問題，辦農場問題，修建房子問題，地委搬家問題等等，他都煽動過幹部反對省委或者挑撥過省委各部的關係。

他對反黨集團的頭子和骨幹分子鄭敦、王鏡如和謝加林，則是另外一種態度，盡量為他們吹噓，在幹部中樹立他們的威信說：“鄭敦進步快，到晉寧是為了創造当好縣書的經驗”，“王鏡如是老幹部，老縣委書記”，“謝加林忠誠老实，態度很好”。這與他對待省委的態度就成了一個極為顯明的對照。

他對省委一切指示不傳達，破壞地委集體領導，宣揚個人一套，他破壞地委集體領導的主要手法是吸收很多沒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幹部（科長、副部長等）參加地委擴大會，以代替地委常委會。常以“統一思想”為幌子，使別人接受他的反黨陰謀，企圖
為他反黨的工具。

（二）忠實的執行鄭、王反黨集團的幹部路線。梁家在思茅到處打擊老幹部，拉攏、重用知識分子幹部和對黨不滿的幹部，包庇地、富、反、壞、右分子。

一九五六年黨代會期間，打擊老幹部尤為突出。他假傳是省委指示（鄭敦策劃的）驅取地委同意，鬥爭孫明同志，三次鬥爭馬田存同志，企圖把他們趕走。他利用黨代會，除強調選縣委委員要：（1）本地幹部；（2）民族幹部；（3）基層幹部。企圖把外來幹部全部趕走外，還親自跑過普洱、墨江、景谷等縣，策劃以毛崗（右派）代替馬田存，以孫忠秀（本地知識分子）代替薩修桃，以宋光（右派）代替王希聖，企圖把外來第一書記趕走，並散布“老幹部只能當總統，不能當總理，不能放在最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等等言論，在思茅到處流行，使思茅區幹部兼縣委第一書記梁家好受反對，並要梁家好受說：“都是些

干脆不要”。

到处封官许愿安钉子。封王坚为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尹宜公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苟彬为地委委员、文教部长，昌恩泽为副州长（均系地方干部），省委未批准，梁家又挑动他们对省委不满。

到处散布地方主义，拉拢对党不满的人。昌恩泽找他谈思想问题，梁家就送他一首诗：

想当年，	绿叶婆娑；	自归郎手，
青少黄多；	休提起，	提起来珠泪洒江河。

他形容地下时期如何得势，解放后如何倒霉。梁家说：“老干部提级是照顾，新干部提级是应当的”。老干部衰退，蜕化，新干部文化高，进步快，作用大。

（三）积极破坏反右派斗争。在整个反右派斗争运动中梁家的态度是：（1）当右派猖狂向党进攻，反右派还未开展时，梁家积极召开各种座谈会（文教界），煽风点火，组织平反，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右派骂我们之后，梁家一一握手道谢说：“人不伤心不落淚，树不剥皮不会死”，肃反伤了大家的心，我们这些人脱光了衣服都是一样的人，我代表地委向大家道歉”；（2）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思茅区还未認真鸣放，他即违背省委“想尽一切办法放透，把右派放出来坚决反击”的精神到处作报告，大叫彻底反右派，组织右派退却，造成鸣放困难；（3）反右派激烈进行中，他又到处作“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污蔑党对知识分子是宗派主义，党对工人农民是官僚主义，党对少数民族是大汉族主义，党对商业工作是主观主义，并把这一切归罪于老干部的蜕化。他强调“反右派斗争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要和風細雨”，“一面反右派，一面反三个主义”，有意轉移反右派的斗争目标，制造混乱；（4）处理右派分子的时候，梁家又强调“寬大处理，多加照顾”，开右派座谈会，給右派带信去北京控告，並煽动右派翻案。因此，右派称梁家是“思茅区的太阳，

梁家的声音，才真正是党的声音”。

尤其阴险的是他趁分区负责同志多数外出剿匪之机，积极策划破坏分区的反右派斗争，企图把分区领导赶下台，掌握武装，进行他的反党活动。

(四) 对边疆民族政策方针问题上直接和省委相对抗，他积极主张边疆要全寨入社才适应民族特点。他很早就主张地主入社，地主子女入党入团。他重点试办的一个“高级社”，地主分子，民族上层佔一半多。主张扩大自留地。在直接过渡地区对待债务问题和奴隶问题上，他背着省委，对下提出与省委完全相反的政策。对奴隶解放政策篡改为：“奴隶主和奴隶一齐入社，发展生产自己赎身”，对边疆镇反省委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零打碎敲，不放松有利时机捞一把”，故意改为“零敲碎打，碎步前进”的方针。恶毒地是所有这些，都是省委明确提出以后，或他提出经过省委驳斥而仍然背着进行的，显然是反省委的。

对边疆干部，他主张党委机关尤其是党委领导干部要民族化，污蔑汉族干部有统治民族干部的“五条绳子”。到处罵大汉族主义，根本不提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五) 对于农村，他和郑、王一样，到处找阴暗面說，农村有“四死五不够”，“支部是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集团”。富裕农民罵“社会主义是有柴无米，火烧锅底”，他贊揚說：“这才真正是代表了农民的要求”。

梁家的全部反党活动，証明他的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和郑、王完全一样，而且在時間上，手法上也几乎完全是一致的。梁家是郑、王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

中共云南省委批示：开除右派分子梁家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 开除右派分子全明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全明，反右派斗争前任云南省玉溪地委副书记。根据玉溪地委对全明揭发的材料来看，证明全是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之一，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他是为了谋求个人出路而入党的，入党后又时时为着自己的权位打算。在越南时，走私漏税，武装贩运大烟，无所不为。对广东、云南部队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到省税局以后，又拉拢一批反、坏分子，留用人员，以及利用一些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有地方主义情绪的人，排斥打击老干部。离开税局后，又想当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楚雄地委副书记。全明是带着郑敦的指示到玉溪去的，郑找全谈话，说刘世杰同志即将调去学习，暗示地委第一书记将由全担任。之后，全与郑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凡郑来玉溪，全必相随，郑一九五五年在峨山试点三定，全主动要同去。玉溪一有什么事情，即传到郑、王那里，如说刘世杰同志，粮食问题右倾等，都先由郑王那里传来。全调省前，王镜如与全谈过一次话，以后即强迫刘世杰同志检讨，王并说“党内有反对意见，並不是坏事”。全明调昆明后，郑、王仍找全几次谈话。以上材料证明他们反党完全是有计划有目的。

(一) 反对党

1. 反对党的干部路线，仇视打击和陷害老干部，培植其反动势力，全明一方面丑化老干部，散布玉溪地委第一书记刘世杰同志

“粗暴”“专横”“上皇”“不民主”，誣蔑刘接待中央、省委負責同志是“思想意識坏，不正派”，甚至說是“祇屁股”等等。誣蔑尙隴三同志“引誘青年”，“庸俗，思想性不强”等。借中幹之机进行打击，說尙隴三是“托匪”。捏造昆阳县書馮貴东不經地委同意私自將其愛人趙印，列為县委候選人。另一方面組織以全明、刘德俊为首，包括趙文林、楊樹發、姚自強等主要成員，同时勾結右派分子唐茂昌、楊策等一批未經改造的青年知識分子，組成反党集團，企圖篡奪地委領導。早在省稅局期間，全明就依靠了一批反、坏分子（如資產階級代理人何汝昌、反革命分子叶琳等），留用人員（傅雲云等），拉攏和利用一些未經改造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有地方主义情緒的人（方良謀等），排斥和打击党的老幹部（如刘征、閻毅力同志等），其反党活动是一貫的。

2. 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全明总是把个人意见以地委名义在各种會議上出現，以騙取信任，突則他在任何會議中的報告，根本未經地委研究，也未与其他同志事先商量，擅自召开一些會議布置工作，地委決定的問題，全要另外搞一套。

全明上反地委，下反基層支部。他布置地委的三个重点乡要“党社分工，党政分工，主张合作社管生产，支部管思想、管政策，乡政府管行政”。事后据支書反映，乡社幹部扯架，支書連掛党旗的地方也沒有，开会点灯連油都沒有，工作上支部与合作社互相推。

搞極端民主，在粮食三定中，全根本不理發動群众，批判資本主义思想，进行对敌斗争，而是強調領導必須檢討，重点批判，处分黨員，強調扩大民主，搜集材料，对县委区委开展批評。結果改組了支部，候補黨員当了支書。党代会問題上，全通报了郑效的“只有向县委斗争才有民主”的經驗，並說晉宁党代会不民主，要是再不重演。煽動別人說“过去集中多了，一些人整天見不到老婆”，惡意地攻击說“幹部当了家，社員是奴隶，

沒有民主”。

(二) 反对社会主义

1. 反对农业合作化。全明主张合作化运动要少、慢、小，理由是“合作化快了，多了，大了，会影响生产”。强调自愿入社，并且說“为什么要速度这样快，是刘世杰搞个人突出”。实际工作中，他極力反对一乡一社，并且当合作化基本实现后，到处搜集材料，否定成績，大肆攻击“合作化不如单幹戶”“副业管理不如单幹时好”，同时他也进行反“冒进”的活动，痛罵搞合作化是“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盲目性，疯狂性、片面性”。

2. 反对先进生产指标和措施。全明抓住在推广已試驗成功的先进經驗中的个别缺点，即大肆攻击說“幹部强迫农民栽‘梅花菸’这是把人家当作奴隶，自己当作老板”，最后甚至說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並假借“馬繼孔同志說了，生产指标不要規定太死了”，反对地委扩大油菜籽种植面积的決議。

3. 歪曲粮食政策。在粮食問題上，全主张少購多銷。一九五六年公开頂回省委分配的粮食任务，並在县書會議上布置說“要尽量少購，粮食还可以多銷一点”。还一概否定过去的粮食工作成績。

4. 支持同情和贊揚右派言論、破坏反右派斗争。全在外貿局主张把反党大字报轉到各单位去交流，看到攻击謝政委是“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就說“把它标出来”，另一方面，他極力贊賞極右分子黃中流“有能力，可以当科长”，当幹部匯报资产阶级的进攻情况时，全反問“资产阶级是否有点好事”，又說“人家业务熟悉”。划右派时，不同意将曹珍、叶琳划为右派，說“他們不是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对党組領導不滿”。

此外，全明生活也是極端糜爛的，全为了作一件大衣，翻遍

了所有苏联画报，光选择式样就花了两个月时间。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全明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 开除右派分子黄平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黄平，反右派斗争前任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是一个政治野心家，是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早在一九三五年，黄平在横县读初中时，曾以托派观点发表过文章，托派校长商达才也曾指使黄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捧商为伪县长。一九四零年黄任广西省三青团主办的战地服务团的分队长，同时又在广西省伪地方行政学校任指导员，在反动统治时期黄就是反动派，一直到最近，黄在作形势报告时，还为敌人宣传说：“日内瓦会议不能成功，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一九三八年混入党后，又于一九三九年借口升学，自由脱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云南陆良重新入党后，其反动的政治本质没有得到改造，怀着十分狂妄的政治野心要筹划组织所谓“康边边区”，和当时的区党委对抗，在解放军入城以前，即抢夺了丽江，保山，大理三个专区，作为其反党的根据地，大理曾出现“黄平万岁”的标语，黄平也有“滇西王”之称。“跃马苍山十九峰”是他个人野心的总暴露。解放后，对担任保山专员不满，任省农协秘书长时，一方面感到自己是“破帽遮颜过闹市”十分委屈；另一方面，则在农协飞扬跋扈，省农协有第二个“省委”之称。调省卫生厅任副厅长时又说：“这是为官，也非正道”，在工作中继续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除了黄平的反党言行与郑、王反党头目闹出一辙外，他们之

間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联系是通过袁用之来进行的，袁受处分后，郑敦即指示袁說：“你要出去多走走，找黃平，蘆华澤、岳世华等談談”，以后袁經常去找黃平談話，互相散播对党的不滿，共同誣蔑中央和省委。

（一）反对中央、省委和地委。黃經常指責中央衛生部“这不行，那不行，这个會議，那个會議，开得一团糟”，誣蔑中央衛生部賀彪同志的报告沒有思想性，曾公开在会上說：“中央提出的公費医疗問題，联合診所問題，基層組織問題，並未能解決問題，且这些問題是我老早就提出来了的”。提倡对“中央、省委的东西要怀疑，要嗅一嗅”。

省委的負責同志都被他誣蔑过，說：謝富治同志是“工农幹部，沒有文化”，于一川同志是“教条主义”，对郭影秋同志主持对他的审查也極為不滿。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黃对馬繼孔同志所作的报告，公开写信誣蔑是“主觀主义”，“大国主义”等等。黃認為省委宣传部不懂衛生业务，不能領導衛生厅，說：“要检查衛生厅，最好先熟悉业务再来”。黃籍口反对特殊，不經請示，即自行决定取消对高級幹部公費医疗优先照顧以及幹部子女公費医疗的規定。在群众中散布省委不應該成立医务室的空气，並且一再要撤銷它，提出撤銷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組办公室，以實現其个人野心。

在保山时，大軍入城不到三天，黃即誣蔑解放軍如何不好，后来又挑拨地委書記郑刚同志和蔡叶生同志的关系，以达其破坏党的团結，篡夺党的領導的目的。

对基層党委他也反对，不同意向文教党委匯报情况，並說：“管他什么党委不党委”。

（二）打击老幹部，包庇和重用地富反坏右分子。不願听副厅长张其榜同志的發言，当即說：“不要說那么多了”，經常拆张的台，凡张决定的事，黃都反对，並且經常以“老資格”来諷刺张其榜同志。对办公室主任，以不能批閱公文为理由，擱置不

受处分
澤、岳
的 不

部“这
蔑中央
中央提
能解决
央、省

工农幹
主持对
繼孔同
义”等
：“要
不經請
部子女
空气，
室，以

不好，
其破坏

並說：

願听副
經常拆
'米誤
置不

理，不給分配工作。此外，如許光波、王光海等亦被打击排挤，
誣蔑說：“老幹部文化低，能力弱，脑子不够用”。因此得出了
不能依靠老幹部的結論說：“工厂依靠工人，我依靠誰呀”。

黃依靠的都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並經常為他們撐腰，右派分子周之風，蘆華澤，高庆余，特嫌、特务分子戴旭东，郑玲才，李文奎，反动将官李育仁等均是他的心腹。黃准备将右派分子周之風調作衛生厅办公室主任，周划为右派后，黃还認為是好幹部，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一九五七年極力为昆华医院活动为模范单位。李文奎是特务，却安置在人事科，掌握人事科的建党建团工作。最近还准备将国民党中将提拔为防疫站的科长。黃依靠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不是偶然的，早在边縱时，七支队五个团的正副团长和政委均是特务和反动軍官，並吸收大批的地主恶霸，反动軍官，特务分子入党。在保山工作期間，也是如此。反右斗争中，他只組織3—5人来“反右派”，宣揚右派分子蘆華澤“肃幹后进步很大”，有意的破坏反右派斗争。

（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一九五四年，张其榜同志主张从科长中挑选五人参加党组，黃主张副科长（包括預各黨員）以上黨員参加，爭执不下，报省委时，黃只报了自己的意見。平日开会，黃对別人發言不是虛心傾听，而是一一“批駁”。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黃平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 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姜必德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姜必德，男，現年四十岁，云南弥勒县人，資产階級家庭出身，本人教員成份。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入党，曾任边縱排长、指導員、教导員，解放后任副县长、地委組織部长、省委組織部办公室主任，地委委員、县委書記、市委常委委員，箇旧市长。

根据本人交代和几次座談会的揭發，和市人委党組整理的材料，証明姜是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一九五一年姜在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上坚决的反对中央以外来幹部为主和初步整党的方針，得到郑敦的賞識，因此整党后，郑明知姜有严重的問題不能担任党委工作，但为了在組織部培植其反动势力，仍将姜調任省委組織部办公室主任，作为他的忠实帮兇，有“二部长”之称。省委派姜到建水工作时，郑說“为了将来办更大的事”。以后郑又有意的刪去了姜的历史問題，向中央作了隱瞞，使姜进一步窃取了个箇旧市长的要职。姜忠心的按照反党集团的企圖，串連了刘玉振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一) 一贯反对党的領導

1. 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宜良地委时，拉攏同志打击地委第一書記，要求省委撤換書記。一九五四年，姜又借省委組織部写綜合报告为題，系統的全面的污蔑各級党委的集体領導，說：“省委，地（市）委的集体領導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錯誤”，“大

多数县委集体领导不健全，或者多数未建立起来”。

2.反对党的干部路线。姜反对“外来为主”的正确方针，污蔑不少老干部安于现状，不求进步，主观狭隘，不接受新鲜事物，憑老資格吃飯，老干部橫行霸道，目无組織，“蜕化了”認為老干部“过时了”，“可以取而代之了”。实际行动中，对王靜、黃天明、徐珍、賈波、魏青山等老干部就排斥打击和陷害。同时積極組織反党班子，以夺取党的领导。一九四九年派坏分子刘一民任弥勒副县长，把大恶霸姜然送革大学習。专署六个科的领导是反、坏分子，七个县公安局长中，六个是反革命分子，他們安插許多人搞了不少鬼。一九五三年起組織部办公室的要害全为姜的亲信反坏、右所掌握。在建水又勾結右派分子沈紹穎等反抗地委，在箇旧也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王文华，地主恶霸艾明等視為亲信，加以重用。

3.反对整党。捏造“党的政策貫徹不下去，主要是幹部思想作风問題”，“宜良党的組織不能說是被坏分子所掌握”等為理由，反对云南的初步整党。經過严厉批評后，表面上承認整党是必要的，但一方面又以拖延处理案件，另一方面要整老干部的思想作风問題，破坏中央、省委对云南地下党的整頓。

（二）反对社会主义

1.反抗优先發展云錫国营企业的方針。並始終抗拒省、市委不願將地方工业移交云錫的決定，說“地方工业是沒娘的孩子，云錫欺人太甚，是大魚吃小魚”。提出“与云錫斗争到底的政策”，鼓吹地方工业的同志要在下面頂，不要軟呼呼的，要狠狠的燒，揚言“是斗争的时候了，是决策的时候了”，与資產階級分子李勉若策的“坚持与云錫斗争到底，与国营經濟斗争到底”，如出一轍。

2.污蔑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为对立的資本主义的城乡关系，說“农村工作同志支援工业城市是：有多余就支援，沒有多余的

就不支援，因而对支援城市就不够积极，有的甚至采取若干限制出口的办法来保证本地需要，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城市的封锁”。造成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恶化。

3. 反对农业合作化，和计划供应。姜把一切罪过均归罪于合作化，污蔑“稻草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农民所有稻草大多折价入了社”，污蔑“蔬菜供应也因蒙自商贩组织起来集中收购而一度紧张”。

(三)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姜长期以来反对党的肃反政策，一方面散布“用群众运动搞肃反不应该”的谬论，另一方面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安插反革命分子重要职务，反革命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如一九五七年省委决定打击地富的反攻倒算，姜抵触，开始消极应付，继而拖延不管，说“忘记了”。对市人委机关肃反审干从来不加问闻。拖延不写有关证明材料。此外破坏反右派斗争，以图保存其反革命实力。

(四) 姜历史上就是反革命分子

姜一九三八年参加国民党，一九四〇年混入我党后，未经请示报告，又于一九四五年参加三青团，并任三青团筹备处宣传股长和书记，发展了三青团员五十多人，并要所有担任学校行政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均参加三青团。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姜又参加民社党为宣传股长，同年任弥勒县府社会科主办科员，曾从事“防范异党活动”。姜在解放后，仍一直纵容包庇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初三青团主任杨树琪到宜良找姜，姜不仅不逮捕杨，反而把杨放走，并介绍到军分区去找他哥哥。此外安插了青年党省委委员王以和为专署工商科副科长，土匪头子孔庆溢为公安处处长，为反革命分子张家漠说情等等。这些事实说明，姜是反动党团员骨干分子，解放后并无悔改表现，一直与人民为敌，继续进行共

反革命活动。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姜必德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 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董学隆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董学隆，男，现年三十二岁，云南人，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共产党员，团中央候补委员，团云南省委常委、副书记，团校校长，极右分子。

一、主要的右派言行

（1）反对党的领导。诬蔑省委领导同志有特权，是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压服青年，在全省团的干部中煽动以“三顾”的精神（顾着不要党籍，顾着不要乌纱帽，顾着不怕蹲监牢）去反党，鼓励以“三打祝家庄”和“大破东平府”的精神去向省委顶板。

（2）篡改共青团的政治方向。在团员和青年中，反对阶级分析，散布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提倡个人主义，支持云大陈孟如（右派）师院舒世衡（右派）的反动言行，在学生中提倡“言志”。主张团的工作脱离党的中心工作，以文化活动为团的中心工作，企图把共青团改为资产阶级的文化俱乐部。

（3）组织反党小集团，蓄谋篡夺团省委的领导权。拉拢何永琼、杨一堂、刘增羽、何岳俊、范淑等，组织反党小集团，到处煽风点火，率领小集团成员大举向党进攻。

二、反右派斗争中表现

交代不彻底，大部分是在群众揭发后被迫承认，对自己错误认识不够，但表示愿意低头认罪。

三、处理意见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中共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党组 关于右派分子白晶五的组织结论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白晶五，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的反党言行，早在整风之前（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给省委的一封信（万言书）中就已经全面地、完整地暴露出来了。平时也有一系列的反党言行。直到整风运动开始后，还继续放毒。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主要是：

（1）攻击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抗拒党的领导，与党闹分裂，把邮电部门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白晶五竭力攻击党不重视邮电工作，他不仅把中苏两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而且污蔑我国邮电工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苏联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相当重视邮电，而中国特别是贵州党还不太理解这问题”，这实质上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美化并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他反对党对邮电工作的统一领导，污

蔑省委是“大庁主义”，“中心工作唯一主义”。“只相信自己领导下的那一伙人，不認識邮电系統这一家人”，並声称自己是“党內的外路人”，公然与党分庭抗礼。他又攻击中央邮电部是个“庞大的、拥有人数众多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机构”，掌握不了邮电工作的“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不管貴州小省，指导思想是“大省主义”。完全否定了中央邮电部的领导作用。他宣揚外行不能领导內行，認為党“对科学、对新事物还表现得盲目无知”，不能领导这个“一年入不了門、三年不能熟悉”的邮电工作，只有他們那里长期“往一个眼上鑽”的各种“专家”，和連續搞“一代兩代三代”的旧职员，才能搞好邮电工作。由此，他在工作中，經常表现出对党的领导抵触和不满，对省委負責同志的指示，常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当面表示尊重，一出大門就詆毀领导。他用極其恶毒的言詞謾罵领导，直至中央負責同志。他不仅自己抗拒领导，而且还煽动邮电部門幹部和他一道进行反党。他利用某些幹部对工資和其他方面的不满情緒，挑拨他們記恨省委，向省委进攻，自己則从中作好人。他公然在分片邮电會議上，發出反党動員号令，指示县局长，“对县委不能百依百順，如果县长批評你是本位主义，你就告訴他这是社会主义”。他对县、市委抽調邮电幹部去搞中心工作及調走邮电幹部，也極其不满。总之，白品五既抗拒“条条”的领导，又抗拒“塊塊”的领导，力圖使貴州邮电部門，成为独立王国。

(2) 歪曲党的方針政策，特別是对幹部政策进行了系統、全面的攻击。

白品五污蔑一九五六年，大胆大量提拔幹部是“拋开了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避开老骨幹，抓新幹部”，“热火朝天象發瘋一样狂”，完全否定了一九五六年提拔幹部的成績。特別是，无中生有地攻击省委在执行幹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硬說省委“拿有色眼鏡看人”。对邮电幹部“有偏見、有成見”，抓住一点缺点，“就蓋棺論定終身”，或者“当小辯子來拉，以此來代替挖

制汽車的方向盤或唐三藏的緊箍咒”。對大廳局的幹部是“連升三級，全套升官”，而郵電部門則未提到一個，這是“大廳主義”和“中心工作唯一主義”，把郵電幹部“置於耳後了”。他對省委和接近省委領導的同志，盡情加以污蔑和丑化，說貴州省委“興活動”，某些領導幹部在大量提拔幹部中“趁機發展個人崇拜”。罵省委領導“褲當里藏着狐狸尾巴”。罵接近領導的同志有“太監作風”。他甚至更全面的攻擊說：“共產黨就是宗派集團，如果不整風，共產黨就要變成國民黨。”這充分說明他和黨的關係，已完全處於對立狀態，他在攻擊省委有宗派主義的同時，還攻擊省委鬧地方主義，說省委在中央部門調動幹部時，“鎮壓條條調動人的權利，施塊塊的威風”。企圖挑撥省委和中央部門的關係。其用心是十分惡毒的。

白晶五攻擊幹部政策的手法是巧妙的。他以“主持公道”的面目出現，表示維護本部門幹部的利益，盡力夸大吹噓本部門幹部的才能，以籠絡人心，培植私人勢力，作為反黨資本。他借以說明省委有意不提拔郵電部門的“優秀”幹部，同時，對其他部門的幹部加以污蔑，並以此作為指責省委宗派主義的根據，他宣稱，郵電部門幹部是“資格老，品質好不會鬧這鬧那，整日埋頭本分事，兩耳不聞外家聲，是早已樹立了正確人生觀和事業心的，吹拍拉扯的人到不了這裡來”，“論業務有各種公認的專家”。對別的部門的幹部則污蔑為“睡覺大王，怠工專家，按酬付勞分子。所提拔的幹部，憑什麼也比不上郵電部門的幹部，郵電局的一個科長也要比省委副部長”。還狂妄無恥的自我吹噓說：“憑政治，憑理論，憑業務知識，憑半生過來對黨的足跡，憑某些認識水平，省委常委都不在他的眼下”。他瘋狂地要和省委領導“換換班試一試，看誰行，誰不行”，他甚至威脅黨說，不正確的幹部政策已給郵電局領導帶來不團結了，如再不滿足他的個人慾望，就“不能團結積極因素繼續前進”，“就會起紛爭，就會亂，就會葬送了革命事業”。更惡劣的是，他竟把黨

看作是封建王朝的統治階級，声称自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白晶五完全丧失了党的立場。

白晶五对于党的其他方針政策，也有許多抵触和不满，並且阳奉阴违地拒不执行党的方針政策。整風中，他站在反冒进的立場来看待省委宣传會議上放出的意見和右派言論。認為“都是一九五六年跑得太快搞出来的”。他不贊成用大鳴大放、大字报的方式进行整風。他害怕轟轟烈烈的鳴放运动，主張組織武装到局站崗，而另一方面，他又数次用无原則的話動員群众鳴放，叫大家“不要怕說話，再放也放不出反革命”，实际上是起了煽動的作用。中央号召幹部参加体力劳动时，群众热烈討論，他却說“这样作不經濟”，並說周省长参加体力劳动，“是形式主义”，否定領導幹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意义。在历次对敌斗争中，一貫以严重右傾的觀點認為邮电部門沒有問題，但事实上，肃反中查出了二十二个反革命，整風中出现了二十九个右派分子。他对粮食統購統銷也有不满情緒，一九五四年他从山东家乡回局后，把实行統購統銷后的农民生活，描写得很紧张，很苦。

(3) 对国际問題發表修正主义的謬論。

白晶五否認波匈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暴乱，而認為是“由于波匈两国党的領導人有严重的錯誤，长期不改，人民生活苦，連煤都沒燒的，所以人民起来暴乱”。对于一九五三年的柏林事件，也同样散佈这种論点，認為“主要是由于民主德国只注意發展工业，使粮食成問題，所以群众暴动”。白晶五这种論点是和国际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走狗铁托一腔一調的。

(4) 完全丧失立場，多次包庇坏人坏事，竭力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的罪行作辯护。

据群众揭發，他前后包庇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共有十余人之多，肃反中，他对罪恶深重的大汗奸馬德阴的处理主張重罪輕判。当肃反战斗小組斗争坏分子刘体智时，他为刘帮

腔，並給以安慰，認為群眾“鬥爭過火”了。致使群眾憤憤不滿。他從北京高級黨校學習回來後，向黨算了四筆帳，一是把一九五六年的躍進說成是冒進，否定一九五六年躍進的成績；二是批評局里其他領導同志“掌握肅反政策太不穩”，這也錯那也錯，為反革命分子算肅反帳，否定肅反成績；三是批評幹部提多了；四是批評知識分子提錯了，並把自己主張提的一個壞分子也算在黨組的帳上。他又追溯過去歷次運動，說“幾次運動得罪了幾批人”，對敵人深表憐憫。整風中，他明目張膽地包庇右派分子姚繼虞，不同意劃為右派，甚至還把姚當積極分子使用。平時夸姚是“紅色專家”，私自批准以姚為首的一批人（大部分是政治上有問題的人，其中六人已成右派）成立“貴陽市郵電青年文學創作小組”，在內部刊物“貴州郵電”上出文藝副刊（登過一些毒草），實際上是幫助他們建立反黨基地。他還提出把另一個右派分子作為中右標兵。他對局里的一個壞分子不僅明知不問，當群眾揭發時，還為其出主意掩蓋犯罪行為。他任意吸收有政治問題和對黨有仇恨的人參加工作。並多次主張把一些政治歷史有問題的人吸收入黨。白晶五已完全和敵人站到一個立場上去了。

（5）一貫散布流言蜚語，誹謗、打齒別人，抬高自己，製造個人崇拜，甚至拉拉扯扯，進行宗派活動。

白晶五多年來經常丑化、中傷其他領導同志，抬高自己，其攻訐已達到有你無我的地步；並且不惜降低黨的威信來樹立個人威信，使群眾崇拜自己。他對提意見尖銳的人，千方百計的進行打齒報復，對一些會吹會拍的人，如羅共惠、姜志剛就進行拉攏互相勾結，排除異己，他們對匿名寫大字報的人竭力追究，蓄意打齒報復。一九五二年羅共惠（原運輸處副處長，右派）去麻江土改時，侵吞鬥爭果實，並把毒品帶回貴陽，白晶五知不問，包庇了事。白晶五經常當眾夸奖聶、姜，工作上一貫重用；聶、姜也對白崇拜到五體投地。白晶五封官許額，還對關提拔的張

金盘許諾局長職務，並準備調他到學校去學習，使張十分崇拜他。

白品五之所以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有其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白品五是剝削階級（富農）家庭出身的人，有濃厚的封建剝削階級意識和強烈的名利觀點，他曾說：“我假如不參加革命，也許成為阿訇”（他父親就是一個回教阿訇）。這就充分反映了他的領袖慾，他完全把這種剝削階級思想帶到革命陣營和黨內來了。他入黨近二十年，但是他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不僅長期未得到根本改造，而且有了滋長和發展，一直把黨的事業當作謀取個人名利的工具。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历史緊要關頭，他終於叛變了黨。

白品五，一貫計較地位，待遇，狂妄自大。他不僅恬不知恥要當九級幹部、大省局長、設計院長、省委常委；而且象資產階級分子一樣愛錢如命，把交工會費、房租水電費甚至黨費都看作是損害了他的個人利益。他不論建設貴州的功勞與苦勞，要省委多給他幾個錢，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他“更積極更愉快的貢獻終身”！他甚至指使其他上北京開會的幹部，順帶作買賣賺錢，可見其損人利己思想之嚴重。當他卑鄙的個人慾望得不到滿足時，就對黨、對領導記取仇恨。遠在一九四一年，因違犯俘虜政策而受到撤銷縣長職務和留黨察看處分時，就對當時處理這一問題的周桓同志長期記仇。貴陽解放不久，省郵電局違反軍管會禁令運銅板出省，被登報批評，他也認為是傅家選同志（當時的建設接管部長）故意給他難看，也記取仇恨，一九五六年大批提拔幹部時沒有輪到他，就更加和黨對立了。一九五七年向省委寫的“萬言書”，便是他歷年仇恨黨仇恨領導的思想總暴露。同時，他長期以來把黨和人民所賦予他的信任當作個人的驕傲資本，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比這比那，總認為別人不如自己，而在地位、待遇上則認為自己是吃虧了。他宣佈，不管憑哪方面，“我

对某某常委或某某执委並不佩服”，实际上，他早已抛开了党的事业，成了混世主义者了。他上下班經常迟到早退，批閱文件时連内容也不看，不深入群众。學習上也很虛夸，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憑兴趣而學習”，“学一点当資本”。他愈来愈喜欢別人对他的頌揚和吹拍，不願听逆耳之言，甚至对下級幹部採取順者昌，逆者亡的手段。总之，白晶五长期以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和党的組織原則相对抗，把个人駕于組織之上，其实質是披着馬列主义的外衣在党内制造混乱。企圖削弱和取消党的領導作用，以突現其个人野心。

党对白晶五的挽救是仁至义尽的，曾一再等待、啓發他自觉向党交代，而他却始終坚持反动立場，执迷不悟，抱着蒙混过关的态度。去年十一月省委四級幹部會議上，他先是怕把他划成右派，后見批評其他同志，則幸災乐禍的說：大厅局的“天之驕子，党之驕子”也犯錯誤。从去年十二月起，开始在党内对他进行批判，党仍希望他回头，而他却認為对他的批判是“小題大作”，故意和他“过不去”，在今年二月份省委五次扩大会上，党又一次給他悔过机会，而他却繼續玩弄两面手法，大会检查，小会推翻，死抱着腐朽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不放，並繼續放毒說：“我对党有很多疙疸，有过去的，有現在的，怎么过也不是，日子过不出来”。又說：“一封信戳的禍，要不一輩子也弄不着我”。声称要上北京去“問毛主席党内問題能不能提意見，党内有沒有民主”。他甚至重复“万言書”中仇恨党的烂調，繼續向党进攻，还鬼鬼祟祟地偷听小組會議情况。六月中旬指令他停职反省后，在群众中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后在省委主持召开的厅局长會議上和全省第十一次邮电會議上进行了严肃和徹底的批判，經過多次批判，才不得不低头認罪。

根据以上情况說明，白晶五是长期隱藏在党内的一個老右派分子，經我局党組及整風領導小組研究，給予撤銷党組書記及局长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三級（由十一級降为十四級）的处

分。

(已經中央批准)

山东省人委整風领导小组 关于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 集团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編者按：山东省人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到八月下旬，在整風补课中揭發出一个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山东省委对这个反党集团提出了处理意見。确定王卓如（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张耀曾（省委候补委員、財貿部副部长）、郭士毅（省人委計委副主任）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袁子揚（省委委員、省人委副省长）、續中一（省人委財政厅厅长）、曹戎（省人委計委副主任）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中央同意山东省委对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見。

山东省人委整風领导小组根据山东省委指示，自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以来，連續召开了各厅、局党组書記参加的整風會議，各厅、局同时召开了黨員幹部参加的整風會議，以大揭盖的方式对領導幹部实行整風重点补课。通过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的方法，从揭發批判王卓如包庇極右分子郭士毅問題开始，进而揭發了以王卓如（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为首的右派反

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除王卓如以外，还有袁子揚（省委委員、副省长）张耀曾（省委候补委員、財貿部副部长）郭士毅（省計委副主任）續中一（财政厅厅长）曹戎（省計委副主任、物資供应局局长）等五人为骨干分子。他們分布在財、粮、貿、計委部門，培植了一批坏分子，排挤了一批不順从他們的幹部，並以此作为反党基地，搞独立王国。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几年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党、反对省委、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們有两本賬，一本是假的，用来頂抗省委的，一本是真的，是对省委保守秘密的；他們有两套編制，两个計劃，省委的決議指示他們不执行，自己另外搞一套。他們利用財、粮、貿、計劃方面的权力，反对社会主义建設，阻撓、破坏工农业生产。他們的罪恶活动，已經給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造成不可估計的损失，带来严重的恶果。现将主要事实报告如下：

（一）反党、反省委領導，揮資產階級白旗

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王卓如，他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远在向明領導时期，王卓如是反党反中央鬧独立王国的一員勇將，王卓如自己也承認他是“向明錯誤的積極支持者和执行者”，“特別在財經方面曾供給了向明不少反党反中央的炮弹”，因而取得了向明的信任和重用。王卓如自己說：在向明时期“可称工作順利，心情舒暢”，自清算向明錯誤之后“是背了包袱参加省委”的。虽然新省委对王卓如在向明时期所犯錯誤抱着不咎既往，等待自覺的寬大态度，仍然予以信任重用，但王卓如对省委則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距离”，“不是同心協力”，而是“离心离德”，由猜忌怀疑以至發展到公开頂抗。对新省委为貫徹执行中央方針路綫的一切措施，总是抱着消極怠工和反对的态度。

王卓如是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除掌握省人委全盘日常工作外，还分工負責計劃、財、粮、貿各部門的領導。几年

来他是利用这一分工领导的职权，依靠反党集团的亲信部下，和省委分庭抗礼，根本不听省委的话，公开反对省委领导，抗拒省委的决议和指示。省委通过的工农业生产计划，他们不研究执行，却是背着省委去另搞一套计划，另提一种指标数字。他们认为省委提出的数字是“号召数”、“政治数”，可以不执行的，而王副省长提出的才是“实际数”。他们只听王卓如的话，不听省委的话。袁子扬说：“党委领导是一句空话，而财贸工作是实打实的。”省委负责人传达的任务数字，只要王副省长“不知道”，王副省长不点头的可以不听。省委通过的整编方案，要求财贸系统以革命精神实行全面整编，精简人员，充实生产。王卓如却说“革命只能向前，不能向后”，拒不执行省委意见，另搞一套编制。郭士毅还想和省委平行下达编制方案。省委要求财政方面增加工农业基建投资，该办而可办者，应积极办，不要造成财政节余。王卓如等反党分子听了以后大为不满，讽刺省委这是想吃“超支饭”，“冒险饭”。为了反对省委的意见，他们竟敢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开支已“三空一赤”。实际上财政却年年有节余，一九五六年节余一千七百多万元，他们却谎报说超支四百八十多万元。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年财政节余的总和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总数的二倍半。他们甚至私立金库，焚毁账册，向党要权术，搞阴谋。他们对党保守秘密，讲斗争策略，把党委当外部，当外人，拒之于千里之外。他们所领导的财政厅实际上已不是共产党的财政厅，而是国民党的财政厅了。在粮食问题上，省委一再指示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适当多给农民留一点口粮、饲料，以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但王卓如等却主张“多购少销”，攻击省委是“片面群众观点”，他们并把农民的饲料地、种苜蓿种瓜菜的地都折粮定产计购，人为地增加了山东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由于饲料缺乏，生猪长期发展不起来，并一度下降。粮食厅还制造粮食假账，瞒哄省委，在粮食紧张时将粮食扣在手里不发，加重粮食紧张。一九五六年省委召开农业

積極分子大會，第一書記親自主持，號召開展兩千萬畝的高額丰產田。王卓如却在緊接着召開的財、糧、貿、計劃方面的幹部會議上，大談其平衡論、生產發展速度必須服從財政能力論，和省委唱對台戲，並公開誣稱省委召開的會是“牛皮大會”，與會的各地幹部則稱王卓如主持召開的會議是消極分子會。

王卓如負責政府全盤日常工作，幾年來從未在政府系統幹部中認真傳達學習中央指示和省委決議，不進行黨所號召的政治運動，不引導政府幹部圍繞黨委中心任務開展工作，發揮黨的專政工具——政府工作的特殊功能。相反，他們認為中心工作是黨委的事，與他們無關。他們引導政府幹部和黨比關係，比權力，爭領導，煽動政府幹部對黨委的不滿情緒，挑撥政府與黨委的關係。對於政府如何執行黨委指示，黨委如何成為政府的領導核心等重要問題根本不提。相反，他們提出什麼黨委抓什麼，人委抓什麼，黨委與人委如何分工等奇怪的問題，要求與黨委分權。在這種指導思想影響下，使不少下級政府與黨委的關係不夠正常，部分政府工作人員對黨委的領導存在糊塗觀念，使政府工作迷失方向，缺乏政治掛帥。

王卓如利用其常務副省長的高位和財、糧、貿、計劃的大權，在各種場合公開攻擊省委的領導。刮“台風”時他們就利用“台風”，反冒進時就利用反冒進，幹部有地方主義情緒時就利用地方主義，工作上出現缺點時就抓住缺點，總之利用一切時機，積極反對省委。他們這個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隨之唱合，暗箭明槍兼施，散布流言蜚語，對省委的主要領導人舒同、譚啓龍等同志評頭論足，實行人身攻擊，說什麼“南方人會耍手腕”。他們蔑視中央的領導，和中央各部門商討問題時，不是心靠心，據實反映情況解決問題，而是宣揚什麼“一是要得多，二是吵得兇，三要會外活動”的做法，以顯示其頂抗之能事。他們這種壞作風，壞意識，確實是帶壞了不少幹部，傷害了不少同志，在政府部門中造成了一種極不正常的風氣。

高 額 丰
幹 部 会
， 和 省
与 会 的

統 幹 部
政 治 运
的 专 政
是 党 委
力， 爭
： 的 关
爭 核 心
(委 抓
。 在
： 常，
： 迷 失

叔，
“ 台
地 方
积 極
明 槍
志 評
變 視
反 映
三 要
坏
中

总之，他們心目中沒有党，沒有省委，所有的只有他們的反党集团，只有他們的王卓如。他們千方百計攻击省委的領導，把省委貶低得不值一錢；而把王卓如抬得高高的，吹捧王卓如一貫“正确”，“有威望”，“有天才”，“有修养”，“有鍛炼”，是“財經专家”。总而言之，在他們心目中，只有王卓如才能領導政府工作，要在省人委插上这面白旗，反掉省委的領導。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张耀曾就公开的說，“省委就在省人委”。可見其反党反省委明目张胆狂妄跋扈，已达極点。

(二) 反对社会主义，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設

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从他們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場出發，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当然毫无兴趣，而是处心积虑找寻一切机会加以反对、阻挠和破坏。他們反对社会主义，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設，主要是抓住財政、計劃、財易这三道关卡实行拖、压、叫、頂、杀价、不給錢、造假賬甚至直接破坏的办法。当一九五五年——五六年全省农业合作化如火如荼地發展势不可当的时候，王卓如等右派集团抓住貧农合作貸款这一关来阻挠合作化，他們制定了繁瑣的借貸手續和貸款条件，想尽千方百計不把貸款發到貧农手里。当时合作社已全面地組織起来了，就是沒有資金，貧农領不到貸款，富裕中农譏笑他們。这对当时农业合作化是起了一定的挫伤作用的。当一九五六年秋合作社出現一些缺点，农村中出現反合作化台風时，这个反党集团就成为刮台風的窩子，王卓如、袁子揚、张耀曾、郭士毅等公开叫嚣“合作化速度快了，社办大了”，“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合作化后农民穷了，連买油盐的錢都沒有了”，“农民吃不上粮食，穿不上衣服，混身露上露下”，並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总之他們主张开倒车，分小社，維持单幹戶。同样，他們也反对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省委兩次決定要王卓如負責對資改造工作，王卓如竟是“忘記了”，長期拖延對資改造工作的領導。相反，王卓如、袁子揚等對於資本家的生活、利潤却倍加關心，一再叫喊說是“資本家大量垮台、蝕本、吃光”，“我們和資本家的關係太緊張了”，“對資改造太快了”，“違背了逐步改造的規律”，王卓如在資本家面前說“現在的資本家貢獻大於剝削”。他們在稅收工作上、市場管理上都為資本家大開方便之門。幾次撤消對自由市場的管理機構，放棄對自由市場的管理領導。他們歌頌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贊揚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卑視、仇視國營商業。同時他們極力贊揚資產階級的民主，公開主張要向美國的民主學習。

這個反黨集團把持了財貿、計劃大權，凡是省委及生產業務部門所提出的有關工農業生產建設項目，只要是不合他們心意的，到了他們那里就成為難過的關卡，王卓如不點頭的，就休想列入計劃；即使列入計劃，財政廳也不給錢，所謂“承認項目不給錢”，“當面不頂背後挾住”，這是張耀曾自鳴為反省委的鬥爭“策略”，鬥爭“藝術”。而袁子揚則更為直接了當，公開頂抗，袁子揚說：“他們（指省委）都不懂，一頂就頂回去了。”他們反對省委參與計劃財政安排，王卓如說：“書記們都出題目，我的計劃怎麼安排？我這個家怎麼個當法？”“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沒有發言權”，“誰出題目誰拿錢”。張耀曾就曾公開揚言，財政問題要“一人當家一人作主”，反對省委領導。許多有關扶助工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措施，省委決定了的，他們拒不執行。省委決定要預購小牛，賒銷化肥、水車、蒙古馬，補貼手工業社製造簡易提水工具所受虧損，山區農民口糧適當增加，糧食包購，超產歸社等重要政策，在當時對推動鼓勵工農業生產、保護生產積極性、緩和黨群關係都是有重大作用的，但他們都以各種理由拒不執行。更嚴重的是他們竟擅自決定砸毀水車當廢鐵，直接破壞工農業生產，打擊工人生產積極性，政治影響極

是“忘記子揚本家”，在資工市場爭，同生學。

业务、意思、打算、斗争、顶”。

題知開多不

(三) 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形成及其对检查的态度

以王卓如为首的这一右派反党集团的形成，已有长久的历史。以王卓如自己的話來說，除了他們都存在着共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以外，还有他們共同的阶级基础。王卓如称之为“自在的阶级感情”，“物以类聚”。他們碰在一起均是“很快关系就搞的很密切”。王卓如說他在“思想上就喜欢这样的人”，就自然地形成反党宗派集团。事实也确是这样：这个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王卓如，出身于地主家庭，历史上曾叛党自首，写过反共宣言，土改中犯富农路线錯誤，向明领导山东工作时期积极参与向明反党反中央的活动。这証明，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张耀曾，也是出身于大地主恶霸家庭，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特务，弟弟是国民党区分部書記，本人是国民党政府职员，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冀鲁边区时，和大叛徒邢仁甫一起进行罪恶活动。他还破坏过土改，包庇了大批反革命、坏分子。张耀曾自一九四二年起即在王卓如领导下工作，对王卓如極尽吹捧逢迎之能事。王卓如对张耀曾的政治历史情况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一直对张加以包庇，使张逃避了党对他的历次的政治审查，一九四四年中央曾电示王卓如对张的政治历史問題进行审查，王欺騙中央說沒有問題。一九五五年省委要审查，王卓如为张写保票說“张耀曾忠实于党，政治上可以信賴”，以致使张能够长期隐瞒他的反动身份而扶搖直上。

郭士毅，也是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他一貫揮霍浪费，三反前曾贪污受贿，和私商勾結，出买經濟行情，使国家蒙受巨大損失，罪該判刑。也是个阶级异己分子。王卓如对这样的分子自然是支持包庇重用，三反中保护郭过关，三反受处分后連提四职、四級，一跃而为計委副主任，成为王卓如在計委实行反党掌

握大权的代理人，最后成为計委内部右派集团的头子。

袁子揚也是出身于沒落的惡霸地主家庭，是怎样入党的，至今尚未查清。他是个一貫驕傲自大目无組織狂妄到頂的人，王卓如称他为“敢說、敢作、魄力大”的反党猛将，王卓如賞識他，共同結为反党集团这也是必然的。

續中一，也是一貫工作消極、对党不滿的分子，曾放縱包庇反革命、坏分子多人。他是張耀曾选择而又为王卓如器重的幹部，是張耀曾調离財政厅以后，把持財政厅搞反党活动的接班人。

曹戎，是一个屡犯錯誤、品質恶劣的坏分子。土改中包庇地主，三反中因严重违法乱紀受撤职处分，一貫欺上压下打击报复。也是为王卓如所看中一手包庇下来並加以提拔重用的人物。

总之，他們都是一丘之貉，是一窩子階級異己分子、坏分子和地主資產階級在党內的代理人，因此相互之間，都是一見鍾情，有共同的異己階級的思想感情，惺惺惜惺惺，心心相印，互相吹捧，互相包庇。他們以王卓如为反党集团的領袖，称王卓如是“英杰”，是“有經驗有威望的領導者”。王卓如也以他們为心腹，为謀士。他們从地主資產階級反动立場出發，抱着个人野心家的慾望，共同結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他們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互相獻策，各显其能，共同謀划，上下呼應。

伟大的整風运动开展以后，群众觉悟提高了，他們的反动本質被揭露了，但他們却不肯洗心革面向党認罪，而是实行頑抗。当郭士毅的右派面目被揭开之后，王卓如亲自出馬为其辯护，声称“不希望郭士毅有問題”，並且顛倒黑白，誣称計委对郭士毅的斗争是“个人打击”。王卓如多次抗拒省委決議，拖延对郭士毅問題的揭發檢查，並压制群众，封鎖消息，全國一手遮天，蒙混过关。当省人委在省委坚决領導之下，揭开郭士毅右派面目並进而展开对王卓如錯誤斗争之后，这批反党集团分子更为恶毒地

诬称这是“譚啓龙对王卓如的报复”，互訂攻守同盟，企圖控制內部，頑抗到底。他們一再告誡為他們所掌握利用的人“說話小心”，要“一不搶先，二不落后，三不要叫大家看出包庇王卓如”，並對做具體工作的幹部進行威脅利誘，要他們為這個反黨集團保守機密，……可見這個右派反黨集團態度極端狡猾、惡劣，這個反黨集團中的郭士毅、張耀曾等至今不肯交代任何東西。

（四）對以王卓如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骨幹分子的处理意見

王卓如是這個右派反黨集團的為首分子，是組織者與指揮者，這個反黨集團的一切反黨活動，都是在他直接指揮和影響下進行的。他是一個在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郭士毅是計委右派分子的头子、指揮者，是王卓如在計委掌握大權進行反黨活動的忠實助手。張耀曾是王卓如篡奪財政大權，進行反黨活動的心腹，歷史上有嚴重罪惡。這三個人是黨內的極右分子。

續中一，執行王卓如的反黨意圖十分堅決，並且積極策劃破壞對這個右派反黨集團的檢查和鬥爭。袁子揚，他的反動言行十分突出，是這個右派反黨集團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急先鋒，是王卓如進行反黨活動的第一把助手。曹戊和王卓如一起積極地支持包庇極右分子郭士毅，也是王卓如進行反黨活動的可靠親信。這三個人是黨內的右派分子。因此，有關部門的黨組和支部已分別作出決議，開除王卓如、張耀曾、郭士毅、續中一、袁子揚、曹戊的黨籍，撤消他們黨內外一切職務。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 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村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王月村，女，四十六岁，山东省临淄县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入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参加工作。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教员。历任县妇联主任，鲁南区妇联主席，代理县委书记，山东省妇联副主席、主席，省委委员。

王月村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她对党的各级组织，上至中央、省委，下至党的基层组织，都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她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全国妇联召开的省、市妇联主任会议上，对党中央大肆污蔑和攻击，造谣说：“若干年来党中央对妇女工作领导的太少。我在山东这一段，党委从来不研究讨论妇女工作，妇女工作长期没方向，幹良心事，没有领导。”对省委的领导，她则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辱骂省委“已发展到障碍发挥部门作用的严重地步”。经常污蔑“省委不民主，不虚心”，她说：“我这省委委员是摆设”。在省妇联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中煽动对省委不满。一九五七年一月她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上天言好事”署名“恨天”的反动文章，公开辱骂各级党委。漫骂省委是“玉皇大帝”，“偏听偏信”，“不主持正义”。把地委、县委说成是“姓王爷”，基层干部是“坏分子”。她署名“恨天”，是恨社会主义，恨共产党的天不变。王月村就是怀着这样一颗极端仇恨党的心，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王月村一贯的反对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反对以生产为中心

的方針。她說分管婦女工作的書記是外行，不懂婦女工作。她一貫主張“婦女工作不能跟黨委的中心跑”。“黨委管的我們不要管，黨委不管的我們管一管”。向黨鬧獨立、鬧分散，想搞獨立王國。她對中央和省黨委的重要指示和重要會議不傳達，說：“無新問題，與咱工作無關”，省婦聯召開重大會議的重要文件不送省黨委審查，很少向省黨委寫總結報告和口頭彙報工作。由於王月村個人獨斷專行，不接受黨的領導，不聽省黨委的話，致使省婦聯工作長期政治方向不明確，使婦女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王月村一貫地敵視與破壞黨的各項政治運動和黨的根本政策，她對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肅反、合作化、糧食統購統銷、改造落後鄉、以及整風反右派等黨的根本政策都是反對的，她極力抹煞這些運動的成績，站在敵對的立場上來攻擊黨的正確領導。在土地改革中，她認為鬥爭地主過火了。對偉大的三反五反運動也不滿，說中央主觀主義，那有這麼多的老虎。她攻擊黨的肅反成績，支持同情反革命分子，認為對反革命分子鬥爭過火了，違反了憲法。在糧食統購統銷中，她聽信家庭的叫囂，替上中農叫喊糧食不夠吃，否認在糧食問題上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在合作化運動中，她認為合作化快了、冒了，合作化“給婦女帶來了更多更大的痛苦”。她否認改造落後鄉的成績，說：

“落後鄉的改造是得不償失，沒見成績在那裡，錯划成份，被錯鬥爭的人可不少。”她支持堂兄王公行（富農）去控告鄉村幹部，使壞分子氣焰囂張。在反右派鬥爭中，她與右派共鳴，支持和慫恿右派分子蘇白、李克進向黨進攻，百般地替右派分子辯護，竟把右派分子向黨進攻說成是“幫助黨整風”。她攻擊黨的肅幹政策，仇恨黨審查她的丈夫孫學之的叛變問題。王月村就這樣在历次的政治運動中都站在敵對的立場上，反對黨的領導。正象在鬥爭中她自己所說的“凡是你們大家高興的事，我都不高興”。這是多么堅定明確的反動立場！

王月村的宗派主義、地方主義已發展到極其嚴重的地步。她

把山东历次的严肃的党内斗争，都看成是这一伙斗那一伙，个人的私斗，而不是中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因此她完全否定历次党内斗争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说这些斗争是错斗了好人，冤枉了好同志。她把山东党内斗争说成是“领导斗争的是打手，积极参加斗争的是盲从，被斗的是倒霉”。她就这样恶毒地丑化与污蔑山东党内的历次斗争和山东的各級幹部。她在妇联内部所贯彻执行的政策，也是完全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采取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以达唯我独尊、树立个人威信的目的。

王月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极点。她骄傲自满，狂妄自大，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名利、地位、荣誉和享受。她对省委的许多负责干部都是采取不服气的态度。在干部评级中，她也是斤斤计较。她为了佔居副省长的职位，竟攻击省委对几个副省长的提拔。她对名誉、地位津津有味，面对重大的政治问题，日常工作却不感兴趣，无所用心。她到省妇联工作三年之久，仅到基层工作过十余天，还带去了炊事员和火爐子。在机关里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很少作实际工作。机关许多干部认为她是“名誉主席”。但在生活上却安逸自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证明了王月村已为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

王月村对待错误的态度，也是极其恶劣的，极不老实，对一些重大问题，对抗、隐瞒、推脱、抵赖。在揭发的大量事实中，沒有一条是王月村自己交代的。直到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的时候，她才不得不低头认罪。

从王月村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来看，她已经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山东省委决定、经中央批准，将王月村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篤生党籍的决定

赵篤生，男，六十岁，家庭出身地主，一九三八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泰安专署专员、鲁中专署专员，山东救济分会副主任，昌潍专署专员，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副主席，民委主任，政治学校校长。

主要反动言行

1、攻击省委，污蔑丑化领导。在青岛党代大会上他抓住所谓“非正常死亡”和“打井”的问题进行煽风点火，说“山东是出英雄好汉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轻生好死呢？”又说“省委为什么不接受看井挂犁的教训呢？谭政委把浙江的一套搬到山东来”。并向党伸手要部长和党代表，说省委对山东老干部不温暖。又攻击省委对肃反问题处理不严肃，污蔑我政法部门都是鬼鬼祟祟的。他参加一九五七年省四级干部会时，在小组会上煽动说：“要找找省委消极退却和右倾保守的具体事实”。与王月村（原省妇联主任）一唱一合的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王说：“赵篤生消极是省委没有照顾老干部”，赵说：“省人委那么多的副省长没有一个女的”。在省政协经常散布舒、谭政委不重视政协工作，”说“谭政委‘九千岁’不去省民委参加会，我‘八千岁’还不去吗？”依靠赵健民地方主义旗帜，拉拢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省政协搞独立王国，部委决定的人物安排他拒不协商，在一九五六年省政协会议上同情党外人士反对合作化，他抗拒省委指示，不组织批判。

2、攻击党对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否定工作成绩。反对

“放”的方针，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和人士安排不管，是指导思想上的錯誤”，以“左”的面目攻击陈梅川同志。公开提出由于党采取和平改造政策，资产阶级才翘了尾巴。經常散布說：“省委安苗海南为副省长和在反右派斗争中保护苗的問題，是錯誤的”。污蔑說“安张金鐸为省政协常委是张金鐸遞个条子給譚政委换来的”。在民族方面，他強調少数民族特殊，支持民委单搞一套。

3、在鳴放中阴谋策划党内外右派分子有组织地向党进攻。一九五七年在省民委党内外鳴放会上煽風点火，說：“目前主要問題是党的政策和大汉族主义的矛盾”，並說：“统战部不重視民族工作，在传达中央指示时把民族工作不传达就翻过去了”。花經熬（省民委副主任）在赵的策划下，在省政协会上向党攻击說：“合作化后回民唯恐病餓交加而死，小孩送人要飯吃，都把入餓死了”。会后，在赵的主持下，把这篇反动稿件刊登了“回民通訊”。花經熬在民族工作上单搞一套，曾受到济南市委的批評，花进行恶毒反攻，赵鼓动花說“你不講我也要講的”。共同策划攻击省委，在省委常委会上，花攻击省委后，赵支持花攻击省委說：“他們是回民幹部，我可是汉族幹部……”，企圖証实在回民中發生的問題。一九五七年省四級幹部会上花經熬攻击省委發指示“不提民族工作，山东不能建立一个民族乡，山东少数民族中对党团员的發展不如抗战时期”，赵又鼓励花說：“意見还是提出來好”，花連夜搜集材料，第二天繼續向党进攻。花的右派面目暴露后，赵又对抗省委指示，百般的进行包庇，拒不检查花的問題，上报花的材料时，赵又刪去主要錯誤情节，打击积极分子，污蔑他們是“地主”有“政治問題”。並威胁說省民委的是非不明，整風时一个也跑不了。赵对右派分子洪占五（济南市民委副主任）也是积极包庇的，群众对洪开展辯論，赵就極力阻止，把會議日程改为传达报告。当确定洪的右派时，赵又以所謂只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緒为理由，反斗划右派。右派分子王崇石（省工商联

黨員秘書長) 攻击省委统战部妨碍省工商联組織独立, 赵則煽动說“不能老鼠掉在風箏里两头挨挤, 这是原則問題”, 並暗示王查查苗海南交股票是否陈梅川同志要苗搞的。王祝晨(党外省政协副主席) 一貫反党, 赵極力庇护。王在交心中趁机向党放毒进攻, 但赵向市委及省委彙報說王很积极, 揭發王的大字报赵压住不貼, 从香港美国特务机关捎給王的信和反动宣传品, 赵匿而不报; 去年王参加全国人大会議时, 赵写信叫李澄之轉告王說話要留神。在部里确定徐浩(副处长)、孙肇基(办公室副主任) 等五人为右派时, 赵則散布說“他們年輕无知, 算得什么右派”。並煽动徐浩进攻說“你有話要在會議上講”。

4、包庇反革命分子。赵宏海(赵的亲侄) 系国民党的校官, 国民党員, 在英国受过砲兵訓練, 上海解放后逃回原籍。赵篤生伪造說他在上海与我地下党有关系和起义人員打入我軍隊, 鎮反被逮捕刑滿释放后, 赵又利用关系安置作中学教員, 划右派后赵又指点他翻案, 直到最近才法办。並以韓多峰是坏蛋为借口, 鎮压韓检举他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吳培申(赵的亲属) 的問題, 在反韓右派时, 硬要韓签字划押說赵篤生、李澄之包庇吳培申是誤告。近来又查出反革命分子赵子鵬(赵的孙子) 解放后逃往香港, 經常与赵通信, 但赵沒有把赵子鵬的真象向我公安机关报告。

5、支持地主倒算, 維持封建势力。赵的胞兄赵子普是泰安城东关的一霸, 被判处管制二个月, 赵支持其上訴, 反对划为地主。赵不只一次地要当地政府救济其地主和反革命亲属李嘉干, 並要党外人士吳长森吸收李参加县政协学习, 以便早日給李摘掉地主帽子。更严重的是与洪占五勾結一起在珍珠泉召开泰安专員、县长、民委主任等會議为地主滿子謙倒算房子, 赵在会上动員說: “公家不在乎那几間房子” 並批評韓华亭同志对滿的小老婆态度不好, 說“你这样熊人不能作民族工作” 等。

6、隐瞒历史, 赵在解放前在省立九中、十中、育英中学教

學時，曾任過訓育員和訓育主任（應是國民黨員）一直未交代，並偽造自己是紅色教員。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趙篤生一貫對抗黨的領導，拒不執行省委的指示，否定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成績，包庇反革命分子。當資產階級右派向党猖狂進攻時，趙就配合右派分子向党進攻，以達到反黨的目的，完全墮落成為黨內的右派分子。在鬥爭中態度極其惡劣，一直狡猾、抵賴，不肯低頭認罪。為了嚴肅黨的紀律，純潔黨的組織，經省委批准，開除右派分子趙篤生的黨籍，撤銷原有職務，工資降五級。

山東省交通廳整風領導小組關於 右派分子王翰西的結案處理意見的報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王翰西，男，五十四歲，山東省臨淄縣人，中農出身，行伍成份，讀書十二年，一九三八年參加我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營長、團長、渤海軍區副參謀長、德州軍分區司令員。現任交通廳副廳長、廳黨組代理書記、廳整風領導小組組長，十級。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在反革命軍隊中任職十二年。幹過班長、特務長、少尉排長等職。後住閒二年，經商二年。參加我軍後偽造過歷史。一九四〇年曾受託匪影響並一度要求退黨；一九四二年整風時，因被審查歷史而仇恨黨，對歷次政治運動和政治工作機關有抵觸等語；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因非法婚姻關係和嚴重官僚主義，受到黨內當眾警告和行政降級處分（行政處分於一九五四年取消）；一九五五年評軍銜時，因要求准軍級未達目的，

严重不满，曾拒絕出席受銜、受勋大会；一九五六年轉业也認為是山东軍区有宗派，因而再度怀恨党。轉业至交通厅后，工作消極，对省委、省人委指示不坚决貫徹执行，有时在传达后还加上“不一定正确”的批語。他所積極的是籠絡亲信，施展个人野心，从事反党活动。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平时縱容支持张信懋、宋汝一、程松林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鳴放时又煽風点火。提出“不要实事求是”“不要和風細雨”，“諷刺挖苦都行”，“罵也不要紧”，鼓励他們大举向党进攻。在王的支持煽动下，右派們即肆无忌惮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王翰西見其煽風已生成效，而得意忘形，对右派言論大加贊揚說：“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意見是正确的”。他还跑到航运局慫恿右派分子馬子芳張貼反动言論大字报，表揚馬是“老幹部，敢于坚持斗争”。为使这把火愈烧愈旺，曾極力打击敢于坚持党的原則的人。史茂源同志对反动言行提出批駁时，話未講完王翰西厉言制止，說：“我对你的發言有意見，不要解釋”。繼而向下屬部署“只准鳴放揭發，不准解釋、反批評”。

2、反右斗争前夕，王翰西見風向不对，即鳴鑼收兵。特意將中央关于反右斗争的絕密指示向科长以上黨員幹部交底。說再鳴放是为“引右派”；示意张信懋“不要再鳴放”；授命程松林“注意約束你爱人（徐志誠——右派）的言行”。使一些将要暴露的党内资产階級右派縮回头去。

反右过程又極力包庇已經暴露的右派，打击敢于揭發批判右派的积极分子。刘勘远同志写大字报批駁右派分子馬子芳的反动大字报。王反复追查，罵刘“不是右派也是坏分子”，勒令揭下大字报；不少群众用大字报揭發交通厅民革招兵买馬，揭發右派分子孙鳳英的反动言行，王忿恨的斥責支部書記馬云超“不掌握原則、政策”，“这样做，打击面太广”，“孙鳳英在工程师中

認為
工作消
加上
人野

進行
要和
大舉
了惡
言論
他
易馬
打
上，
解
。意
再
林
暴

比較好，在社会上有地位，群众有意见你可以解释、动员”，
“把(揭发)孙凤英的大字报揭下来”。省委交通部通知厅党组整
风处长干部鸣放言行，王拒不执行，斥责执行人“偏激”，罵省
委交通部督促执行的林焯同志“烏龟王八蛋”。並在省四級幹部
会上欺騙省委說：“厅里有个党组，在鳴放中提了很多意見，是
很好的”。老早就在厅幹部大会上宣布反右斗争已获全胜，借赶
整編草草收兵。

在整風第三阶段整改中，王曾極力主张按照右派分子的主张
改变党的幹部、工資政策。說什麼“沒有宗派主义也有穿派情
緒”“盧英华(前党组副書記)回来檢討檢討吧”迫使党向右派
們認罪。

总之，他对右派的包庇是有始有終，直到在动员辯論张信
懋、宋汝一等人的反动言論时，还在大会上說：“这是大是大非
問題，但肯定說不是右派，是內部問題”再度模糊群众的視綫。

另外他还圖謀在反右中冤枉好人，宋奎同志(人事处副处长。
——曾是右派分子众矢之的)根本沒有反动言行，他却借生活作
風問題一再堅持划宋奎为右派。

3、在省四級幹部会上，王翰西又亲自出馬向党大举进攻，
攻击社会主义，攻击省委和省委負責同志，否定全省工作成績。
他說“省委領導很吃力，工作水平不高，作風是八年前的，跟不
上形勢的發展”“省委負責同志开会演說說的很好听，但实际不
然，喜欢大呼隆，喜欢搞突击，喜欢搞行政命令”，“省委有些
地方很别扭，不採納意見，总認為自己那一套行，工作搞一个丟
一个，好象野猪扭棒子”，“过去省委对交通厅的工作从未过
問，省委負責同志吃了飯幹什麼？”“省委个别負責同志臭架
子十足，很不虚心，很不負責，背一貫正确的包袱，使人见了感到
很不是味道”，“該幹的同志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舒同同
志也有毛病，而且还很突出”，“省委領導同志思想方法很
頑固，我又喜又恨”，“省委、省人委对过渡时期的工作抓的不

突出，有的負責同志對此領導不熱情”，“省委不如交通工作部，省人委不如交通廳，下邊比省還好，一級不如一級”，“省級機關互相爭吵，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黨內是非不清，賞罰不明，沒有原則”，“建議省委今後不要再搞大呼隆了，真正把群眾路線、民主作風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否則就是手段……”。

王翰西攻擊社會主義，遠在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高潮來臨的時候，即在思想上有所抵觸，正象他自己檢討說：“我在醫院躺着，聽到敲鑼打鼓，即感到合作化搞快了，將來當不了反冒進”。他在平時也有攻擊省委的活動，說省委交通工作部是“麻煩部”，辱罵省委領導。他對舒同和譚啓龍同志的點名攻擊是有野心、有陰謀的、是對右派分子王卓如等的聲援，正象他自己檢討說：“趕走舒、譚省委工作必由趙、李主持，省人委必由王卓如主持。這樣我可以當……”。

4、王翰西在四級幹部會上打輸以後，力圖挽回敗局。他個人否定黨的決議，企圖留下已決定下放的右派和反黨分子，占領廳內黨政領導要害。他親自向省委交通部負責同志求情，說什麼“程松林思想有包袱、有懷疑”，“算了吧”，“留下吧”。他支持右派和反黨分子散布流言蜚語，說什麼“下去就回不來了，住不上幾年就死了”，“我下去先到各地、沿海逛一個月再上班”，“留下的（處長）沒有一個象辦企業的，馬沂泉是個唧唧鬼子，杜旭東是個咀子，周云祥連飯也不會吃”。他支持程松林給仲侃伯副廳長加上打擊報復的罪名，企圖混淆是非，模糊問題性質。

二、鬥爭中的態度

王翰西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大暴露之後，偽裝鎮靜，數月不作檢討交待，並借口養病，逃避鬥爭。從醫院調回整風補課後，經過幾次小會大會的鬥爭，態度還算老實，基本上交待了反黨的陰謀和野心，並表示低頭認罪，決心悔改。

工作
“省
：罰不
把群
”。高
造高
“我
不了
部是
攻击
他自
必由
也个
：領
么他
，上
卿林
題

三、結論和处理意見

王翰西自來交通厅后即高举白旗，縱容支持右派和反党分子进行反党活动。鳴放时煽風点火制造混乱，反右时極力包庇右派，在省四級幹部會議上亲自出馬，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領導，攻击省委負責同志，应确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原十五級，另行分配工作。

(已經山东省委批准)

中共山东省教育厅党组 关于右派分子刘健飞的定案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簡历

刘健飞，男，五十二岁，安徽省巢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伪职员。一九二六年十月入軍閥张宗昌部，幹过学兵团的學員、軍參謀处的录事和譯电員，一九二八年六月参加国民党，任县党部文書助理幹事，一九二九年六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党組織被破坏后，投入蔣伪四四师，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三一年五月任小学教师，一九三一年夏脱离党的組織（是自由脱离还是自首叛党尚未結論）。一九三五年一月鑽入蔣伪中央宣传部国际处任編譯幹事，此时刘对反动事业極为卖力，除編譯外文外，积极搜集我进步刊物，很被特务头子方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重用，並經方治的介紹，以“特”字号党証重新参加国民党。

一九三七年十月，刘离开伪中央宣传部，隐瞒了反动历史，混入我革命队伍（一九四四年整风时曾坦白系有计划打入，后又推翻）。一九三九年四月又混入我党，后經組織上查出停止其党籍，一九四二年又重新入党。

刘的历史很复杂，由于其一贯不老实交代，虽經审查至今尚未全完弄清，他入伍后任过新四军五支队敌工科长、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山东大学讲师、济南市教育局局长等职，现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行政十级。

二、平日表现

刘长期对党两条心，平时拒绝党的教育和批评，对其反动历史不忠诚交代，一直隐瞒抵赖；他极端虚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权威思想非常突出，时常打击别人吹捧自己；在工作中坚持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经常宣扬脱离政治的业务观点，如他视察临沂、济宁扫盲工作后，写的报告长达万言，政治教育一字未提，他常说政治思想工作“是党委的事，我们不必提，提也是形式主义”，企图取消教育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领导；对党委领导是阳奉阴违，反对党委抽调教育干部作中心工作，並曾极端恶劣的假借省委扫盲检查团的名义压制地委县委领导，把扫盲工作摆在中心工作之上；在干部政策上强调才，取消德，在教师问题上强调团结，忽视改造，他违背党的阶级路线，信任重用反革命分子、历史不清的分子、右派分子（如张墨仙、张达干、宋世平等），排斥打击对党忠诚的干部。

为了实现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对干部进行宗派拉拢，一贯打击污蔑诬告党组书记王哲同志，並进而污蔑孤立主持正义的党组副书记袁晓同志，从多方面分裂破坏党的团结，他企图取消党组领导，对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不在党组研究，如毛主席提的新教育方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勤俭办学、体制下放等；特别严重的是竟狂妄的把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方针目的：

“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篡改为“提高觉悟，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改造思想”，以示与中央对抗，打起反中央的白旗。

三、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主要反动言行

(一) 煽动包庇右派分子：

一、煽动、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兼右派分子张墨仙向党猖狂进攻。六月初，刘健飞到中教处听取鸣放，当听到张墨仙大肆攻击党组有宗派主义，党组水平极低和污蔑党组负责同志时，刘当即起立却话问：“有这个事吗？”并将张的言论记在本子上，会后又约张个别谈话，张问刘：党组对我的历史问题审查你知道吗？刘说：“你有历史问题我知道，但具体情节不很清楚，对怎样审查我未参加研究，……我是党组副书记。”（其实对张的审查是党组决定的。党组委托三个委员对张审查，审查结果都向刘作回报），张听后认为审查他不是党组决定的，只是几个党组成员个人的事，当即大罵：“媽个×，我要和他們拼了。”事后气势汹汹地去質問审查他的蔣奇同志。六月底在处长以上干部鸣放会上，刘三次鼓励张鸣放，说：“墨仙，不要顾虑！”张在他授意下又对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作了恶意的攻击。他对张大罵党组成员的事实，並未向党组回报，当被迫谈出后，整风办公室三次着刘写张与他谈话的材料，他以记不清，推托不写。党组第一次研究张的问题时，刘说：“张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是攻击个别人，不是反党。”党组第二次研究张的问题时，其他党组成员一致主张划张为右派，刘却态度暧昧，沒有明确表示意见。党组决定划张为右派后，刘还对马副厅长说：“张墨仙的问题还得再考虑考虑。”直到省委领导小组批准对张进行斗争后，刘又向马副厅长说：“对张的问题不能和其他右派一样看待。”

二、六月十二日刘召集厅内四个旧军官开座谈会，会上严复明污蔑肃反运动说：建議中央發明个“照脑机”。刘已了解上级

要通过鳴放暴露右派分子的意圖，却當場要严把此意見收回去。右派分子宋世平，污蔑山东教育工作是“老和尚念經，不解決問題，历次政治运动給幹部背包袱，不是給幹部放包袱……”等等。当党組研究宋的問題时，有的同志提出这是否定党的工作成績，应定为右派，刘說：“这不能算否定成績。”不同意定为右派。

三、当曲阜师院的右派分子，煽动学生搞大民主，要挾政府迁校时，刘健飞了解省委不准迁校的意圖，他却和右派分子张达干（原高教处副处长）商議由张起草写报告給教育部，反对省委意圖，报告中污蔑领导进行教育是“保守”、“压服”，“忸忸怩怩不敢放手發動鳴放”，攻击中央和省委把学校建在曲阜是“主觀主义、官僚主义”，如不能迁校，不仅领导上应“坦率”的承認錯誤，还要滿足右派提出的七項荒謬要求，如将曲阜建成文化名城等，这一报告，刘既不交党組討論，又不請示省委，擅自签字發出。

（二）污蔑党組有宗派主义，分裂党的团結，丑化領導同志

一、一九五七年五月，党組研究制定整風計劃时，刘竭力主张将宗派主义列为重点，六月四日在全厅幹部整風動員会上，刘說：“在教育厅宗派主义不能低估。六月二十一日党組討論繼續鳴放問題，刘說：“关键在党組，只有将盖子揭开，才能解決問題。”同时在这次會議上，党組研究张墨仙攻击党組有宗派主义的反动言論时，刘認為党組有宗派主义，當場要崔碩星同志表示态度說：“老崔，你發表个人意見。”企圖分裂党組团結。六月二十四日党組开会討論如何开好处长以上幹部鳴放會議时，刘說：“党組委員要以个人意見發表意見，我認為厅里宗派主义問題要交換意見。”六月二十七日，在处长以上幹部鳴放会上，刘說：“王哲同志对我的态度是疏远的，对有些同志的关系还是亲密的”，“有些事事前我不知道，党組开会常是袁（党組副書記）通知我，我以党組委員身份出席會議，是省委認為我作副書記不

回去。
解决問
...”等
工作成
定为右

挾政府
子张达
对省委
“忸忸
卑是
坦率”
卑建成
委，擅

同志
力主
，刘
繼續
决問
主义
表示
六月
刘
义問
刘
赴亲
己)
己不

适宜，还没有免掉，我不敢这样想”。右派分子张达污蔑党组有沟有壑，有宗派主义，刘立即煽动說：“张处长鸣放了，很好，大家有意见都可以鸣放。”休息时，张問刘：“我这样提法是否合适？”刘說：“可以提，我在學習八大文件时曾提出宗派主义值得检查，当时認識不一致。”

二、刘写的与省委文教部王部长的談話要点中，污蔑王哲同志說：“从肃清向明影响后，一直怀恨在心，提議当（肃反）重点成立专案小組。”他說“肃反中不如党外幹部”。刘在鳴放会上丑化王哲同志“对省委尊重有些地方不当，庸俗化，如有一次省教育會議，省委秘書长任賀彬同志作报告，領導与会人員再三鼓掌致謝，去年优秀教师會議也是如此（指对舒同同志、譚啓龙同志）。”謾罵王哲同志“沒有找我談过話，就認為我历史問題严重，是否由于条件反射造成的主觀印象”，他並在处长会上煽动大家提議要王哲同志回厅整風，企圖进一步攻击王哲同志。

（三）拒不执行中央、省委指示，阻撓破坏反右派斗争

一、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电示各地，爭取时机大鸣大放，揭露三害，同时暴露右派（省委机要处五月十七日将电报發給教育厅党组，刘閱后又收回），省人委整風领导小组又于六月七日召开各厅、局领导小组长會議，要求各单位进一步發动鳴放，徹底暴露右派，刘早已了解中央意图，但不認真貫徹执行，在厅內只进行了一般鳴放，沒有貫徹“引”和“挑”的指示，影响了右派的充分暴露。

二、二月十一日省人委整風领导小组，布置由党组書記和黨員厅长，研究对全厅人員进行政治排队，刘回厅后压下了，根本沒有进行。

三、七月廈門支江先貴同志向刘提出方天鴻（右派分子）的言論和其他右派差不多，希望領導上考虑一下，刘說：“咱动員叫人來鳴放，叫人來幫助咱整風……管不管……認為不对就反人家，是吧”。

四、对于仇复划为右派問題，楊副省长早有指示要对仇复开展斗争，刘却借口需查对材料，把問題擱置很久，經同志們一再提意見，才将仇复定为右派。馬培卿同志对此在支部大会上曾檢討“这是慎重有余，积极不足”的右傾思想，刘指責馬培卿同志不应这样講。

（四）攻击污蔑肃反运动，反对党的审幹政策

一、在处长鳴放会上，刘健飞攻击肃反运动說：“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厉害，老三反中主观主义严重……肃反中未接受这一教訓”，“确定宁（汉戈）为肃反对象（經省委确定）是錯誤的，即使当时有材料，有根据，而不加以分析，我認为也不对。”

二、一次党組研究肃反对象王同的結論时，他強調不了解情况（其实王同的問題他是了解的），带头不作决定，会后並向馬培卿同志說：“誰搞的，誰負責，咱不管”。

三、他对郑銘石（进修学院院长）說：“我的意見，政治上无問題，历史問題未作結論也可以提拔”。企圖挑动郑对审幹不滿。

（五）攻击人事制度和支部工作，打击陷害人事处长

他在处长鳴放会上带头攻击和歪曲事实說：“人事工作支部工作我很难过問”，“厅里幹部任免制度有問題，科长級以上幹部党組、厅务會議研究，科长級以下幹部人事处来任免”（事实是党組确定，凡科員以下幹部由人事处討論提出意見后报分管厅长决定）。他向省委文教部王部长誣告人事处有宗派主义，打击排斥两个人事处长，起初他叫馬副厅长去文教部要求調走两个人事处长，因馬副厅长不同意其意見，他便亲自出馬找王部长，夸大两个处长缺点。並捏造事实誣告陷害胡方同志被提拔为正处长是“白报白”。

四、斗争批判时态度表现

开始时公开对抗，污蔑大家对他的揭发批判是落井下石，对反党罪行拒不交代；繼則伪装老实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当揭穿其阴谋后态度蛮横进行诡辩，在大家的批判及大量事实面前虽承认已堕落到资产阶级右派立场（最后书面交代又去掉），破坏了党的团结，实际上对右派分子起了包庇保护的作用。但仍以否定重要情节把反党罪行歪曲为认识问题等手法继续进行狡辩。至今不承认是右派，自始至终坚持反党立场，不肯低头认罪。

五、結論

刘健飞历史上曾叛变革命，是党的叛徒，抗日初期隐瞒反动历史混入革命队伍，他因有丑恶的历史和卑鄙的政治野心，长期对党两朵心，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平时歪曲对抗党的方针政策，一贯分裂党的团结；鸣放中煽风点火，支持带领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的攻击党组丑化领导，攻击肃反运动和人事制度；在反右斗争中千方百计的包庇右派分子，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揭发批判后百般狡赖坚持反党立场，突属情节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右派骨干分子，根据中央划分极右分子的标准第（1）条规定，应定为极右分子。

六、处理意见

刘系极右分子，态度又特别恶劣，确定按中央标准第（三）条处理，开除其党籍，撤销原有职务，留用察看。

（已经山东省委批准）

山东省文化局、文联整風领导小组 关于右派分子馮毅之的处理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馮毅之，原名馮登瀛，曾用名馮毅、馮仙舟，山东省益都县长秋庄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零年曾入党，一九三二年脱党，一九三七年又重新入党。曾任县委宣传委员、县长、八路军四支队营长，青州市长兼警备司令，四县办事处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科长、处长。現任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党組書記，兼省文联副主席、党組委員。

(一) 平日表現

严重的个人主义，对个人閉門創作很積極，一貫脫离政治，对抗領導，对党的各項工作均採取了草从事或一拖再拖，不了了之的度态。如批閱文件，不加审閱就提笔簽發，他常說：“原則我負責，文字你們負責。”实际是从原則到具体，他都不負責。

(二) 隱瞞历史，包庇地主及反革命分子

据馮毅之交代，一九二八年春他在青州十中加入国民党为預备黨員（？）一九二九年春就脫离了国民党，除了在叛徒杜华梓逮捕共產黨員时会隨同搜查过吳祝存的家以外，別无其他活动。經調查証实，馮毅之曾介紹陈叔俊、张貞甫、楊蓮芳三人参加了国民党，当时在益都国民党县党部出出进进，極其活跃，並作过監視共产党活动的工作，后会隨赵貫一在博山县党部任宣传幹事，青島胶济鐵路党部任幹事。一九三零年在济南高中上学时，还

經常參加該校國民黨區分部的會議，當時很活躍，還擔任學生會副主席職務。

一九四六年馮在青州任市長時，曾包庇青州城里地主“韓姑娘”，不讓群眾對其進行減租減息，替地主叫苦。濟南解放後，曾介紹托匪寇文章，及叛徒、反動黨團骨幹劉玉軒參加我政府工作，更與反革命分子白傑臣、張貞甫往來密切。

(三) 對整風反右的態度

當開始整風時，不下樓參加領導，強調個人閉門創作，群眾意見很大，直至大眾日報上批評後才勉強下來參加，仍是消極應付說：“用着我幹什麼就幹什麼，用着我作報告就作報告。”站在整風領導之圈外。當我黨向右派分子反擊開始時，馮即公開投靠右派分子的行列，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向党進攻，煽動群眾對省委不滿，具體事實如下：

省委夏書記主持研究批判右派分子任迂喬，王希堅（右派分子、省文聯代理副主席）跳起來說：“省委如果不願檢討（指“吻肩章”的檢討）可以收回來嗎！”馮馬上也跳起來說：“省委有缺點是不是還讓人批評？”企圖威脅省委放過任迂喬。大鳴大放開始後，省政協召開鳴放會議，任迂喬原來未準備參加，馮即鼓動任迂喬到大會上去談漫畫問題，借以攻擊省委領導。對任迂喬鬥爭之後，馮即又到任迂喬屋裡去安慰說：“你沉住氣嗎！將來總會水落石出的，只要相信黨是光明的，問題是會弄清楚的，人家還有坐二十年冤獄的嗎。”

中央召開宣傳會議時，馮毅之和右派分子王希堅都曾去參加會議，到北京後第一天馮就鼓動王說：“要談談漫畫問題。”在小組會上馮先談了漫畫問題，開大會時，在王希堅攻擊省委負責同志的發言後，馮即起立補充說：“王希堅講的省委某負責同志，我可以具體談談，這個負責同志就是我們的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同志。”馮又說：“我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主要障礙是在領

导方面，也就是省委不敢放的問題。”王希堅在省二次文代大會上号召青年們向馮毅之學習，回去后向党作斗争，（实际是进攻党）任迁乔常說：“山东我最佩服的是王希堅和馮老头（馮毅之）。”一九五七年省文联斗争右派分子王希堅时，馮毅之（当时是文联党组委員、副主席）在約有三千多字的發言中叫了王希堅二十二个同志，全篇講話的精神是說明王希堅不是右派，是思想上的錯誤，並說：“王希堅同志过去有成績，並不是一切都是錯誤的，我希望王希堅同志不要覺得冤枉，我們承認有錯誤，也需要检查，我們以后还要整風嘛，在我們整風的时候，王希堅还有發言权，可以多給我們提意見。”一九五七年全国群众音乐舞蹈会演时，馮毅之对山东代表团的一次講話，实际是煽風点火，向省委进攻，他說：东北某地区犯了錯誤，山东也出了一件大事——漫画“吻肩章”問題，有人（指省委）說是毒草，我看值得研究。又說：我們执行党的政策，也应该有独立思考才行，山东的地瓜烂了，就是因为机械执行沒有独立思考造成的。他在日記上說：“欢迎和鼓励唱反調，在当前非常重要，因为敢于唱反調的人太少了。”

省人委对王卓如反党集团的斗争开始后，在文化局貫徹的无力，每次座談討論，只是由馮唸唸文件了事，不敢正面涉及到文化局的問題，更不敢引火烧身談自己的問題，因而文化局的整風长期进展不大。

（四）对党的各項政治运动均采取对抗态度

馮毅之不仅对反右斗争是對抗，而且对各种政治运动都是采取对抗的态度。因为他历史上有問題，不叫他領導肃反，他便大为不滿，說：“叫我做党组書記，又不叫我做肃反工作，叫我怎么办？”对被审查的王非（历史問題，未作結論）同志說：“你不是反革命，这一点我們早就預料到的，他們（指省委宣传部）虽有主觀片面，但自己應該抱清算过去積極将来的态度，历次运

动都有这样情况，老三反还有人带手铐脚镣进大狱，如王力现在也已撤消刑事处分……。”对反胡风认为是“不分敌友我，一网打尽满河鱼。”对机关整编、干部政策和作家下乡、降低稿费等都不满，在群众中公开发牢骚，诬蔑我们党内没有民主，说：“党内最主要的是不民主的问题。”把各种运动说成是：“每一次运动，似乎免不了这样一个规律（开始刮北风，结尾就刮南风）北风刮得越兇，后来的南风也就越大，把人吹到不应去的地方，还能不再吹回来吗？”他说：“过去资本主义国家说我们有铁幕，苏联还真有过铁幕。”

（五）对抗组织，对抗领导

对上级领导，态度极不正常，甚至对抗和诬蔑领导说：“省委不重视文艺，没有作品就不能领导文艺工作。”说：“夏书记的文艺观点落后了”。“王部长（指省委宣传部）就是不懂文艺嘛。”“从丁局长调走后，文化局长处于无领导状态（？）省委一直拖延不管，现在才宣布局的领导（指冯自己），这些问题怎么会没有呢？”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质问为什么不成立歌舞团时，冯就说：“我有什么办法，省委书记光会说话，说话谁还不会说。”“向省委狠狠的提，这是省委的问题。”叫把大字报贴到省人委去。当主席来山东时，他诬蔑说：“舒同头脑也发热了，看起来真不能个人崇拜。”他对党的负责同志经常抬杠散布流言蜚语，发牢骚。

（六）腐朽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

冯毅之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革命的招牌，利用他的职权地位，在山东文艺界大量散布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观点。冯毅之看不起也不愿做行政工作，他说：真正有本事的人（指创作）没有干行政工作的，我当局长并不愿意，可是不干又不

行，没办法……”在他的日記里写着：“无休止的会时刻在号召你等着你，不会叫你閒着的。每一职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要开会，我現在有三个工作，就需要有三分之三的时间开会，連看書的时间都沒有，那能写作呢？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做，天天不能以最强的理智来驅使自己完成各种任务，苦杀人也。”其实是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一本書主义时刻在驅使他，他到处蓬人就講，家中已盖好三間屋，要求退職回家，專門搞創作。他強調写悲劇、写阴暗面、写諷刺劇，他說：“我們的劇本諷刺的还不够，还不悲，尤其对老幹部有了缺点就狠狠的揭。”

“中国需要果戈里，要写諷刺作品。”“社会主义也有悲劇和阴暗面”，“可以写黑暗面”，“写官僚主义不必写轉变，一直發展下去，把他写死，用群众的压力把他压下去，可以写悲劇，历史劇，要用血的教訓来教育人民。”他並且宣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要有資產階級的文学，他說：“作品可多种多样，因为讀者对象不同，为解决作家与讀者之間的矛盾，不一定都写主流——现实主义作品。”他強調文艺性而不要政治，把前艺校的政治課取消，換上洋琴課，他說：“……別看有些人整天嘴里喊政治政治，到时候还是不务正业，演不出好戏来。一个演員，只要演好了戏，就是好演員好幹部，如果是黨員就是好黨員……。”有的教員不願参加整風，馮說：“你們不了解，这些文艺人就不願参加政治活动，如赵树理是全国有名作家，几年从不参加政治学习，生活散漫，中央也管不了他。”

（七）斗争中的表現

对馮毅之的斗争，自六月初至八月上旬，前后經過十余次大会揭發批判和小会查对材料，馮也作过三次大会检查和在小会上承認某些問題。但总的看来，馮在斗争中的表現是不老实的，缺乏低头認罪，真誠悔改之心。他所检查的都是群众已揭發的問題，自己没有主动交代新問題。而对已被揭發的問題的检查也是

避重就輕很不深刻的，採取包下來的態度。

(八) 結論及處理意見

根據上述事實，馮毅之在右派分子向党大舉進攻時，就積極支持和策動王希堅、任廷喬等右派分子以漫畫問題為借口惡意地攻擊省委和黨的負責同志，並到處點火放風，煽惑群眾对党不滿，擴大攻勢。在領導反右鬥爭時消極應付，並暗中安慰右派分子，給他們打氣加油。其次對黨的各項政治運動和政策，採取對抗態度；對黨的負責同志背後流言蜚語進行誣蔑，實際是對黨組織的攻擊和破壞，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條件。馮毅之的問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問題，他的反黨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是山東文藝界右派反黨集團的組織者、指揮者。他參加國民黨後，曾發展國民黨員三人及兩次任縣（區）黨部幹事的職務，長期隱瞞，不作交代。包庇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並曾介紹托匪和反動黨團骨幹參加我政府工作，其錯誤是嚴重的。

經研究決定，將馮毅之劃為右派分子，開除其黨籍，撤消一切職務，由行政十級降至十四級。

（已經山東省委批准）

山东省統計局整風領導小組 关于將王夢玉定為右派分子的報告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

一、簡歷

王夢玉，男，四十二歲，山西省隰縣人，貧農出身，店員成份，一九三八年二月入伍，同年同月入黨。歷任分區委書記、營政指、團教幹、旅政治部股長、濱海區黨委秘書、濱北地委秘書主任、工商局監委、青島貿易分公司副監委、省財委副處長等職，現任統計局局長、黨組副書記、省計委黨組委員。十一級。

二、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

王夢玉腐化墮落，蛻化變質。入城後積極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吃喝玩樂，嫖妓女；並與史甄、王少洛、郭士毅等人氣味相投，經常鬼混在一起。特別是與郭士毅的關係尤為密切，在青島時“郭、王不離”，到濟南後也是“前郭後王”，形影不離。三反運動中，王、郭均被鬥，因而懷恨在心，密謀污蔑領導鬥爭的“馬丕濤是打擊報復”；攻擊中央，說劉青山、張子善“被槍斃有點過火”；糾合犯罪分子史甄和郭士毅密談，並予資助；竭力規勸成文夫同志代郭士毅承擔安插特務分子武明甫的錯誤，進行其反黨活動。

三反運動後，在王卓如的支持下，王夢玉躍升為統計局長，其在統計局工作期間，培植了一批親信，拉攏了一批壞分子，互相吹捧，相互包庇，進行反黨活動。當肅反運動開始，王夢玉的

亲信被斗，王即感到“斗争这些人，就象斗自己一样”，因而私通肃反对象，破坏肃反运动；至肃反后期，领导肃反运动的于清波同志离职学习，王则公开诬蔑“统计局的肃反搞左了，面宽了”，打击积极分子，挫伤群众情绪，並多方为肃反对象开脱罪责，修改结论，减轻罪情，甚至通过张耀曾放过了这批坏人（这次整风运动中有的逮捕法办，有的劳动改造，有的成为右派）；最后在总结肃反工作时，突出了运动中的缺点，否定了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

由于王梦玉长期与党处于敌对地位，和党离心离德，因而反党的本质也就处处表露。当统计局给职工换棕床时，坏分子肖连欢（已逮捕）说：“这可能与匈牙利问题有关”，王明知不对，而蓄意歪曲匈牙利事件的真相，同意了肖的恶毒言论；又借统计局提拔一批科长级干部和科改处未成等问题，他又别有用心地把责任推卸在计委身上，在干部中制造不满。

三、整风鸣放前后与反右斗争中的右派言行

（一）攻击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建设：

1. 同情右派言论，赞扬右派分子对党的攻击。当右派分子攻击我党是宗派主义的时候，郭士毅极力主张提拔张藕林（极右分子）为基建处副处长，並说：“不是人家（指右派）说我们是宗派吗，提起来可以堵住他们的嘴”，王则帮腔说：“是呀！张藕林提拔起来有代表性”；当统计局右派分子杨文远诬蔑党员是“暗探”，“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宗派主义”时，王则公开赞扬说：“杨平时不大说话，你看这次给我们批评的很尖锐，以后是要注意呀！”

2. 与极右分子郭士毅一唱一合攻击党的工资政策，污蔑合作化后的农民生活苦。郭说：“财政部真有办法，现在房租水电都要出，将来书报费也要自理，增加的不多，支出不少”。王赞同的说“没有办法还叫财政部吗？”当合作化高潮时郭说：

“这次出發對我們的教育很大，平素在機關不了解群眾的痛苦，不知道老百姓用一個錢都沒有，小孩子買一塊石板都要去借錢。有個農民對我說：‘你們是樓上樓下，我們也是漏上漏下’”。王則支持同意。

3. 與郭士毅一唱一合的反冒進。當社會上刮台風反冒進時，他們是同声呼應。郭說：“打井計劃大了，加上有些地方強迫命令，出現了一些廢井”，王說：“要讓各地統計一下廢井數字”。郭說：“水車生產多了，賣不出去，積壓很多”，王亦贊同的說：“賣出去的不是也有一些成了睡車嗎？反正都是睡車，在那里睡都是一樣”。

4. 反對社會主義統計制度的建立，抵制國家統計局的領導。省統計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指示精神，在全省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由於清波同志主持研究貫徹了新的農業定期報表制度，而王夢玉則抓住執行中的某些缺點，攻擊國家統計局說：“脫離實際，主觀主義”，並因農業科執行了這一新制度而批評農業科達二年之久。此外，在國家統計局安排一九五七年勞動工資調查任務後，他亦不滿地說：“國家統計局就是主觀主義，不根據實際情況亂安排工作”。對國家統計局召開的有關重要調查會議，竟拒絕派人參加。

（二）整風、反右期間的罪惡活動：

1. 策動肅反對象，攻擊肅反運動：

王夢玉乘黨整風之機，一方面公開散布流言蜚語，宣揚統計局的肅反面寬了，搞左了；另一方面則煽風點火，策動肅反對象向党進攻。當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正是大鳴大放時期，最高人民法院轉回肖連歡攻擊肅反的控訴信時，王夢玉就一方面指示張宗信同志向肖寫檢討，並告訴劉銳心歸還其寫有血書的反動日記；另一方面即約肖進行密談，策動其進攻肅反運動。並囑肖要陳行箴、王震國（均系肅反對象，王曾親約過王震國）等也來談談。在王的策動下，肖連歡就在統計學校惡毒地攻擊了肅反運動，同

时，还向其他肃反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煽风点火，鼓励肃反对象陈行箴上书周总理，攻击肃反运动。

2. 指挥右派退却，破坏反右斗争：

统计学校反右开始，肖即被斗，当群众进一步追问其反党目的计划时，肖找王求救，王即支持他抵赖，说“我知道你没有目的计划，象马助功、王洪德（均已定为右派）他们不要说反党，就是反贸易科也不可能……”，否定了马、王是右派，从而例证了肖不是右派，因而肖回校后即气焰嚣张，态度极其蛮横，后在群众的说理斗争下，以及其他右派分子对他进行揭发之后，肖连欢再次向王求救时，王唯恐暴露自己，即要肖虚心检讨，暗示他把问题包下来，蒙混过关。当着肖连欢按照王的办法施之有效时，则对王感恩非凡，认作父亲一般。

王梦玉在指挥肖连欢退却的同时，还在统计局阻挠、破坏反右斗争。右派分子祁开敏，经党组多次研究才勉强定下来；在研究程永和等人的反党言论材料时，王竟庇护说：“算了吧！不要搞左了，一般作思想问题处理好了”；又当农业科对有严重右派言论的梁毅民开展斗争时，王非但不支持，而责令停止斗争，并趁下放干部机会，把梁、程下放了。他不仅对前述人物进行百般包庇，继续使用，且对右派分子祁开敏口口声声称“同志”，当同志们提出意见时，他仍强词夺理说：“叫同志也是右派，不叫同志也是右派”。又当群众揭发统计局反右不彻底时，王又无中生有的说：“右派分子的比数不是5%吗？”企图据以反扑。

3. 为极右分子郭士毅出谋划策，坚决与党对抗到底：

反右后期，极右分子郭士毅的问题日趋明显，计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郭士毅的问题向省人委领导小组写出报告时，王的态度暧昧，不以为然，并为郭士毅出谋划策，积极活动，当郭士毅说：“要开党组会议摆开”时，王即说：“得叫王卓如来主持”。

計委黨組擴大會議期間王夢玉以腰痛為借口不參加會議，逃避鬥爭，而在會外却積極活動，公開的歪曲事實，混淆視聽，把大是大非的問題說成是“徐郭關係”。黨組擴大會議結束後，王夢玉即主動找郭探聽消息，並指點郭士毅反扑，當郭士毅問他對問題如何看法時，他說：“缺點錯誤是有的，主要是對張薌林（右派分子）認識不足吧！別有什麼？還不是平時不滿意他（指徐明同志）抓住這一點整你！”郭士毅在王夢玉的提示下，立即態度囂張，隨聲應合，並說：“我不怕，我和徐明是原則上的分歧……他是有意地搞我。”王為進一步的激發郭士毅又說：“不過你現在就難那樣說了，因為你有錯誤……。”郭很堅定的說：“那不要緊，把問題擺開來，讓大家說嘛！”王說：“會議上有那些意見？”郭說：“有的人當然是說問題嚴重而且是右派；有的人說：錯誤是有的，但不是右派（指曹戎、李弼、孫怡然、成文夫）”。王夢玉了解了會議上的鬥爭情況之後，並於當日寫了一篇日記，說：“××同志（指郭）的問題，看样子日趨嚴重，究竟如何？要看具體事實證明，主觀主義很難作為判斷事實的根據，”以表達其為郭而憂，為郭而憤的心情。俟後王夢玉還在鼓勵郭的亲信孫怡然說：“將來黨組還要開會辯論。”

王夢玉和郭士毅的這些活動之後，郭士毅就把王卓如依為靠山，並積極謀劃政治陷害，打擊左派（王卓如積極宣傳“徐郭關係”也積極尋找徐郭關係的根據），因而王夢玉再次向郭探詢情況時說“你的問題完了嗎？”郭說：“沒有”，王又很焦急的說：“你不是說清波同志對這些問題知道嗎？不知他什麼時候才回來？如果他回來這些問題就好解決了”，郭說：“是啊！……王副省長說要他（于）寫個材料”，王又說：“當時的那些情況你是否和王副省長談了！”郭說：“談過了”，王說：“那他（王卓如）怎麼談的？”郭說：“……他要查對一下材料，以後再說，可能也要找你談”。王、郭的這次談話實際上是在繼續謀劃進攻，同時也摸清了王卓如的意圖，並在王卓如的陰謀活動之

下，把郭士毅的問題長期拖了下來。王、郭認為有了“靠山”又復公開活動起來。

王卓如有意拖延郭士毅問題的解決，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反扑，實現其政治陰謀。但與此同時計委領導小組又查清了郭士毅的若干問題，群眾的揭發材料更進一步的深入。因而王、郭也察覺到問題未完拖下去也有問題，所以他們又進一步謀劃新的鬥爭策略，當王夢玉找郭密談時郭說：“老王！我的問題也不知怎樣了？”“我想向組織上寫個報告，希望能早解決了，……”，王說：“最好能找領導上談談，早些解決了，不然拖下去不好”。並問郭：“王副省長回來了嗎？”郭說：“沒有吧！”王又說：

“趙省長不是回來了嗎？你最好能找他談談，不過你可不要再提和徐明的關係，因為你有錯誤，他又領導整風，你以後應該注意對他的態度，免得他給你火上加油。”郭說：“問題解決了之後再說”，以後王又以約郭吃飯為名，再次的催促郭士毅說：“材料寫好了沒有？”郭說：“寫好了……給你看吧！”王說：

“不看啦！你趕快交上！”，接着說：“你還是趁趙省長在家和他談談好，不然他走了又要拖很長時間”。及至去年四月下旬省人委整風領導小組宣布郭為右派並對王卓如進行重點補課以後，王夢玉的心情十分緊張，雖然徐明、于清波同志一再動員他站起來揭發郭士毅，但王始終掩掩蓋蓋，既不據實交待問題又不揭發新的問題，堅決向党對抗到底。

四、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利用職權污辱女幹部

王夢玉道德敗壞，利用職權，調戲猥褻女幹部達4人之多，特別是王葆珍的關係尤為密切，不惜出賣黨的利益，包庇其丈夫肖連斌，並在生活上對她關懷体贴，長期鬼混在一起。當他們的不正當關係被揭發時，王又幾次的與其訂立攻守同盟，並說：

“不管他們怎麼逼你，你也不要說出這一段，你可千萬不要出賣我呀！”

五、对王梦玉的結論和处理意見

王梦玉蜕化变质，道德败坏，品質極端恶劣。在整風鳴放期間，与右派合唱，攻击党的領導，敌視社会主义建設，並策动肃反对象向党进攻；在反右斗争中，又積極指揮右派退却，破坏反右斗争。特别是与郭士毅扭在一起，不听党的忠告，坚决向党对抗，情节突屬严重。当省人委整風領導小組确定給他补课，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揚言自己的問題简单，說：“一个礼拜就完了。”並在交代中抵賴狡辯，会上承認，会后否定，态度亦屬恶劣。因此，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应将王梦玉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撤消原有职务，由十一級降为十四級。

（已經山东省委批准）

山东省劳动局整風領導小組关于 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侯林翼 处理意見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一）簡 历

侯林翼，男，四十七岁，山东萊西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一九三八年六月入党，同年二月参加工作。历任交际幹事、科长、軍法处长、南海区专员、牙前突驗县长、胶东行署秘書处长、省府办公厅主任等职，一九五五年二月来劳动局任办公室副主任，現任副局长，十二級。

(二) 历史关节与平日表现

侯林翼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敌我不分，经常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来往。土改时，包庇其地主家庭，破坏土改政策，一九四八年三查三整时被斗。镇反时，包庇汉奸反革命分子陈复生。“三反”时因安插地主、国民党员、坏分子崔岳西、代敬义，贪污受贿，喂肥私商，受撤职处分。受处分后更加对党心怀不满，特别对“三反”存有刻骨仇恨，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三反”运动。辱罵楊毅等同志蓄意整他，对他打击报复，把他个人的贪污受贿、丧失立场的严重錯誤說成是人事关系，捏造陷害。侯林翼仇恨三反运动，痛恨省人委，他来劳动局工作后，省人委召开的有关会议他都不参加，叫别人去代替，他說：“我一看到省府大門就生气，神經就馬上起反射作用”。

对肃反問題，侯和叛徒孙学之也一唱一合，否定成績。正当人民代表要检查肃反时，侯在处理肃反善后工作会议上，說：“莫先瀛只有领导的証明，沒有被他领导的材料这是不合法律手續的”。又說：“把肃反問題都拿出来审查审查，看看有沒有問題！卜克明、李功勋的問題，还有莫先瀛的問題都拿出来大家討論討論”。企圖推翻肃反結論。

丑化领导，自我吹嘘，两面三刀，挑拨离間，进行宗派活动，制造党内混乱。隱瞞地主成份，伪造学历，伪造級別、职別，招搖撞騙。

去年三月間，毛主席在珍珠泉做报告后，侯說：“毛主席来了，舒主任在大会上作了很长时间的自我檢討，看到上級来了，光說缺点，表示虛心。舒主任說話真囉嗦！下边都煩了”。又說：“舒主任来了以后山东工作也沒鬧出个什么来，比人家别的省落后”。他借代共华的問題，丑化鄧希光同志說：“代找譚，譚几次不見。新省委不如向明时代，向明时代还可以进省委的大門，还能找到人，現在不能进門了！”他挖苦晁哲甫同志，說：

“晁老是个木头、老糊涂”。经常诽谤省委和省人委秘书长没有一个会办事的，你看修琪也当副秘书长了。把曲上升、杨毅、周光春、谢辉等同志说的一钱不值。来劳动局以后，就经常丑化管、元副局长，造谣诽谤，讽刺挖苦，糟塌的一无是处，进行人身攻击。

侯林翼三反前没有评级，因三反贪污犯错误定为十六级，他却吹原为十级，并造谣说：省委工业部要给他恢复十级，元副局长不同意。侯本是办公室副主任，却硬要人家给他填表为主任。到处吹嘘说：中央要他到监察部幹司长，到卫生部幹司长，到西北工学院当院长，到外交部做外交方面工作，说省人委批他当副秘书长。一九五七年去中央劳动部参加劳动局长会议回来說：

“他们看我是办公室副主任，都对我表示不尊重，及至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后，他们都很惊讶，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特别是我的学生（××省局长）介绍了我的历史以后，开会时有些问题都来和我商量”。又说：“我回来时，有两位大校为我送行，我上了车，他们行了一个军礼，同车的还有几个少校以为我是将军呢！路上他们鸦雀无声”。吹嘘自己在哲学上有新的见解，一夜写了六千字，诸如此类，在此不多列举，他甚至说：“毛主席的夏季形势，他早就看到了，只是身分不同，说了没有用”。因此，群众称侯为山东的李万铭。总之，他是逢人就吹，有机会就吹，不惜洩露党的秘密，甚至捏造胡说八道；他議論这个，議論那个，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拨弄是非，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其目的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党内制造混乱，制造矛盾，企图借此达到他个人目的。

（三）鳴放中主要反动言行

一、整风开始，大鸣大放，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侯林翼也猖狂起来，他竭力为右派分子的反党谬论喝采。說：“章乃器真是个大人物，我們不过是草木之人”；說：“林

全沒有
幾、周
丑化
主行人

也他
副局
任。

到西
當副
說：

會上
是我

題都

我上

將軍

一夜

席的

因

會就

義論

拔

在

時

。

林

希翎这个小女孩子敢在万人大会上講話，一講几小时，不简单，真有两下子，多少教授都駁不倒人家”，並把林希翎美化的像一个自由女神；說：“全国的大鳴大放上海搞的最好，人家的報紙（指文匯報）配合的也好”。同时，他自己也大放其右派謬論，說：“定息不是剝削”，說：“資產階級的生产資料已經交出来，其性質就变了”，並說：“对一切問題，不要打上階級的烙印”。並和社会上右派分子一唱一合說：“党支部是做特务工作的”。

进入反右派斗争时，侯林翼对右派分子则竭力包庇和支持。我局右派分子陈正平一贯胡作非为，散布反党謬論，对抗领导，因此受过几次处分，整風开始就乘机煽風点火，辱罵支部，丑化管、元副局长，办“流动快报”乱放毒箭，而侯林翼对陈正平却大加贊揚，說：“他有独到见解，斗争性强，敢說敢为”。当群众揭發了陈正平的右派反党言行后，侯即極力为陈辯护，說：“陈正平有缺点，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值得研究，对陈正平的問題要慎重”。並对陈暗送秋波，說：“我們几乎为你栽了跟头”。陈已被打成右派很久了，侯还和群众說：“陈正平要转变的好，他是个老党员，老同志，沒有功劳也有苦劳，不一定給他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局右派分子祝杰其右派言行早就表現的很明显，在反右派斗争时管戈同志曾提出了祝杰的問題，但祝是叛徒孙学之的亲信，是他們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員，孙和侯更是百般掩护，孙与祝說：“管戈向省人委反映，要搞你的右派，蓝名述（当时具体負責工业口的整風）要我警惕你”，並說：“有我不要紧，你不要害怕”，而且大罵不絕，侯和辛銳說：“有人想搞祝杰的右派，那还了得！”辛銳就表示对蓝名述同志领导整風不信任。三个人共謀把祝杰保护过去。孙下放之后，祝作贼心虛，找侯說他有些害怕，侯仍說：“你不要害怕，实在不行，你可以打个报告养养病”。侯和祝很熟，又了解祝的历史情况，而他却一直想把祝包庇过去。去年反右派时，省人委办公厅对右派分子李兰斋开展斗争，曾通过侯了解李的情况，侯

已知道李是右派分子，春节时候还去給李拜年，並向李說：“你的問題我早知道了，前些日子有人到我那里了解你的情况，你没有什么，你說話直爽，我当时給你下了保証”。从此以后，李的态度更坏了。侯林翼还和叛徒孙学之、祝杰掩护聖母軍骨幹分子王澤敏。

二、侯林翼对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心怀不滿，特別对三反存有刻骨仇恨，經常散布流言蜚語，进行誣蔑。在大鳴大放期間更为猖狂，百般辱罵楊毅、周光春、曲上升等同志；並說：“有些人就是踏着別人的血跡爬上去的”。並鼓动三反被斗的貪污分子辛銳、祝杰等人为他到处“喊冤”，混淆是非；在小组鳴放会上侯更別有用心的說：“三反时要我交代材料，一次一次的通不过，最后我就編造材料，扣大帽子，把自己臭罵了一頓，結果材料通过了，但是我的思想問題至今沒解决”。借此煽动群众对党不滿，企圖翻案。

侯林翼与叛徒孙学之勾結一起，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否定肃反成績，誣蔑肃反运动，並企圖在劳动局平反。在小组鳴放会上，肃反对象卜克明的爱人仇瑞云攻击肃反运动时，侯当即加以表揚，說：“小仇發言很好，講了真心話，大家应向她學習”。会后並煽动肃反对象姚耀曾，說：“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面，运动也是这样，肃反也不是只有正面的，你要大胆提意見，不論对誰，也不論是原則問題还是具体問題都可提”。同时还極力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呂宗仁摘掉“帽子”，从而博得呂对他的称贊，說：“侯局长的原則性最高”。

侯林翼对省委心怀不滿，和叛徒孙学之一唱一合，攻击省委的幹部政策。去年省四級幹部會議期間，叛徒孙学之和王月村密写大字报攻击省委，侯也参与研究。

三、侯林翼極端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是永远不能滿足的。为了达到他个人慾望，到劳动局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阴谋活动，一来就公开向党伸手要职要級。侯三反撤职，一九五五年

組織上擬調其來勞動局任秘書，侯嫌職小，拒不到職，后經叛徒孫學之講好任辦公室主任才來勞動局，來后由十六級提為十三級，他還不滿，要十二級。到一九五六年提為十二級，仍不滿，恬不知恥地說：“我要求不高，起碼要由上升的級一樣”。關於他的職別，孫和他講的是辦公室主任，但省委批的是副主任，他也大為不滿，鬧情緒，不工作，還罵斥副局長和人事科長張大武搗鬼，並懷恨在心，找岔子報復；后又向孫提出，說中央監察部要他去當司長，為了互相利用，孫又把他從副主任提為副局長。提為副局長后還不滿足，得隲望野心更大了，于是就進一步地陰謀策划搞走管、元副局長（黨組副書記）。侯自來局以后就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大肆宣揚三個局長不團結，並強調管、元副局長鬧分散，而且提出解決的辦法只有調整組織，把管、元調走。他一面在局里幹部中散布這個論調，同時和叛徒孫學之利用收買拉攏，挑撥离間等卑鄙無恥的手段，在幹部中進行宗派活動；並把與他們臭味相投的祝杰、辛銳（均系貪污分子）都提為處長，同他們結成反黨宗派集團，作為反黨活動的核心。除此，還積極的攻擊和改組人事部門和支部，侯與其親信說：“人事和支部這兩個部門是機關的兩個最管用的部門，不能由元副局長照管，要辦公室領導”。

除了這些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外，侯林翼所用的攻擊手段也是極其陰險惡毒的。第一是利用我局技工學校工作上的缺點，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侯造謠說：“技校鄭校長和元有干親，鄭校長是管、元配備的（是經黨組會議決定的），技校問題管、元應負責”。並策划要“通過技工學校問題來解決局的問題”。侯和孫用提兩級薪辦法拉攏王震同志，派到技校任副校長，不久又調連世倫去當科長，要王與連和徐健西（技校秘書，祝杰的愛人）在技校結成一個核心，攻擊校長鄧立夫同志，並對王、徐說：“要放長綫釣大魚，好好的搜集材料”。技校開支有浪費，管戈同志一次曾指示王震，學校大的開支要經局的批准，王回校未作

传达，侯即贊揚王“有水平，有質量，老練可靠”，和祝杰說：

“王比十三級处长並無遜色，讓它（指技校）糟，越糟越好”。但王以后不太積極，因病休養，侯又瞞怨王，說：“你一病就搞的不好啦，失去了時機”，這一攻擊未得逞。

整風大鳴大放，乘右派分子向党進攻之機，又策劃第二個攻擊。集中力量搞卅仲文副局長，一面誣蔑肅反，煽動肅反對象攻擊卅領導肅反有錯誤，另一方面攻擊黨的幹部政策，造謠誣蔑卅對幹部打擊報復，品質惡劣。右派分子祝杰揭發：他和辛銳在鳴放中攻擊管、卅的材料，絕大部分是侯捏造的。同時利用右派分子陳正平大肆活動，非搞掉管、卅不行。黨提出了反擊右派，他們這一攻擊又未得逞。進入反右派階段，侯的野心不死，進一步地下最後毒手，拋開了黨組與孫密謀策劃以“混戰”為名，利用右派分子陳正平亂咬，對左希溫、王寶輝、楊斯來、張大武、蘇安桂、劉欽華等同志發動鬥爭，要把這些人打成右派，進行惡毒的政治陷害。這些同志都是肅反軍幹的積極分子，在局里主持正義的，但被孫、侯所忌恨，視為眼中釘。同時大肆造謠說，這些人都是卅的人，這些人的問題都聯系到卅，企圖把這些人打成右派，然後搞到卅身上。侯向祝杰、王震說：“蓋子快揭開了，很多問題聯系到卅，這一下差不多了，看卅怎麼交代”。對此，管戈同志提出反對，同孫、侯進行鬥爭，侯、孫更惡毒的說：管阻礙反右派鬥爭，侯並和辛說：“管也象個右派”。同時侯授意祝杰、辛銳在群眾中大肆宣傳：“解決局里問題的時機到了，蓋子揭開啦，要大搞一場”。並給祝、辛打氣，在這緊要關頭，可不能退却。但陰謀戰勝不了真理，經省人委整風領導小組制止，這一惡毒陷害又未得逞。侯林翼為了達到個人野心，是不擇任何手段的。這也是他進行反黨陰謀活動，一貫採取的手段。

侯林翼一貫兩面三刀，挑撥離間，製造混亂。侯來勞動局後，就造謠生事，在處長中說：“勞動局環境複雜，不好處”，對劉子陵同志說：“不要太天真”！對王震同志說：“這個年頭

不知誰犧牲誰，誰害了誰，要注意”。又說：“這次整風中央決心很大，要砍掉黨員的零頭，領導幹部要大調換大調整”。說：

“省委也很緊張，从上到下都有些眼，各眼各還”。並散布他處世的哲學，說：“這個年頭就得順乎天，應乎人”。對祝杰挑撥說：“升副局長厲害呀，你要注意，你的性格我了解，不善於處這種環境，提拔你做副處長可不容易呀！”對辛銳說：“為提拔你當處長，孫局長都和管、升吵起來”。對祝杰說：“在提拔你為副處長時，辛銳反對！不知你怎么得罪了他，你要注意”。在辛銳面前又說：“老辛，祝杰說你翹尾巴，你要注意”。對辛銳和辛的愛人龐玉蘭說：“鄒成莒（工資處副處長）很壞，想把龐從工資處擠出來，要小心”。對管、升副局長則到處丑化，進行人身攻擊。總之，他是逢甲說乙，逢乙說甲，製造矛盾，極盡挑撥之能事。過去群眾就稱他“侯小鬼”，品質極端惡劣。

（四）鬥爭中的態度

侯林翼在這次整風補課中，態度很壞，一開始即與其反黨集團成員辛銳訂立攻守同盟。黨組與其談話，要他交代問題時，其態度非常蠻橫，向黨組進行惡意的攻擊與誣蔑。在揭發他的問題過程中，在大肆反黨罪惡鐵的事實面前，他仍百般狡賴，反復無常，耍流氓手段，不老實交代。至今毫無悔改表現，拒絕參加勞動。他在土改复查、三查三整和“三反”等歷次政治運動中也一貫採取這種手法，那時群眾就稱他“琉璃球”。

（五）結論和處理意見

根據以上事實充分證明，侯林翼是一個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其反動地主階級本質根本未變。一貫敵我不分，喪失立場，誣蔑黨的歷次政治運動，攻擊省委；散布反黨謬論，包庇右派；與叛徒孫學之共謀組成右派反黨集團，進行反黨陰謀活動。一貫兩面三刀，挑撥離間，吹噓偽造，政治訛詐，品質極端惡

劣。在整風補課中態度極不老實，毫無悔改之意。侯林翼是一個黨內的極右分子，也是一個壞分子。

我們意見：撤銷侯林翼一切行政職務，開除其黨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已經山東省委批准）

山東省民族事務委員會整風領導小組 關於右派分子花經熬的錯誤事實定案報告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

花經熬，男，三十八歲，安徽省定遠縣人，貧農出身，學生成份，初中文化程度，小時幹過小商販，在本縣國民黨縣府當過勤雜人員，一九四一年三月參加工作，一九四三年七月入黨，曾任會計、商政科長、副處長，現任民委副主任。

花經熬來民委首先計較職務和級別，曾數次叫秘書問省人事局，也親自問統戰部幹部處，來民委工作是什麼職務、屬那一級？統戰部向他說是廳局級才安下心來。三年來的表現：

（1）狂妄自大，獨斷專行，目無組織。如說李主任寫東西不象樣子，重要東西寫不進去。並夸耀自己說從他手里出去的東西，沒有錯的。又如：擅自決定出國朝覲的人員；隨便動支大批公款；整風前很多向上的報告和會議上的發言，很少召集黨組會或辦公會集體研究，僅是與幾個對口味的人商量一下即辦。

（2）處處顯示自己，擴大個人影響。如一九五六年到太安參加阿訇會，會后又以民委名義單獨召開一天會，搞會餐、吃水菓，會后坐着專署小汽車到回民鄉買弄威風。一九五六年到德縣檢查工作，出發前親自掛長途電話通知該縣說明自己是民委副主任要去檢查工作。

个
公

(3) 拉攏宗派，排斥異己。對機關幹部不是平等看待。對情投意合的無話不說，如對楊小儒、陳興起、馬文寶三人認為他們是“頂起來”的好幹部。在各方面，都給予方便和支持。如黨內文件的閱讀，出省參觀，他們在工作生活上提出的要求也多得到滿足。還長在一起散佈流言蜚語，對幹部評頭論足，互相吹捧捧場。對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及對省人委、統戰部看法基本是異口同音。而對不趁心的幹部討厭，不但工作上不給予支持，反而處處排擠、找別扭。如對辦公室主任，花想盡一切辦法將他調出民委。花的作風也很壞，身為民委副主任，竟不顧影響，在自行車上帶着品質很壞的女幹部穆惠敏到山東劇院去。穆要求救濟十元，群眾和福利組評議五元，花却批成十五元。

花經熬的主要罪惡事實是：一貫假借代表民族利益，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篡改和不執行中央的政策指示，攻擊黨與政府，污蔑黨政領導人員，否定社會主義優越性，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挑撥民族關係，分裂民族團結，煽動少數民族反對黨和政府。

一、地方民族主義，表現在：

(1) 強調幹部民族化，反對幹部共產主義化。花是從“只有少數民族幹部才能為少數民族謀利益”的錯誤觀點出發，企圖從省人委、省委統戰部直到有關基層政權和有關部門都配備少數民族的主要領導幹部，在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內建立少數民族的領導系統，分裂黨的統一。如在四級幹部會議期間，就打算要求省人委要有回民副省長。四級幹部會上鳴放：要求省委統戰部提拔回民副部長。攻擊省委說“全省沒有一個回民縣委書記、正縣長。少數民族當七、八年副縣長當不上個正縣長”。還污蔑說“全國人民代表沒安排省民委的人。民委也不能參加民族委員會”。一九五六年六月在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和有關縣市建立民委機構的文件上提出“五千人口以上的縣、市委配備回民副縣、市長。少數民族較多的鄉配備少數民族副鄉長”。一九

五六一五七两年民族工作规划上提出：“省教育厅要建立民族教育处，五千人以上县市配备少数民族教育专职干部。……要在三年内将有条件的‘阿訇’转为国家干部”。还提出：“在合营企业中将回民职工资方安排到领导岗位上”，以便从上到下，从党到政，从机关到企业建立回民领导系统。

（2）制造民族分裂：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共事业中单独建立回民的一套，借以使回民突出，使回民孤立，制造民族间的鸿沟，阻碍民族关系的密切和民族间的自然融洽。如在一九五六一五七两年规划上提出：“建立回民医院、托儿所、养老院、俱乐部、回民中学，民族乡建回民诊所、保健站”。花在一九五七年力争实现他的计划，已在济南回中建立了高中班，在七个县市设立了回民班，要给济南市民委拨三万元建立俱乐部未行通，而大为不满。给济南市街道回民托儿所补助了四百多元，还指示德县要教育回民干部坚持“民族感情”。

（3）不顾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扩大少数民族的困难，强调国家对回民的经济扶持，并歧视排斥汉民，夸大民族间的矛盾。如一九五六年花以个别县的几个回民村与汉民村牲畜农具估有情况对比，推算出全省回民比汉民少的牲畜农具价值二百七十万元，以此数字向省委要求三年补齐。一九五七年国家拨发少数民族生产补助款五十万元，花主张只补助回民，对汉民仅是补助个别户。一九五七年春，我省去青海的回民和当地汉民打了群架，回民有伤亡，马文宝同志调查处理回来，花坚持主张要马文宝同志对汉民打了回民写专题报告，替回民向中央喊“冤”告状。完全站在回民方面，说“金岭镇事件全省回民均已知道，邻省回民也来信支持，甚至来人支援。说回民吃了亏”。

（4）扩大民族差异，强调少数民族特殊。我省回民与汉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本来是没有多大区别，民族关系特别在解放后基本是正常的（地、富、反、坏、右挑弄是非除外）。但花经熬始终认为我省回汉民经济文化有很大距离，民族

关系、民族差異很复杂。如一九五七年冬花在省人委整改座談会上鳴放說：“山东少数民族經濟水平較汉民是低的，未赶上汉民水平……，少数民族成立的合作社或少数民族多的社悬殊很大”。还说：“省人委是否認為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不同，不过是不吃猪肉，其他与汉民无异。其实不只猪肉問題。問題很复杂。”

花在五年民族工作规划中还提出“要百分之八十的高小畢業生升初中，百分之九十的初中畢業生升高中。七年要国家拨發教育补助费一百至一百五十万元”。

二、假借代表少数民族利益，篡改和不执行中央政策指示，反对省委、省人委的领导。污蔑省委、省人委和負責同志“是大汉族主义”，“不重視”民族工作，“不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歧視”少数民族等，並煽动回民反对党和政府，威胁政府幹部。表现在：

(1) 攻击省委是“大汉族主义”，“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風俗習慣，在区划問題上将少数民族“分而治之”。污蔑省委“排斥歧視”少数民族、“不在”少数民族中培养提拔幹部，發展党团员。如一九五七年冬全省四級幹部會議上花鳴放說：“省委發出的指示或全省性的工作规划，提不到民族工作的問題，好像山东“沒有”少数民族。如农业积极分子會議上提出每人养猪一头，会内有十几个回民就向民委提出問題来，說“沒法”响应号召。中央提这一口号时，說少数民族除外，而我省就把这一条刪去了”。又說：“区划、建乡工作，对民族工作未注意（主要是省委組織部），有的把一个回民乡划到两个县里去”。还无中生有地說：“有些幹部上边說什么，他就說什么。曾有一个乡长到一个村里号召群众养猪，結果这是个回民村”。还扩大事实无中生有地說：“在少数民族中的党团發展和幹部培养問題……，不如抗日时期，太安城关几千戶回民才有一个妇女党员。济南市……發展一个半党员。章邱四千多回民没有一个幹部。德县四十

二名民族幹部是解放前的，解放後沒吸收一個；去年提拔了三百六十多個幹部一個民族幹部也沒有……”。

（2）花同樣惡毒的攻擊污蔑省人委。如一九五七年冬在省直整改座談會上說：“省人委對民族工作有一般化領導的情況。還沒有對少數民族特點和需要，在方針政策領導上加以特別注意。回漢雜居地區豬亂跑，引起回漢糾紛”。還說：“省人委對民族工作認識上有問題：（一）省人委是否感到少數民族數目不多了，不會出大問題？領導一般化是否與此有關？人數當然少，但人少容易出亂子，鬧起來往往不小，影響很壞。（二）略。（三）是否認為合作化後問題已經不大了……。（四）有的負責同志總象認為少數民族好鬧事……”。

（3）丑化、攻擊省委書記譚啓龍同志“官僚架子”、“听枕邊言”。丑化楊宣武同志“經不起批評”。一九五七年夏花參加濟南市委召開的研究回中鬧事問題的會，受到市委的批評（批評單搞一套）花也頂了王路賓。開會回來與楊小儒商量：“嚴副市長是譚啓龍同志的愛人（當時處理回中問題並參加會的），別叫譚政委听了嚴的話（濟南對回中看法）。我們爭取主動向省委彙報……”，不幾天花勾結趙篤生向省委常委當面攻擊。楊宣武同志提出國家過多的從經濟上扶持少數民族值得考慮。花不滿即在省人委整改座談會上一再攻擊楊宣武同志說：“在經濟上扶持少數民族問題，可能由於楊副省長對情況不了解，實際上每人（按回民連地、富在內）補助兩塊多錢是超不過漢民的”。回來在機關散佈“整風真了不起，我提了意見，楊副省長臉通紅”。

（4）花經熬對中央政策、指示、決議狂妄地進行篡改和拒絕貫徹執行。（一）一九五六年春中央指示各省市普遍進行一次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花却曲解中央指示，說中央指的邊疆，山東與邊疆不同；而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上佈置重點檢查。（二）關於清真寺的修理，中央的指示（花親自參加的會議）是：政府不干涉，不幫助，不影響生產群眾自籌

自办。但一九五七年花却主张由国家开支五万元資助修理清真寺七十多处（其中應該資助的只有两处）。（三）对阿訇生活補助，中央指示是不能劳动，生活确有困难的进行救济。一九五七年花主张拨出二万元，補助阿訇生活（每人平均四十元），助长了阿訇不劳而获的剝削思想，大大助长了阿訇威風。竟有的阿訇說“政府害了我們不行”。（四）国务院指示建立民族乡的原则是：參照历史情况，民族关系显著，有利民族团結，有利發展生产。花却篡改成：二千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划入不超过回民人口的汉民建立民族乡。

(5) 煽动回民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幹部。如一九五七年六月花經熬煽風点火的反动文章，在回协“通訊”上登出后，德县五間房（回民村）回民看到文章登着“德县边临鎮区供銷社主任說五間房沒个好人”，五間房回民集合起来要去打区供銷社主任（被平息），又如济宁市大乡老王茂臣（右派）看到文章上說：不少地方不尊重回民風俗習慣，菜里常吃出猪肉来。也有的汉民用猪肉和回民开玩笑。王对花說（花正在济宁市处理回民鬧事）：“从你写的文章看叫回回吃猪肉到处都有，不解决真不行”，加上花当时对伊斯兰教上層迁就縱容多，批評教育少。因此發生几十个回族伊斯兰教上層人士向市府請願。

三、反对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扶持鼓励私有制，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發展回族人民合作化道路上的障碍。表現在：

(一) 反对农村回族人民尽快的走合作化道路，並支持阿訇破坏合作化，企圖长期保持回族人民中的資本主义自發势力。如花在一九五七年冬省人委整改座談会上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回族占（全省）少数民族百分之九十七多，多是搞小商贩（按：多兼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乎全部轉到农业上去。但困难很大，“沒有”技术，“沒有”生产資料。有些人就感到社会主义改造“改坏了””。一九五六年阿訇会上花提出处理清真寺土地入社的七条办法，強調社里出租金納报彌和自种，会后

有几个地方的阿訇，从社里抽出比原来土地多的大量土地，仍由社出劳动力义务耕种，大量余粮到黑市高价出卖。

(2) 丑化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如一九五七年四月在省政协会議上發言，和在回协“通訊”上的文章扩大捏造事实說：“德县崇兴白家集两个社，去冬死了八十头牲口。……生活上沒吃沒燒，住破房，沒被子，生病无力治疗，在部分地区也很严重……，白家集、崇兴、管飯堂三个回民村（五百四十九戶）缺粮十九万斤。突出的是……将近半数是无錢購粮的，急需国家救济。……仅崇兴一村調查有二十三戶一百零八人每戶只有一床破被，好几戶七口之家三代伙盖一床烂被。有十二戶住的房屋山墙倒塌，上盖漏雨，下雨刮風需要搬家……，二十三戶二十七人病情种类很多，如果生活稍好加上一般治疗，許多人是可以很快治好的，但是由于生活困难……春节前后已死去四人。……由于上述情况崇兴回民已有三戶小孩送人。要飯卖旧衣旧被、拆房子，卖家具的情形已經發生”。

(三) 利用国家資金扶持鼓励私有制。如一九五七年国家拨出五十万元补助少数民族生产，花在他宗派小集团的維護下积极主张将专款补助了少数民族作为私有。直至一九五八年三月民族工作會議上花仍指示楊小儒召开各专署幹部会，仍按补助私人的原則佈置一九五八年的二十五万元生产补助款（被制止）。

花經熬在攻击省委、省人委和执行政策中的严重錯誤，省委统战部指出数次，花却不理不睬拒絕交代。当机关开展双反斗争时，花不是引火烧身，而是把問題向上推給李敬漁主任，向下推給科长們，自己是清水衙門，赵芳洲部长和曲处长亲来民委帮助检查时，花思想上極为抵触，要无賴不检查。錯誤的認為统战部“画好了匡子讓他套”，不得已时勉强在民委党组会上进行第一次检查，这次实际上不是检查，而是陈述情况和指出下边同志們的缺点說明他自己是正确的，他曾通过赵篤生打击威胁向他积极斗争的同志，妄圖破坏运动混过关去。在全体同志們的揭發批判

下，后段表现还好，经过七八次检查交代，承认了错误。并积极揭发了赵篤生、楊小儒（右派）等人的许多重大问题。自调铁厂劳动很好，愿意悔改。

根据上述错误事实，花已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分子，为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民委付主任职务，由十三级降为十四级，另行分配工作。

（已经山东省委批准）

中共大众日报社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方正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方正，原名許保干，男，三十五岁，山东滋阳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自由职业者，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入伍，同年十一月入党。入伍后历任县委文书、宣传队长、宣传干事，县参议会秘书、县动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太山时报记者、编辑，鲁中报记者、副主编，鲁中南报采通副主编、主编，山东分局政研室研究员，资料组组长、分局办公厅秘书、秘书室副主任等职。一九五四年春来大众日报任副总编。

（一）历史上的主要问题

一九四〇年因犯自由主义，搞宗派小集团的错误，曾被怀疑为托派，留党察看两个月，后问题查清，撤销处分。一九五三年，因欺騙組織，滥用公章介绍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混入国家机关，受党内当众劝告处分。

(二) 主要的錯誤事實

一、几年来一貫攻击和誣蔑党的領導。誣蔑一九五六年召开的省党代表大会沒有發揚民主，党内沒有自由，說“报社对省委不敢大胆講話，县委書記对省委也不敢大胆講話，省委对中央不敢大胆提意見。”誣蔑省委負責同志給予报社的正确批評和指示是“主觀主义”、“无中生有，用大帽子压人”。鳴放期間，更狂妄地攻击省委，說“夏征农同志批評报纸忽視党性，报纸上讀者反映少了；舒同同志批評漫画后，漫画就少了。”提出要省委交权，以要求省委对报纸只管大政方針为借口（事实上省委就是管的大政方針），企圖摆脱省委的領導。誣蔑省委不关心群众疾苦，狂妄提出要省委書記和群众一起排队买菜、买肉。

二、近二年来，利用职务方便，写了“烏龟的格言”、“暮气沉沉的人”、“金大吹”等許多杂文，从各个方面丑化、謾罵党的老幹部。将党的老幹部說成是些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計較名利、貪圖享受、飽食終日、不学无术的人。鳴放期間，更借“左叶事件”向党进攻，誣蔑党的領導幹部不許批評，“只准歌功頌德，焚香称頌，高呼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伏維我皇万岁万岁。”

三、以資產階級的办报綱領反对党报的政治方向。反对报纸作为党指导工作的工具，他說大众日报由于指导工作办得枯燥无味、像“寡妇脸”，主张对报纸进行“革命”，提出“报纸必須从讀者爱好、兴趣出發，不發、少發指示文件”，要报纸“自下而上指导工作”。在右派分子王中面前譟：“誰要在报纸上登文告，就要收广告费”。在其主持报纸工作中，經常对領導机关指定登报的指示进行刁难或拖延。另一方面則帶头鼓励在副刊上發表毒草，热衷于首先篡改副刊的政治方向。

四、是刘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員之一。与刘建共謀反对省委对报纸的領導，共同策划要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如：刘建蓄意

在各報總編輯會議上胁迫省委接受其反動的辦報綱領，方正就根據劉建的意見在会上充當了攻擊省委的先鋒；劉建提出根本改革報紙，方正就連續擬出對報紙進行“革命”的具體方案。

（三）錯誤的根源

方正墮落成為黨內的右派分子，是有其深遠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他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在帝國主義者辦的教會學校中受過教育，反動的家庭與學校培植了他的資產階級的精神面貌。入伍後，他的資產階級的立場、思想沒有徹底改造。相反，堅持“以本來面目見人”（方正的話），和黨的思想、立場處於一種對立狀態，所以，他入黨後不久，就曾一系列的犯錯誤，並曾一度被懷疑為托派。釋放後，他沒有從正面接受教訓，認真改造思想，而是自認為有“骨氣”，他對了，黨錯了，黨對不起他；並散布不滿情緒，仇視領導幹部，仇視黨的公安部門和組織部門。解放戰爭勝利後和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的資產階級思想、立場，就更進一步表現出來。如：與資本家拉拉扯扯，連續介紹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混入國家機關。由於他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立場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發展，他與黨的距離就越遠，以至於誣蔑黨、攻擊黨。從一九五六年七月省黨代大會到去年大鳴大放期間，他更乘國際國內修正主義台風，利用鳴放的時機，與叛徒劉建結成了反黨聯盟，猖狂地進行反黨活動，徹底暴露了右派面目。

（四）本人對錯誤的態度

鬥爭中，態度較老實，對自己錯誤的檢討比較深刻。鬥爭後，有悔改表現。

根據方正的上述錯誤事實，說明他完全墮落為右派分子，為純潔黨的組織，嚴肅黨的紀律，經過省委批准開除共黨籍，撤消原有職務，由十二級降為十九級，另行分配工作。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右派分子王路宾 主要錯誤事实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編者按：王路宾原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書記。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决定，中央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批准，将王路宾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工資待遇降低四級。

根据省委指示，市委在今年六年間召开扩大会議进行整風补课，对反党分子、前市委第一書記王路宾的严重錯誤进行了揭發和批判。王路宾的主要錯誤事实是：

(一) 积极支持和维护向明进行反党活动。在向明时期，王路宾积极维护向明的领导，忠实的执行向明的指示。如在一九五四年向明主持的山东統購統銷工作中死了一些人，公安厅据实向中央公安部写报告，並經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分局委員、副省长李士英同志审閱签發，而王路宾却認為“报告与向明指示不符”硬压住不發。王路宾积极参加向明所發动的錯誤的反分散斗争，排斥打击党的好同志。在平时，王路宾經常为向明吹嘘，說：“向明执行中央的政策路綫是忠实的，以向明为首的領導核心是正常的。”“向明能力强，領導高明。”“是党内的后起之秀”。称向明主持的一九五三年五月分局扩大会議“在山东史上有历史意义，是繼大魯南會議（少奇同志主持）后的又一次胜利，証明山东党已經成熟”等等。对这些問題在清算向明錯誤中，王路宾非但未能認真檢討自己，相反的却对清算向明錯誤不滿，說：“向

明有錯誤，其他人也有錯誤”。對於中央和省委關於清算向明錯誤影響的指示有抵觸，在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公然為向明辯護，攻擊省委“好像成績是反向明得來的，”“不要拿向明當擋箭牌”等。在傳達省黨代大會決議精神時又說：“黨內生活不正常”，“肅清向明錯誤鬥爭原則界限不清。”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省委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上右派分子苗豐羽攻擊省委，“向明時期運動就死人，有片面性，現在社會主義大辯論又死了好多人，同樣存在片面性。”王路賓却喜形於色表示同意。

（二）大搞地方主義，反對中央和省委的正確領導。

1、從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出發，王路賓在一系列的問題上，反對黨的方針路線政策。早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他就是山東反“冒進”逆流的代言人，他曾同右派分子王卓如等在農業增產和合作化問題上攻擊過省委“急躁冒進”。對濟南郊區實現高級農業合作化他不同意，在郊區區委一次幹部會議上強調“初級社也能增產”。在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王路賓同情和支持當時反“冒進”的台風，認為“精神還是好的”，要省委接受下來“本着這個精神再修改工作報告”，甚至还狂妄地說：“根據市的經驗，听听就清醒了”。在傳達省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時，王路賓又強調提出了省委“在農業生產上主要存在著急躁冒進，盲目增定增產計劃給工作造成了不少損失。”“工業生產追求數量以及改造中的缺點，都與省委的指導思想有直接關係”等。從反“冒進”的指導思想出發，王路賓擅自否定了濟南市根據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精神所制定的、並經市黨代大會和人代大會討論通過的全市各項建設事業長遠規劃，說：“過去是頭腦發熱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搶先於省委召開市委擴大會議傳達主席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指示，還說：“省委的會議提前了，我們不得不提前。”在會上對反對社會主義的兩股台風說成是：“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強調“全面分析，正面教育”，“不能用整風的

办法对待”。“存有极端民主也不要过分强调。”这次会议精神在原则上与中央和省委指示完全对立，还自诩为“主题明确”“发扬民主比历次会议都充分。”

当省委在三月份召开县书会议传达中央和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时，王路宾又强调“思想问题在市委二月会议上摆过了”：“经过市委扩大会议这方面的认识已有了基础”，而引导济南出席会议的干部着重讨论增产节约问题。在布置如何传达省委三月县书会议精神时，仍强调“结合三月会议传达二月会议”根本未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对执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上，王路宾片面强调团结，不要思想改造，在讨论提拔干部的会议上说：“党外干部也不比党内差”，在政协会上又说：“党对知识分子也是看他的缺点多，忽视了他们整个的长处。”

王路宾还反对党的群众路线，一九五七年中央和省委指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组织劳动竞赛及在政法工作方面打击刑事犯罪，他力主搞群众运动说：“在企业不能搞群众运动”。“不要用运动解决问题，运动容易带来副作用”。“搞运动经常就没有了，一突击就过火”等等。

2、对抗和拒不执行中央、省委的指示，自己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王路宾很强调“在工作中要全面分析，不要刮台风，不管是上边来的，还是下边来的，要有主见，不要随风倒，要经得起冲击，应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一九五六年中央和省委指示要在企业中清除一长制，贯彻企业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王路宾认为“一长制在济南未正式形成”，布置“不要进行思想批判，以免影响行政干部的积极性。”对济南搬运工人闹事问题的处理，省委指示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处理，王路宾则表现了强烈的压服情绪，并布置在全市职工中“派代表团、写抗议书”，“要在全市人民中成为一种气氛，鄙视这

种行为。”1957年整風开始，中央指示要大鳴大放大字报，而王路宾布置对大鳴大放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制止”，並規定“属于集体决定的問題，以及肃反等方面的問題不鳴放。”整風开始在步驟上，中央和省委指示先搞大型企业，在中等学校先試点，王路宾則布置在大中小企业和中等学校一齐鋪开，發动中学生进行鳴放。对中央“整風生产两不误”的指示，王路宾公然在幹部太会上說：“整風生产两不误是对立的东西，提它有付作用。”在列席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时。譚震林同志指出：“山东有人搞地方主义，企图赶走舒、譚”，舒同同志並要王路宾回山东作传达，王不但当时說：“山东沒有地方主义”，並且回省委也未認真作传达。

王路宾对上級业务部門的許多指示，如粮食定量供应、划区医疗等均拒不执行。还說：“对这些問題要有抗的精神。”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說：“今后主要应服从塊塊，对上級业务部門的意見可以不执行。”

王路宾还在一些重大的組織原則問題上自作主张，与中央、省委相对抗。他在評定工資等級时規定要将济南市领导下的区級划为地、专一級（省委規定为县級）。市委会的选举名額未經請示省委自行主张扩大了十余名。王路宾对市委書記处集体办公很不感兴趣，而要書記处書記、市长及各区区委書記多与他个人单边联系，其目的是为了大权独攬，大搞地方主义，搞独立王国。

3、对正确执行中央方針路綫的省委極力进行攻击、誣蔑，企图搞垮省委赶走省委领导同志。早在清算向明錯誤新省委刚一成立，王路宾就極为反感，說：“新省委对我不了解，平原和华北局的負責人对我了解。”並对秘書說：“我的工作环境很不好”，“我还要斗。”从这种極端的“不滿”出發，王路宾一方面到处散布流言蜚語，对省委进行攻击，誣蔑省委“老是在稳字上作文章”；“省委劲头不足，工作布置太晚”，“書記处和常委的关系有問題”；另一方面王路宾又公然与省委分庭抗礼、比高

低，唱对台戏。他在各种场合下极力宣扬自己，宣传济南如何先进，在省委开会后，回市委他很少系统的传达省委指示，而是把省委的指示当成自己的意见来蒙蔽组织，如省委指示要市委認真进行整風补课，王路宾則对市委传达說：“省委对济南的工作是滿意的，没有什么重大問題，主要是些思想作风問題。”他还常常夸耀自己在省委常委会議上如何敢說，有独立見解等等来抬高自己。对許多重要工作，王路宾都是搶在省委头里向下传达布置，如对省委关于企业领导制度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強調“市的布置和省的布置精神是一致的”，“省的布置没有什么新的內容，不必再专作传达部署了。”一九五七年五月王路宾参加了一次中央召集关于整風反右的重要會議，回来后他先在市委作了传达，而后才向省委作传达汇报。

省委对王路宾的錯誤指出批評后，王路宾更加“不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省委进行攻击。一九五六年省委对济南郊区合作化中的問題提出了正确的批評通报，王路宾念念不忘，在省委开会，多次提出这个問題，說省委的批評是“泼冷水”，是“促退”，“有点三堂会审的样子”。他在省委扩大会議上批評和攻击省委的集体领导“書記处駕于常委之上”，並揚言向省委“放了一炮”。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又攻击省委“缺乏自我批評，會議發揚民主不够充分”，說省委“看成績多了一些”。一九五七年三月在省委召开的县委書記會議上，济南小組發言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省委提出批評后，王路宾却認為是“小題大作”，“方式太紧张”等等，事后又蒙蔽常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議进行假檢討，还說：“省委对我有誤会”，“不知为什么省委老是拿我当反对派”。

王路宾还与右派分子、原副省长王卓如、袁子揚等人一起散布对省委的不滿，制造流言蜚語，对省委进行破坏活动。他們經常在一起議論省委負責同志，挑拨省委負責同志之間的关系。为了不致暴露他們的問題，袁子揚曾几次写信給王路宾說：“有人

“反映你維護向明”，並要王路賓“注意”，王路賓還曾與趙健民同志在一起密談、議論過所謂省委負責同志“不團結”的問題。並極力的迎合與支持趙健民同志的地方主義情緒，在1956年第九次省委擴大會議上強調“省人委要與省委分開”，說：“趙健民同志是省長，不住到省府不能單獨進行工作是不行的”。王路賓還在省四級幹部會議上，袒護和支持反黨分子前惠民地委代理第一書記李峰，說李峰反黨反中央的言論“還是值得考慮的”，要大家對李峰批判“不要太尖銳了”，並與王卓如一起背着省委動員出席會議的幹部選舉李峰、王月村參加大會主席團，違背省委對大會的領導意圖。

（三）散布修正主義觀點，並與右派分子里應外合向党進攻。

王路賓借“思想解放”和“獨立思考”的幌子，到處散布修正主義，為其反黨活動開辟思想陣地。首先是从各方面極力設法歪曲黨的原則，削弱乃至取消黨的領導，他強調“要樹立政府的領導”，“工、青、婦也可以說在政府領導下，作政府的助手”。甚至對民主人士說“黨政是配合關係”，“中共不要以領導自居，中共支部和民主黨派基層組織也是配合關係”，“先黨內後黨外今後要改變”，並在政協會上說黨的“政治報告是形式主義”等等。王路賓對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員會很為贊揚，在討論中央關於調查工人階級問題指示的試點工作中，他主張民主選舉廠長。同時王路賓還極力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在市政協會上說“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階級矛盾已經基本消滅”，並在傳達二中全會精神時說“當前最根本的問題是民主化的問題。”在市委直屬機關黨員大會上說：“反右鬥爭也是人民內部矛盾”，要大家對右派分子在批判上“不能苛人，而只是對其右派言行”，“有右派言論的人，不要消極，也要辯論”並說：“可以循環不已的鬥爭”，“進行反批評，反反批評”，“剝奪了政治權利的人也有言論自由”等等。此外，

王路宾还在政协会議上借動員整風鳴放，对党进行攻击。甚至歪曲說“过去粗風暴雨不仅在党外，党内也很厉害，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風我也被审查过”。他把公私共事和知識分子改造中的問題，說成是“党的領導要負主要責任”，“是由于我們严重脱离群众、清規戒律所致”，“政法部門与群众有沟有壙”，因此他一再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大家一起来拆壙填沟，真正做到“亲密无間”，而对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言論，說成是“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吃了一付清凉剂”，認為这是“監督”的必要性。甚至当历史特务、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吳介夫罵我們“素餐尸位”、並要共产党“清党”时，王路宾也不气憤，反說“批評的很尖銳，要虛心接受批評意見”。

王路宾还在一系列的問題上敌我不分，与極右分子李士釗、竹山、姜子修等人来往密切。李士釗原为省人委参事，在大鳴大放中恶毒向党进攻，把共产党员分为“三八式”与“胜利号”，污蔑積極分子和进步人士是“制造沟和壙的能手”，攻击“肃反运动是杀人不見血”等等。这篇“發言稿”是經過王路宾看过的，王既沒有批判李的錯誤，相反的还为李出主意說“發言可以，但要注意分寸”，直到李士釗被划为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后，王路宾还三次接見与他談話。極右分子竹山在大鳴大放期間找王談話，王不但不拒絕，反而热情相待，在談話中，王从自己在延安整風时受审查的历史，暗示竹山要繼續坚持反动立場。对竹山在三反中的处理問題，則要市人委付市长向竹山道歉。並交待“如果解决不了再来找我”。当竹山把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所写的反动文章“爭鳴一个无人爭鳴的問題——随着社会主义的發展，階級斗争日益尖銳化的錯誤理論在我国的影響”大意告訴了王路宾时，王对这篇恶毒攻击伟大鎮反、三反运动的反动文章沒有回击，反說“可以研究，可以鳴”。極右分子姜子修与王路宾也很密切，在姜被斗争以后，王路宾还三次接見、安慰他，並对姜許願說“以后沒大事作也有小事作”。对历史反革命分子沙延

祥，王路宾曾五次写信給公安局为沙提前恢复公民权和安排职业。

(四) 拉攏宗派，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非組織活动。除上述在省級机关所进行的宗派反党活动外，王路宾在市里还与右派分子、前市委書記处書記张毅等人勾結在一起，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非組織活动。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省党代表大会上，王路宾即与张毅共謀修改了市委原准备的發言材料，全面的向省委进行了攻击，一九五七年省四級幹部會議上，王路宾又組織张毅“等省委負責同志到会后再發言”，結果张毅發言，並帶領济南出席會議的整个小組百般挑剔舒同同志的传达报告，刮起了台風，反对省委貫徹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風の指示。为了制造反党“資本”，王路宾还与右派分子张毅等人到处制造流言蜚語，互相吹捧。王路宾說张毅“年輕有为，有独立見解”，张毅对王路宾更感恩戴德極力吹捧說“王路宾水平高，对問題看的远，我們不行”，“王路宾来济南注意抓先进，工作有生气了”“王路宾口快心直，開門見山，很好接近，和王路宾一起工作心情舒暢，不怕跟着他犯錯誤”等等。

根据以上事实，足以証明王路宾的錯誤不是一般性的錯誤，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繼承了向明大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阴谋实现个人主义野心的反党本質，以其右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对抗党的方針路綫和指示，任意歪曲和修正党的原則，以攻其一点尽量扩大和背后活动的手法，肆意攻击和污蔑省委直至中央，他不仅在党内拉攏宗派，而且發展到同党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行攻击，进行反党活动。因此，王路宾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反党分子，是一个卑鄙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的反党錯誤是十分严重的，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同时，在檢討过程中态度極不老实，在大量事实面前进行抵賴，因此市委意見将王路宾划为右派分子

济南市 員 右 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毅(曾用名张同生)，男，三十八岁，山东寿光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宣传干事、科长、部长、县委书记、分局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济南国棉一厂、机床二厂党委书记、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职。

(一) 张毅在市委工作期间，与王路宾一起搞地方主义，宗派主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极力攻击並企图搞垮省委，实现其政治野心。

1. 张毅早在济南机床二厂工作期间即对抗党的粮食政策，对抗市委领导，說：“市委不懂工业生产”等，發展着地方主义傾向。自調来市委后，很快与王路宾合謀攻击省委。一九五六年六月省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张毅即多方搜集“材料”，並亲自主持过文教座談会，准备向省委攻击。党代会上，与王路宾擅自修改了市委准备的發言材料，有意减少市委的自我批評，夸大省委的缺点，全面地向省委进行了攻击。如对粮食工作，王路宾在原發言材料上加了“省委机械地执行了上級規定的定量标准”，张毅則接着加上了“不听取干部和群众的呼声”等等。同时，张毅还假說“其他市、地委已提了很多意見”借以煽动济南出席會議的同志批評省委。並指示高子岩同志“把發言稿中的自我檢討部分去掉，光提意見就行”。大会發言前，省委统战部陈梅川同志曾就自己的發言稿，向张毅征求意见，事后张毅說：“陈的發言趁早

不要講，不受欢迎；現在受欢迎的只有兩種發言：一是对省委提意見；一是省級各部門的檢討”。回濟南傳達這次會議精神時，張毅又與王路賓同樣歪曲夸大了省委的缺點、錯誤，在幹部中散布对省委的不滿。

2. 一九五七年二月，張毅对王路賓主持召開的否認兩條道路的鬥爭，与省委“比高低”的市委二月會議大加支持、贊揚；接着，在省委三月召開的縣書會議上，与王路賓預謀公然抗拒省委貫徹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击兩股台風的指示，一再強調“台風要与一般思想問題分开”“要正確教育”，“不要唯成分論”。並从农业合作化等方面系統地攻击了舒同同志的報告，極力散布“省委三月會議不如市委二月會議開得好”的觀點，誹謗“舒同同志不民主，主觀主義。”

3. 張毅搞地方主義的綱領与王路賓如出一轍。他經常說：“工作要大膽創造，獨立思考，要全面分析，要穩妥，要敢頂，不管是誰，不管是那一級，有意見即提”，並以抗上為榮。一九五五年肅反開始，中央提出反右傾，張毅則說：“說反右傾都反右傾就沒有有一個敢出來頂一頂”。

4. 在日常工作中，獨搞一套，公然對抗省委和中央。如中等學校學生不參加鳴放的問題，中央和省委一再指示，而張毅却在中等學校會議上提出：“要獨立思考，大膽創造一下”，並作了部署，以致造成一度混亂；而張毅反自詡為“這是貫徹中央鳴放精神的新發展”。再如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頓文藝思想，文藝界進行整風的指示，張毅不叫向下傳達，並部署下面不要學習陸定一和周揚同志关于整頓文藝思想的報告，也不要搞文藝思想問題；相反的却撥款叫呂劇團停演休整，準備外地演出，以擴大他搞地方主義的影響。

5. 張毅搞地方主義、獨立王國的思想也貫徹到基層單位，他去工人醫院及中等學校檢查工作時，公然要下邊对上級業務部門的指示給“頂回去”。这与王路賓的熱衷權威，強調塊塊也是一

致的。

(二) 在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原則問題上，任意修正、歪曲、對抗中央和省委。

1. 一九五五年肅反開始反右傾時，張毅就很不滿，在他主持的工業口肅反中一再強調：“要穩一些，不要搞的象三反那樣，把人家弄出神經病來”。對肅反、申幹及犯錯誤的幹部處理上，張毅也持有“無罪推定論”的觀點，無原則的從輕，甚至不了了之。

2. 反右鬥爭開始後，張毅一再強調“要和風細雨”，“要保護右派過關”，“要接受肅反教訓，防止左的情緒，不要打擊面太寬”，並交待下邊反右鬥爭的單位“不要搞得太緊張了”。中等學校反右鬥爭剛開始，群眾剛剛發動起來，張毅却馬上提出“停止反右，集中轉向整改”，並且以後一直再未部署反右，以致造成文教方面反右鬥爭搞得極不徹底。對學生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張毅也強調“這是認識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要強調階級立場和階級分析”。

3. 極力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張毅常說“合營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已經解決了”，“今後鬥爭不是階級鬥爭了，而是人與自然的鬥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富裕中農已成了基本群眾”，“地主、富農也開始入社了，沒有什麼問題了”等等，極力模糊幹部的鬥爭視線。

4. 宣揚資產階級民主，反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張毅說：“反對領導不一定是落後分子”，“黨組織不要把黨員控制過死。”對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員會等張毅也很感興趣，並為之傳播。在學校作報告時，張毅還曾說：“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甚至還說：“中央關於高、饒反黨聯盟問題，揭發的材料不具體”，實際上是在散布對中央處理高、饒問題不滿。

5. 任意改變共青團的性質和任務。布置“團只搞學校，不要

搞工厂”，“团只搞文体活动，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实际上是补充了王路宾的“工、青、妇在政府的领导下，是政府的助手”的反动论点。

6. 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在一次鸣放会议上，新生京剧团右派分子说：“文化局不管我们，党员不会领导剧团，我们要求自己管”，张毅竟拍案喝彩，说：“对！你们自己管。”对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张毅还在一次戏曲座谈会上说：“你们就是领导，党派干部不是办法，主要加强你们的领导作用”，并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加强对你们这些人的联系”。

7. 对党的各项政策对抗不满。如对农业合作化，说：“我对合作社有点不满意。合作化以后就是减了产，牲畜也死了一些”；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说：“越钱多了越佔便宜！”他对粮食统购统销、肃反等都曾散布过不满的言论。

（三）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与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亲如一家。

1. 省委三月会议上，张毅与王路宾共谋，全面地攻击省委反击两股“台风”，说舒同同志报告“主观”，反对阶级分析，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认为“只扣帽子不能解决问题”，“是执行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一概说成“台风”就容易压住不同的意见”等等。

2. 省委五月会议上，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舒同同志一再动员张毅发言，反击右派捍卫党，张毅一言不发；相反的却积极鼓励和支持济南到会的区委宣传部长恶毒地向党进攻。

3. 大鸣大放开始时，张毅到处煽风点火。在文教系统幹部大会上，动员大家“有苦诉苦”！甚至还曾恶毒地说：“毛主席也可提意见！”

张毅还在几次文教系统座谈会上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扣帽子都存在，问题关键是在于党委”；“我们党团员和群众之间既有墙又有沟，要拆墙填沟”，“三民高人一等，

为什么事都得我們說了算，这一点要改变”。

4. 张毅为了鼓舞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把几个鳴放座談会上的右派言論說成是“批評的誠懇，动机良好”；对学校的右派分子攻击合作化和党的領導的大字报，到处說“

見血，艺术性高”；为了替右派分子开脫，张毅还說：“罵共产党的不一定是右派”，“就是完全同意儲安平的言論，也不打你的右派”。

5. 据會議揭發並已查明，张毅不仅包庇右派分子黃富元（原天桥区委工业部长）、曉蛛（原党校教研室主任）、王秋岩（机器制造学校校长）及叛党自首分子王仲敏（原二厂秘書科长），而且与反革命分子周重光（张的老师）、右派分子曹繼昌（小学教师）等人的关系也是極為密切的，称兄道弟，餽贈礼物，視如亲人。张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淮北工作时，即与地主往来吃喝受贈，关系密切。反革命分子赵温畏罪自杀后张毅說“看今天的情况是死不了的”。右派分子刘建自杀后他也問別人“刘建有沒有怨言”。

（四）与王路宾共謀进行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培植个人势力，企圖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首先张毅参与王路宾的反党活动是完全自覺並有个人野心的。早在张毅被提拔为書記处書記时，对王路宾即感恩戴德，他从卑鄙的资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出發，不仅積極参加了王路宾在济南組織的反党活动，並且充当了王路宾攻击省委的主将。一九五六年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王、张即共謀向党进攻；在省委三月會議上，又共謀“等省委負責同志到会再發言”，对舒同同志报告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当市委批評后，又共謀假檢討作戏給省委看。直到上次常委检查时还互相包庇，圖謀把检查重点轉移到其他常委身上去。未得逞时，又共謀說“检查的差不多了，可以推下去”，企圖蒙混过关。

张毅为了逢迎和效忠王路宾的反党活动，到处散布：“王路

宾大胆、敢幹、工作有朝气，民主作风好”，“我和王路宾一起工作心情舒畅，不怕跟王路宾犯错误”，而王路宾则吹嘘张毅“年轻有为，有独立见解”，有意多予分管组织、宣传及区委全面工作，并且计划要张毅作市长。张毅更肆无忌惮地对各部门宣布：“市委書記处除王路宾和我外，其他同志身体都不好，作为第一書記不宜分工太多，我可以多分一些”，企图破坏市委的集体领导，攫取更大的权力。

张毅还利用前在二厂工作的关系，积极为王路宾推荐了苗丰羽（前市委委员、柴油机厂党委書記）和张鑑修（前二厂厂长）结成以王路宾为首的反党联盟。苗丰羽是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据已查明，苗在省委、市委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上攻击党的言论，都是王路宾授意的。当苗丰羽的反党本质在市三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暴露后，王路宾还說是“認識上有片面性”。张毅更背着市委与张鑑修、苗丰羽等密开小会，並盗用市委名义宣布“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多方为苗开脱。张毅調化肥厂后，又曾与苗丰羽、张鑑修等一起策划干部。在这次检查他們的问题之前，又互相訂立攻守同盟，說“一人错误一人当”“不牵联别人”。张鑑修也是一个一贯攻击党、污蔑党的領袖、包庇坏分子的党内右派分子，但张毅对他却极为器重，曾推荐安排他作市計委主任，甚至作副市长。张鑑修、苗丰羽则吹嘘张毅“英明果断，领导有方”百般向张献媚。

综上所述，我們认为张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极其严重的，他从自己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出发，已发展到抗拒党的领导，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在政治上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在組織上，张毅积极参与王路宾的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充当主将，攻击省委，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成为党的叛徒。

經市委决定，省委常委会批准撤销张毅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工資由11級降到16級，分配到历城蘆盧煤矿任副矿长。

中共济南市委監察委員會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丛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丛林（曾用名苏省三、李志誠、周爱华），男，四十三岁，江苏省沛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三〇年入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历任支部書記、区委書記、政治交通員、总务科长、枣庄矿委組織部长、書記、济南市委幹部科长、山东分局幹部处长、济南柴油机厂总支書記、市委紀律检查委员会副書記、市委書記处書記兼监委書記、济南国棉一厂党委書記。

主要錯誤事实

一、长期对党不滿，拉攏宗派，攻击中央和省委，进行反党活动。丛林从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地位出發，对中央和省委在幹部配置上極力进行攻击，誣蔑党的幹部政策“宗派主义”，到处散布对省委某些部委負責同志的任职不滿。並拉攏过去曾在一起工作的右派分子张宗印，对党进行誣蔑、誹謗，說“山东党内斗争太复杂，誰上台誰正确，捞着就要命”等等，在张宗印被揭露批判后，丛林又要他“不要害怕，要沉住气”，並出主意为这个右派分子設法躲避斗争。丛林还对其他反党分子表示同情和支持。从这种反党立場出發，丛林借参加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机会，对省委和中央負責同志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同情支持当时會議上所刮起的反“冒进”的台風。並夸大省委的缺点錯誤，抓住非正常死亡問題誹謗省委“自我批評不够”，並誣蔑中央負責

同志的正确指示是“挡省委的责任”“为省委开脱”。他极力攻击省委“不民主”，为向明反党集团喊冤招魂。对在支持向明反党活动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在党代大会上落选不满，拒不参加讨论候选人的会议，并与反党分子张毅串通要“向上反映”，破坏省党代表大会的选举。对这次会议的成就，丛林极力否定，他反对代表大会所作的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的正确结论，并在传达大会的精神时歪曲省委的工作报告，进一步向省委进行攻击。

二、在大鸣大放中与右派分子共鸣，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否定党的成绩，攻击党的领导。丛林极力贬低合作化的优越性，说“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没有什么好处，很好的树砍了，地荒了”，“合作社增产报纸上登的是标本就是了”。甚至在动员家属还乡中恶毒地说：“农村没有粮食吃，回家吃麦苗”。丛林还诬蔑和破坏生产大跃进，说“黑天当白天，月亮当太阳”等跃进口号“不是群众中来的，是基层干部搞的”。他还散布说“山东农村发生了强迫命令，正月初一、二就叫群众去打井，出了废品，没有水，不能用”。这都充分证明丛林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百般抗拒和破坏党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对党内民主生活及政治运动，丛林同样歪曲诬蔑，说现在“什么思想见面，连两口子都不能说真心话”，并诬蔑党的干部“越老越老奸巨滑”。特别是对三反，丛林极力否定运动的伟大成绩，诬蔑山东三反运动是“残酷的”，说“工业厅有百分之九十的案件有问题”等等，表现了对党的政治运动的极端仇视。

三、对抗上级指示，工作中犯有一系列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丛林分管党的监察工作，他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出发，片面强调所谓“进行教育”“要多听取反面意见”。在处理案件中他无原则的从宽，甚至对许多应处理的案件不作处理。反之，对许多申诉案件，则不经调查研究，首先肯定其中申诉理由，百般

之辯護，並為犯罪者開脫罪責，以致縱容不少犯罪分子，廢弛了黨的紀律。

四、政治上消極頹廢，思想蛻化變質。叢林背着老資格包袱，向黨鬧地位鬧待遇，得不到滿足時，長期對黨不滿，工作消極，不動腦子，不負責任。並對自己的錯誤拒不改正，忌恨和仇視黨對他的正確批評，完全喪失了革命意志。

通過以上事實，可以明顯的看出，叢林的錯誤不是一般性的錯誤，而是大是大非問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已經完全墮落成為黨內的右派分子，對黨和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他對自己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是十分錯誤的惡劣的，黨和同志們盡了極大的努力來教育、等待他的覺悟，而他卻一直拒絕黨對他的批評教育，不作徹底的檢查交待，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繼續堅持錯誤，沒有悔改的誠意。為了維護黨的紀律，純潔黨的隊伍，市委決定經省委常委會議批准撤銷叢林的一切職務，開除其黨籍，按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第四條規定處理，降五級，分配到市中醫院任副院長。

中共濟南市委監察委員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張成傑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

張成傑，男，現年三十五歲，山東省平原縣人，家庭出身中農，個人成份學生，一九四〇年八月參加工作，一九四一年入黨。歷任區財政助理、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縣委副書記、書記、濟南機床二廠黨委書記。現任市委工業部長、市委委員。

主要錯誤事實

(一) 積極參加王路賓、張毅為首的反黨活動。

1、張成傑早在机床二廠工作時即與張毅、張鑑修等發展着地方主義傾向，以抗上為榮，當時有“二廠大門難進”的反映，他自一九五五年来市委工業部工作後即與王路賓、張毅的反黨地方主義顛隨在一起，一唱一合，向党進攻。一九五六年中央和省委指示在工廠中廢除一長制，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王路賓強調濟南地區一長制未形成，張成傑則說“推行了但推的比較淺，從現在情況來看，一般是集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因而這一指示在濟南未貫徹執行。在一九五七年省委召開的三月會議上，王路賓、張毅抗拒中央和省委關於反擊兩股台風的指示，而張成傑對為工資問題刮台風的苗豐羽、張鑑修採取縱容支持的態度。

2. 背着組織進行非法活動。

(1) 在市第一次黨代會期間，張成傑到張毅宿舍共謀提苗豐羽、張鑑修為市委委員（當時張毅是市委秘書長，未分管大會的組織工作）。

(2) 王路賓、張毅私議要張鑑修任計委主任，張成傑就告訴了張鑑修。張成傑調市委工業部未公布之前，張毅即告訴了張成傑。張毅要任市委秘書長、書記處書記，張成傑也事先告訴了張鑑修。張成傑在部內經常吹噓“王路賓來濟南二年，濟南工作進步很大，王路賓有魄力、有朝氣，對工業部工作很滿意，別的部位不行”。“工業部可頂幹，能幹！工業部，社會工作又會休息”。王路賓說：“王路賓是黨型，張鑑修好。”一九五六年春節時張毅曾舉辦宴會，邀請張毅、王路賓、張鑑修等人拜年、談心。

3、張成傑在市委工業部傳達省第一次黨代會精神時對省委作了攻擊，他說：“這次省黨代會體現了黨的團結，但也有不同

結的因素。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主席提出來我們接受不快，后来进入高級社又缺乏領導。兴修水利投資过大，要求过高。會議准备不好，有些發揚民主不够……”等等。

(二) 对抗省委，欺騙組織；企圖达到个人野心。

1、张成傑在工作中一貫与省委工业部相对抗。如：关于領導制度的貫徹，省委工业部要在汽車制造厂搞試点，而张成傑則在機車修理厂搞点；一九五六年张成傑在济南柴油机厂搞点，省委徐雷健同志任組长，张成傑經常与徐雷健同志唱对台戏；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济南第一机床厂处理二百三十名學員回乡生产，省委工业部指示“这样处理不合适，应立即停下来”，市委也两次指示要停下来，但张成傑不加理睬，直至将學員处理完了，反而欺上瞞下說：“听到指示后立即停下来了”。

2、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张成傑在二厂任党委副書記时，省委派賴可可同志任二厂党委書記，賴可可同志到厂前的三天，张召开幹部會議說：“賴可可原来是分局書記，是犯了錯誤来厂的，他对的要學習，不对的不应向他學習。”在工作中张成傑对賴可可同志是不尊重的，工作不放手，經常刁难。当省委要賴可可同志在厂的表现时，张成傑与张鑑修等共同签名写了一份假材料，把賴可可同志的缺点大加宣染，說“賴可可对反向明的态度不明确”，“給我們的印象是他犯了盲目維護領導的錯誤”，“上了当”，“他对向明及他自己的錯誤未曾提过反党二字……”。

3、张成傑在工业部內对幹部的任用是任人唯亲，排除異己。如对韓紹群等同志是仇視排斥，整編时将他們下放；而对右派分子馬守法、王崇周等人則重用包庇。

(三) 有意識的重用包庇右派分子和坏分子。

1、包庇右派分子苗丰羽。在市三級幹部會議期間，苗丰羽惡毒攻击市委，但他不向常委汇报，当工业組要对苗丰羽展开辯論时，张成傑則假传市委指示說：“市委認為苗没有什么突出問題”。当大会按問題排队将苗划为第一类提交工业組討論时，张

仍提出“苗划一类太重，不合适”，要秘书按二、三类另行整理材料。

2、右派分子王崇周，历史上幹过伪軍，品質不好，张成傑則極为重用，整風开始即吸收为整風領導小組成員，王在鳴放中發表一系列的反党言論，部內要求对王展开辯論，而张成傑則为其辯护說：“王的言論是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在研究定王为右派时，张成傑坚持說王不够右派（已定为右派，按四类处理）。

3、馬守法調工业部后，张成傑極为重用，主张提为巡視員（这时幹部已經停止提拔），並亲自五次跑組織部坚持提馬为巡視員。在馬提拔之前，张成傑曾两次对馬守法說：“市委已批准了，不过有的同志对你有些意見……”。鳴放中馬守法有反党言論，张成傑認為是內部問題，可放在第四阶段解决（現已定为右派分子）。

4、原工业部秘書部守文，有反党言論，整編中下放鐵路大厂工作，在市三級幹部會議期間，张將部調来工业六組任秘書，大会秘書处及組織部都不同意，张成傑說：“不是什么大問題，不要計較小事”，坚持部可以作秘書（現划为右派）。

以上事实說明，张成傑已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其主要錯誤是地方主义、右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在幹部政策上是任人唯亲，喪失立場，包庇右派。經市委常委研究，报省委批准，开除共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迁較低的工作，工資由十二級降为十七級。

中共济南市委監察委員會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段德甫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

段德甫，男，四十六岁，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工人，山东沂南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支部書記、区委書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書記、专区合作分社主任、沂水专署專員、山东造纸厂厂长、市委常委、济南市委委員。

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党的領導，反对实行党委領導下的厂长負責制。党委討論职工代表大会常任制时他說：“婆婆太多，事情难办。”把党的决定厂长执行的問題，說成是“党委是唱花旦的，我是唱黑头的”，並揚言不唱黑头了。党委决定提拔幹部时段未参加，事后征求段的意見，他說我不願作这个傀儡，拒不签名。他在党委会上很少發言，常說您決議吧，決議了我就执行，但会后又表示不滿，說會議开的不好。

2、包庇右派分子，給右派分子出主意想办法。党委决定将崔玉亭划为右派分子，他在党的小組会上說：“市委沒有指示，右派分子是資產階級右派，反右派是在知識分子中，在工厂有无右派？別左了，应慎重，有言論、有行动、有綱領才是右派，崔玉亭是老工人提拔的，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問題，崔是否右派，还是右派情緒。”

党委决定由段德甫主持會議斗争右派分子崔玉亭时，他很不

严肃。第三次斗争崔时，自动退出会场，会后对崔玉亭出主意說：“坦白要实事求是，不通到市委、省委、中央去告，总有真理的地方”。致使右派分子长期顽抗，不低头认罪。

段德甫的错误，主要是由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不要党的领导，对党委进行攻击，以致发展到包庇右派，支持右派向党进攻，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经过揭发批判，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悔改。经市委常委研究，并报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给予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的处分（工资降两级），分配到济南造纸厂任副厂长。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苗丰羽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苗丰羽，男，现年三十二岁，山东威海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四五年入伍，一九四六年入党。历任战士、区委组织干事、指导员、机关总支书记、济南机床二厂总支副书记、柴油机厂党委副书记、书记，济南市委委员，山东省党代表。

主要反党言行

一、苗丰羽是王路宾反党集团的主将，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和王路宾、张毅一唱一合，向党进攻。

（一）一九五七年省三月会议上攻击說：“省委对党内情况分析客观性差，对正面的东西分析不够，反面的东西显得过多，举例中說济南四十个单位闹工资问题，与当前情况不符，批評要

公正合理”。挑剔省委报告对党内思想情况估计客观性差。“……很大进步，很大提高……，講的不具体，下达到基层会产生天下乌鸦一般黑。”又说“从正面的党的事业的发展中看思想问题是需要的，越是分析的客观原则更易搞通思想，說市委2月扩大会议对这方面的分析还是客观的。”

(二) 苗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市党代大会上发言散布修正主义观点說：“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经基本消灭”。“旧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缺乏民主的管理制度，这是企业目前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主要原因，也是发生闹事的主要原因等等”。

(三)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省四级干部会上，放出了一系列的毒箭，說“省委检讨不深刻，如死人的问题检讨不深刻，山东向明在此就死人，当是有片面性，社会主义辩论又死二百多人，大运动小运动就死人，对山东的情况分析不够，存在片面性……。”

二、攻击肃反、镇反、反右等各项工作。

1、对肃反工作他发言說“是搞好了呢？还是搞坏了呢？我不明确，但是从我們几个大厂的情况看，很难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按前后的情况，錯誤是主要的。”并举例說“我厂抓了九个，放了七个……。”他还攻击一九五五年社会镇反，开始工作很粗，政策界限不清，並說九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可捕可不捕的捕了，复查时政法部門大放特放，上下口径不一致，这样把敌人界限混淆了”。苗丰羽对肃反运动是不积极的，身为第一书记却很少过問肃反的情况。

2、在反右斗争中他对右派分子同情姑息。右派分子韓从径恶毒地向党进攻，苗丰羽对这些反党言論，不但不加批驳，反而大加贊揚，說发言很有分寸等，当同志们組織反击时，苗丰羽反說沉不住气，脑子有点發热。在研究确定右派分子时，苗丰羽和王路宾是一致的，他主张“可划可不划的应掌握不划为右”

派”。由于苗丰羽的縱容、支持不少右派分子对苗有好感，如右派分子张用晦說“自苗書記来了党委有了两点論，能多方面吸取意見……”。

苗丰羽的右傾是一貫的，历次运动都是算賬派，他曾不止一次地說“柴油机厂的历次运动都是左的，死了些人，再这样下去就要犯錯誤，要算老賬的話你們就吃不消了。”刑事犯罪分子张执恕，工作有点成績，苗就在大小会上当“典型”例子，汽車司机侯在江的流氓行为苗丰羽明明知道置之不理。

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党的方針政策进行恶毒攻击。

1、攻击粮食政策說“市委領導上群众观念差，群众向我們要粮食吃，不要餓他們的肚子，我們多次向市委反映，但是市委沒有很好的考虑。”

2、攻击农业合作化說“一九五六年春天农田水利打井运动太冒进了，省委有强迫命令作風，打出来的井有百分之八十报废”，又說“农业合作化后，农村活牛不如死牛皮值錢，一个小牛只卖五角錢，一张死牛皮就是几十元”。

3、攻击市委对工业领导和城市建設方針。他說“市委对工业的领导呼呼隆隆的作法，拿个象样的經驗不多，学习外地經驗也不够，不如董高时劲头大、活跃。”說“市委对城市规划以什么为中心不明确，修馬路、盖大楼倒占的不少”。二三四厂和山东化工厂合并后，苗丰羽說“市里逼着二三四厂上吊，又逼死了一个工厂。”

4、对工資政策苗丰羽也进行了攻击。苗对中央这些指示不滿，在市委召开党委書記研究工資問題的會議上說：“讓發表自由思想嗎，不能沒有意見……”。

此外，苗丰羽和王路宾、张毅、张鑑修拉拉扯扯，互相吹捧。苗常說“路宾同志是大学生，但一点知識分子架子也沒有……”“張毅革命早水平高……。”而王路宾、张毅也常說苗丰羽精幹、年青有为。苗丰羽攻击省委时，王路宾說“看問題尖

銳、明确”。

苗丰羽自由主义也非常严重，散布流言蜚語，污蔑党的領袖。

苗丰羽平素一貫狂妄自大，个人突出目中无人，特別当选了市委委員以后更加突出，对上不尊重、不謙遜，对同級瞧不起，不信任，对下級不以平等待人。認為自己了不起，別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正确，对別人总是不滿意，常講：我最苦悶的是集体領導問題（意思是委員不起作用）。

苗丰羽的錯誤是大是大非問題，他在省委召开的會議上，積極向省委进攻，是王路宾反党的主將，他攻击了和王路宾、张毅等人拉拉扯扯进行反党活动，是党內的右派，經市委常委研究決定，省委批准，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工資降四級。

中共济南市委監察委員會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王斌党籍的決定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王斌，男，現年四十八岁，山东省寿光县人，中农出身（其祖父、父亲时系地主），本人成份农民，一九三七年当过土匪，一九三八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公安处审讯幹事、股长、县公安局长、县长，省法院处长等职。現任济南市中級法院院长，济南市委委員。

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党的領導，拒不执行党与上級的指示決議，向党鬧

独立与党分庭抗礼，将法院看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一九五四年市委政法党组决定处十五年以上徒刑的案件，报市委批准，王斌拒不执行，市委发现后进行了批评，仍不执行。市委指示法院依法没收反革命分子牛会卿的医院财产，王斌借口个别与牛同案犯逃亡台湾，为分化瓦解敌人而拒不执行。市委指示对法院干部中的“不告不理”的旧法观点进行批判，王斌强调宪法、法院组织法已公布了，法院侦察不合法，而不执行。王斌不仅反对党的领导，而且也不接受市人委与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与监督。王斌对省法院改判济南市的案件，极为不满，并指示干部“今后省发回的案件不要宣判，我看后再说，不行给他顶回去”。省法院为与王斌统一案件的認識，叫他去省他不肯去，找他不理睬。并对法院的干部说：“不用听他们当当。”说法院与市人委是附属关系，可以自由服从。

2、否定镇反运动的成績，王斌一九五六年参加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时积极散布“镇反工作缺点错误是严重的”，回济南积极向预审处法院搜集错案数字，并說镇反工作的错误“天下乌鸦一般黑，各地错案都不少，中央对自称没有错案的地区都批了”。王斌为了抹煞一九五五年镇反运动的成績，在一九五六年組成的案件检查小组的成员中不让具体参加镇反办案人员参加。而将一些有严重右倾和有历史问题的作为检查组的成员，五人中即有右派分子三人，政治可疑分子一人。王斌并为敌人着想說：“多判一年刑就是三百六十天。”以“重刑轻判，轻刑免判”的办法放掉了一批不应轻判而轻判，不应释放而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王斌在实际工作中貫徹执行了“独立审判”“有利被告論”的旧法观点，极为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开脱或減輕罪責。如市中区法院向王斌彙报贪污犯李景春材料后，王斌主張判三年徒刑，区法院說区委意見判緩刑需要区委決定時，王斌說：“党委有紀律，法院有法律，应依法办事。”历史反革命周

章解放后混入我工厂进行破坏，王斌却以周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将周无罪释解，並指示柴油机厂复职补薪。再如反革命分子李德孚系敌人少校，曾指揮爆炸我司令員許世友同志，因地址弄錯而炸了通訊連，並捕过我民兵、情报員。解放后隱瞞了反革命历史混入我軍。王斌強調李是一等荣軍而无罪释放。王斌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五月这一时期，据已查清重刑輕判，輕刑释放的即达八人。王斌的这种荒謬主张充分証明他完全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場上，不去鎮压敌人懲罰罪犯，保护人民，而是完全相反，保护敌人，寬容罪犯，打击人民。

3、王斌在提拔任用幹部上，敌我不分、認敌为友。市委一九五六年决定市人委副科长級幹部批准权限由各党組决定后，王斌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亲手提拔起来的幹部中，現已查明反革命一人，刑事犯一人，政治嫌疑和其他問題九人，佔新提拔幹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如蔣兆禧（現为右派）任过伪职，王斌提蔣任秘書，市委組織部不同意，叫他作文牍秘書，后拉进党内，整風鳴放蔣發表右派言論以后，王斌还将蔣拉进了整風領導小組。在工資改革中，王斌对这些人均提了級，甚至有的提兩級，当群众提出反对意見时，王斌解釋說，法院知識分子逮的逮了，审查的审了，就剩这几个，應該照顧，市人委也同意等等。

此外，在整風运动中包庇右派。如右派分子蔣兆禧到处煽風点火，大肆放毒，李誠同志向王斌彙報蔣的情况时，王斌說蔣不是右派分子。群众对右派分子李繼成进行揭發批評时，王斌带李到市人代会去作記錄，使李逃避了群众的斗争。

上述材料說明：王斌已是一个徹头徹尾的資產階級在党內的代理人，是党内右派，經過斗争批判，基本上認識了錯誤，作了檢討，並且有悔改表現。經市委研究决定、省委整風領導小組批准，开除党籍，撤銷院长职务，分配到萊蕪鉄厂任車間副主任，工資降五級。

中共荷澤地委會（扩大）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扈国华、杜湘、 王魯光、褚連捷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共山东省荷澤地委扩大會議，徹底揭露了扈国华（地委副書記兼專員）、杜湘（地委常委委員、宣傳部長）王魯光（地委常委委員、財貿部長）、褚連捷（地委委員、宣傳部付部長），申云璞（地委委員、單縣縣委第一書記）等人的右派反党集团。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罪行是極為严重的。从一九五五年省委檢查荷澤地委領導之后，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就逐步形成發展起来，他們的反党不仅有完整的綱領，而且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長期以來，他們陰謀把荷澤地區作為他們的獨立王國，反對中央與省委的方針政策。

根据會議揭發：扈国华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他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力圖篡奪党的領導權，進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動，企圖以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党。他們到處污蔑：“省委把荷澤地區的黑暗面看大了”，“省委歧視荷澤地區”，“荷澤地區的幹部在省里吃不開”，“荷澤地區是晚娘”，他們打着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旗幟，惡毒地攻擊省委派來的荷澤地委第一書記楊發、第二書記秋生兩同志，以此籠絡有地方主義情緒的人和他們一起進行反党活動。遠在一九五五年，省委根據中央指示，在山東全党肅清向明富農路線影響的時候，扈国华就以“荷澤受向明影響不大”為借口，拒絕執行省委的指示，並狂妄地說：“省

委肃清向明影响”的作法“未必英明”。企圖否定肃清向明影响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以掩盖他們的反党罪行。

一九五五年夏，省委为了繼續肃清向明影响，曾派人帮助地委检查，以一九五四年荷澤地区在粮食工作中违背了中央关于“余粮多者多購、余粮少者少購、不余者不購、缺粮者供应”的粮食政策，以及各級幹部在工作中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紀为重点，批評了地委領導上的缺点錯誤。扈国华当时公开承認了錯誤，並表示决心改正。地委检查領導之后，扈国华則背地散布不滿情緒，到处造謠中伤歪曲事实，說：“荷澤地区在粮食工作中所以犯了錯誤是由于省委分配的任务大造成的”，污蔑省委把“荷澤地区看成一团糟”，“以命令主义糾正强迫命令”，“你們（指省委）都是正确的，我們都是烏龟王八蛋”，企圖否定省委关于检查荷澤地委領導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更严重的是暗地里發动与支持在粮食工作中犯过錯誤受到处分的人向中央告状，企圖翻案。

扈国华还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一貫违抗中央、省委的方針政策。一九五五年鎮压反革命的时候，地委根据中央、省委的指示，决定依法逮捕一批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扈国华認為“荷澤地区几次鎮反已处理了不少，沒有那么多反革命了”，“捕人容易，捕錯了放的时候困难，捕一个得罪几个”。杜湘說：“鎮反不徹底，永远也不会徹底，鎮压一批只是少了一批”。扈国华对肃反工作不積極，中央曾指示在清理中層时，有問題的人仍可斗争，但他拒不执行，並私自确定一律免于斗争。据初步查証有五名反革命分子應該处理，在扈的掩护下沒有进行处理。一九五六年省委貫徹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指示时，扈国华借口落后乡的面划的太大了，抗拒执行，說：“这个地区如果落后，过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无法解释”。当改造落后乡的工作展开之后，扈国华則蓄意找岔子，到处寻找“石头”搜集材料，並以个人的名义給省委写报告，污蔑改造落后乡工作搞坏了。在整頓

基層組織的時候，扈國華說：“楊毅同志看的黑暗面太大了，處理的面太寬了”，“要使違法亂紀滅種還得很久時間”。杜湘說：“什麼叫不純，給敵人抗過幾年槍，我們來了又跟我們幹，這叫不叫不純，要純，除非這一代的人死淨了，下一輩才能純”！王魯光則說：“楊毅同志看的黑暗面大，未解決依靠誰的問題”。這實際上是站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立場上替他們辯護，企圖保護他們繼續統治勞動人民。

省委派楊毅同志來荷澤地委任第一書記，狄生同志任付書記後，扈國華即百般刁難，處處製造困難。楊毅同志剛來時，扈國華不理，後來只以二十分鐘的時間介紹了荷澤地區的情況。在工作中不僅不積極支持楊毅同志，反而背後破壞楊毅同志的威信，到處散布“楊毅同志看荷澤地區的黑暗面大了”。並狂妄的說“一個比一個，他不中”。更嚴重的是無中生有的到處污蔑楊毅同志。企圖把楊毅同志排擠出去，篡奪黨的領導權。

扈國華為施展他的反黨陰謀，還運用了剝削階級的那套權術。一貫採用兩面手法，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甚至到處自吹自擂，夸耀個人。更毒辣的是他打着馬列主義的旗子來反對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之後，他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為幌子公開的向黨進攻。扈國華到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時，一面捏造事實向中央監委會控告省委，一面背着省委寫信污蔑地委領導上不民主，惡毒地攻擊楊毅同志，並要地委將他的來信印給地委科長以上幹部閱讀，實際上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企圖以此煽動群眾把楊毅同志趕走。扈國華的反黨集團還經常借喝酒為名，借以拉攏進行反黨。有一次在喝酒期間，扈國華污蔑省委對荷澤的看法是“意識決定存在”，褚連捷則說：“人家說是個碗，就是個碗么”！他們還時常互相包庇相互捧揚，掩護他們的反黨罪行。

這個反黨集團的罪惡活動，省委、地委早就有所察覺，並曾多次對他們進行教育，他們不但不懊悔，反而更變本加厲向

党攻击。在整風中他們又互通情报，互相串連，煽風点火与党内右派分子結合起来繼續恶毒地攻击省委，当他們的反党罪行被揭發之后，扈国华則运用威胁手段阻止鳴放。他还多方設法包庇右派分子，阻碍反右派斗争的順利开展。实际上成了右派分子的后台老板。

杜湘、王魯光、褚連捷，除上面已說到的那些事实之外，會議还揭發了他們的許多罪行。杜湘、王魯光是扈国华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王魯光又是腐化墮落蜕化变質的分子。很多同志在揭發中認為，这个反党集团中扈国华是挂帅的，王魯光是軍师。杜湘不仅是扈国华反党的幹将，而且他所领导的宣传部，实际上变成了向党进攻的一个堡垒。褚連捷不仅是反党集团中的炮手，而且在整風中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

會議着重指出：以扈国华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处心积極地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

我們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力量重新配置的大变动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虽然基本被消灭了，但人們的思想状况还没有轉变过来，资产阶级政治观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在許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着，这就必然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間的尖銳斗争。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特別当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發展，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党内的这种斗争也就激化起来。扈国华的反党活动，正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發展，逐步加紧，逐步嚣张，逐步疯狂起来。由此，也就赤裸裸的暴露了他們的反动面目。

同时，會議指出：扈国华、杜湘、王魯光、褚連捷、申云璞都是極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們都有强烈的个人野心，他們所向往的，孜孜以求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名誉、地位、待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扈国华是个典型的热中权位的野心家，当他爬上领导岗位的时候，个人主义的私心也随之增长起来，把自己

领导的地区看成独立的小天下，认为自己有“功劳”，于是骄傲起来了，企图永远保持自己的荣誉、地位和权力。但是当他个人野心达不到目的时，就由对党不满，发展到仇恨党，与党对立，在党内拉拉扯扯，发展宗派主义活动，最后蜕化变质，走上反党的道路。杜湘、王鲁光积极支持扈国华的反党活动，正是从利己主义出发。正由于他们立场上和思想上的一致，很自然地勾结起来，搞宗派活动，组成反党集团。

会议一致认为：扈国华、杜湘、王鲁光、褚连捷是一伙不堪改造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扈国华是反党集团的首脑，罪孽深重，是党内的极右派分子。杜湘、王鲁光、褚连捷、申云璞是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是党内的极右派。大会一致决议：开除扈国华、杜湘、王鲁光、褚连捷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申云璞在单县忠实执行了扈国华的反党纲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分子，单县党代表大会上已决定开除其党籍）。

会议一致指出：彻底粉碎以扈国华为首的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胜利。为了巩固菏泽地方党组织在中央和省委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应当认真记取的教训是：

必须加强党的团结，提高政治警惕，反对一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我们与扈国华反党集团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机会在我们党内来制造分裂，制造反党的派别活动，因此，我们必须随时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政治嗅觉，反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

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制止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行为。

必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自由主义，坚决地执行中央和省委

的指示和決議。每个党员必須認真學習党的方針、政策，不斷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反对擅自修改党的政策的无組織无紀律的分散主义現象。

必須坚决反对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會議中揭露的事實証明：右派分子都是一些極端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是万惡的根源。因此，要經常以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全体党员，經常警惕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袭，坚定革命意志，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觀，反对鬧地位、鬧名譽、鬧待遇的行为。

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宁主义，學習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高政治理論水平，运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觀察問題，处理問題，从而克服一切資產階級的立場、观点，反对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工作中主觀主义，只見树木，不見森林，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毛病。

我們相信，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全区党员一定能够接受这一事件的深刻教訓，更紧密的團結起来，發揚革命朝气，团结广大人民为促进和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而努力奋斗。

中共安徽省委監察委員會 对于右派分子戴岳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戴岳，男，四十四岁，江苏宿迁县人，地主出身，旧職員成份。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科长、办事处主

任、行署秘書處長、文教處長等職。現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

據揭發證明戴岳有如下反黨事實

（一）安徽省文聯以戴岳為首結成一個反黨集團，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反黨活動。戴岳在“三反”運動中受處分（撤銷工作）後，認為是黨對他的“傷害”，一直懷恨在心；一九五六年省黨代大會未被選為省委委員，認為“個人政治前程從此定局了”，反黨情緒不可遏止，說給他文教部副部長是“掛名”的，把省委看作為“是非之地”。由於他懷着個人野心，對黨不滿，蓄意把文聯造成他的獨立王國，先後籠絡重用十幾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分子（如反革命分子彭拜、殷乘興，叛徒吳文慧、羅秋帆，胡風分子張禹等）作為他的心腹。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安徽日報發表了林洛里同志批評“江淮文學”編輯部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文章，戴即認為是對他的“攻擊”，乘機率領反黨分子王影、錢鋒、羅秋帆等，公開地進行了一系列反黨活動。他造謠煽動說：“安徽日報發表批評‘江淮文學’的文章是省委叫寫的，這是省委存心‘背對背’地搞文聯”。又對他的反黨集團核心分子們說：“黨的文學事業遭到了‘攻擊’，動員‘有党性、有魄力’的站出來”，並說：“有來無往也不好啊！”當即提出三點指示，以‘堅持工作，堅持檢查’為幌子，利用‘反批評’向黨猖狂進攻。他還責備反黨集團分子‘行動遲緩，綱領不明確’，並且為他們作具體分工：錢鋒“包打官司”，王影核對和收集材料，石青利用“江淮文學”發表反黨文章。王影等向中央寫信誣告省委時，戴岳利用黨組書記名義對他們說：“黨組支持你們”。同時，派專人守住電話機打電話，催逼報社發表反黨集團分子寫的“江淮文學”編輯部假檢查和王影的“抗議書”，並揚言“報社不發表就闖到報社大門上去”。他還授意王影、錢鋒、石青打印林洛里的批評文章、編輯部的假檢查、‘抗議書’上送

中央有關部門和散發到鄰省，妄圖和同情（被支部發覺制止）。省委戴岳反黨集團的錯誤，曾專門召開了座談會，會上省委作了正確結論，但戴岳仍然繼續進行反黨活動，還在省委宣傳會議上又指使文聯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妄圖推翻省委結論。

（二）攻擊省委領導。他製造謠言說：“中央給省委來電報，要省委檢查國民黨作風，省委正在晝夜檢查”，“省委違背中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安徽有收無放！”

（三）鳴放期間，煽風點火向黨進攻。他在戲劇界、美術界座談會上公開號召右派“倒苦水”。把原決定參加座談會的人員，隨時更動，減少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致右派分子在會上大放毒箭。當話劇團右派分子進攻猖狂的時候，他暗示話劇團可以用選舉方法，選舉一個非黨副團長。反革命分子曹野（現判五年徒刑），在鳴放期間向戴岳說肅反“冤屈”了他，要告狀，戴岳表示支持，並在其他人的面前說曹野是百分之九十幾的“好人”。

（四）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向右派洩露黨的機密，暗示右派分子退却。省委第一書記曾希望同志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於如何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報告，戴岳聽了報告回到文聯以後，即在有黨內右派分子參加的文聯的黨內會議上作了全部傳達，意圖提示右派分子收兵。

（五）反對農業合作化和“三改”措施。他在下鄉工作時，只喜歡聽壞的，不喜歡聽好的，說：“成績一眼都看盡了”，又捏造說：“都說勞模張會庭是辦社的旗幟，其實他們社里問題最多，人鬧吃、牲口沒料”，“懷遠縣重社群眾打辦社的幹部……”；對抗旱種麥他認為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對雙季稻極為反對，認為“不合算”。

從上述材料說明：戴岳出身於反動剝削階級地主家庭，參加革命後，雖受黨的多年教育，但其資產階級思想未得到改造。由於其生活上腐化墮落曾犯過幾次嚴重錯誤，受到黨內兩次處分，而

他沒有从中吸取教訓，改正錯誤，反而認為黨對他“打擊”，個人野心不能得逞，即長期與黨离心离德，鬧對立，最後走上反黨道路，完全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當其反黨面目被揭露後，他百般狡賴，不作檢查，最後在鐵的事實面前才避重就輕地作了交代。為了純潔黨的組織，經本委研究決定並報省委批准，開除右派分子戴岳的黨籍。撤消其省文聯主席職務，留用察看。生活待遇由十一級降為十六級。

中共安徽师范学院委员会 对于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

方向明，男，現年五十歲，安徽太平縣人，家庭出身佃富農，本人成份職員，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同年六月參加共產黨。從一九五四年起，曾任安徽师范学院院長（黨內曾任過黨委書記、黨委委員）、省人民代表、省政協委員、中共八大代表。方曾於一九二九年參加過國民黨，歷任國民黨縣黨部幹事、縣教育局代理局長、視察員、中學訓導員等職務。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時曾被國民黨逮捕，同年十一月又被日偽逮捕。

方向明雖入黨多年，但始終對黨不忠誠。解放後，屢次拒絕執行黨的決議和指示，挑撥离間，破壞黨的團結。在大鳴大放時，嚴重喪失立場，縱容和支持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在反右派鬥爭中，曾召開數次大小會議，對右派分子方向明進行了鬥爭，根據所揭發並經查對屬實的材料，方向明的主要反黨罪行如下：

一、方向明經常以黨內的“教育家”自居，吹噓自己最懂得知識分子的心理，懂得教學，是“內行”，並以此來反對黨的領

导。他认为党委不能领导教学，主张“教授治学”。在大鸣大放时，他说：“报上已登大专学校党委制不合适，要加会的领导，党委制要考虑。”同时，他积极地改组院务委员会，并把党员干部从院务委员会中排挤出去。甚至公开要求当时担任党委副书记的高峰同志退出院务委员会。方向明非常讨厌别人说党伟大、英明等话，他公然说这是“八股调”。他在审阅科学研究和函授工作计划时，硬要把“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字样删去，公然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等字样，是‘党八股’，应当取消”。方向明一向否认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他担任党委书记职务时经常说：“党支部能做什么，人家对党支部的意见不少，党支部有些代替行政，会得罪知识分子。”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支部书记参加有关系科室主任会议。同时还提出“要在党内布置，要支部书记不要在系科里当领导。”方向明极力反对依靠党的力量进行工作，他不仅很少接近党员干部，而且还害怕党员干部，他公开对人说：“我怕党员干部难缠”，因而他反对向省委请求派党员干部来院工作，但又诬蔑说：“省委宣传部，没派一个好干部给我”。

方向明屡次抗拒省委关于迁校和文理分院的决定。一九五四年省委决定将安徽师范学院迁至合肥，他一方面诬蔑：“省委胡搞”、“异想天开”；一方面为了达到其反对迁校的目的，又故意将合肥建校预算扩大到一千七百亿元（旧币）。一九五六年省委决定文理分院时，方向明表面接受，但回校后立即召开党委会，并在会上说：“他们（省委）不懂，不了解情况，光我一个人说不行，你们也要去提意见。”企图利用党委的组织与省委对抗。不仅如此，方向明还在群众中公开辱骂：“省里无人，省委不懂，省里的人都是低能”。还说：“教育厅算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懂，那一个能搞高等教育，有些事还给我制造麻烦。”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曾对资产阶级教授说：“我们都是山沟里来的，你们是知识分子，说了有用”，“你们大家要说话，要造成舆论”，

企圖鼓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反抗省委的決定。

二、在大鳴大放時，嚴重喪失立場，縱容和支持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當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時，方向明縱容和支持藝術科右派分子鬧事，同意藝術科右派分子提出的關於“藝術科留在安師是省委本位主義”的謬論，方在藝術科學生代表會上煽動說：“你們的意見是合理的，我們支持你們，你們應當多寫稿子，要好好寫，寫出道理來，送到各個報社，特別是安徽日報，以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視，造成社會輿論”。在方向明的幾次煽動和催促之下，藝術科的學生果然寫了“我們的意見”一稿分送到各報社，並寫了“請願書”送到省委。在方向明的支持和煽動下，藝術科的右派分子還寫了“為要求迅速籌組華東藝術師範學院而呼嘯”的呼嘯書，當這份反動的“呼嘯書”在蕪湖新華印刷廠印出時，被市委書記郝家琪同志發覺，當即打電話給我院黨委，不要讓他們發出，並將反動的“呼嘯書”送交我院黨委處理。當時，方向明堅不接受，並說：“這樣會造成被動”，因而這份帶有極大煽動性的反動“呼嘯書”就被散發到全國各高等學校去了。

當省委傳達了中央關於“抓緊時機大鳴大放”的指示以後，黨委分工要方向明主持理科的鳴放座談會，他抗拒執行，故意拖延，後經黨委一再督促，他才被迫召開了一次僅兩小時的座談會應付了一下，還說是“理科不問政治，提不出意見。”當物理系總支副書記要方動員大家對黨的方針政策提意見時，他說：“那怎麼能講，這不是會叫人家說放長綫釣大魚嗎？”結果使理科的牛鬼蛇神沒有徹底的暴露出來。

方向明還極力支持右派向党進攻。化學系右派分子李晨的極其反動的“十六條大綱”貼出後，方向明贊揚說：“很好，你這個不錯，最好能把它寫得更具體一些。”當右派分子王國斌、吳瑯高借口沒有發“請柬”，搗散了鳴放座談會後，方向明則千方百計的安慰右派分子，並曾兩次責令黨委辦公室秘書向右派分子

檢討、道歉。当右派学生要求停课鸣放，方向明不仅鼓动学生贴出“要求停课鸣放”的大字报，同时还拒绝经过党委决定，在院务委员会上通过的鸣放与学习工作两不误的布告上签署院长的名字。他甚至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与在历史上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方向明当时身为党委书记、院长，不但拒绝参加斗争，整日关门睡觉，不闻不问，连电话都不接，而且还千方百计地破坏反右派斗争。他曾经对别人说：“反右派我很忧心，不要把人家说几句话，就当成右派，我院知识分子都是教书的，那里能造反呢？他们（指党委）又在搞什么反右派斗争，将来一定又象肃反那样糟。”同时，他还经常刮阴风，散布一些“斗争过火了”，“斗不好，放下来算了”等冷言冷语，企图使右派逃避斗争。

方向明不仅包庇右派，拒绝参加反右斗争，而且还极力趁机吹嘘自己，打击别人。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方向明则幸灾乐祸地打长途电话向省委报告说：“现在学生闹的很凶，学生对他们（指其他党委）提的意见很多，就是对我个人还好些，没有什么意见。”在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他不仅不检查自己支持纵容右派向党进攻和破坏反右斗争的错误言行，反而恬不知耻地在省委领导面前假报功劳说：“在右派进攻时，只有我挺身而出，×××缩头了。”其实真正缩了头的，支持和纵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正是方向明自己。

三、方向明极力诬蔑农业合作化，否定三改成绩，夸大肃反缺点，反对文字改革。方向明在参加“八大”会议从北京回来后，曾造谣说：“北京城外的农民因灾荒生活很苦，曾拥到城里闹过事，看到东西就抢着吃，以后被搞走了。”还说：“无为一带农民生活很苦，因为三改没有改好。这样下去共产党很危险，三改的作法是值得研究的。”他根本不承认农民生活有了改善。

方向明身为党委书记、又是五人小组组长，不仅不领导伟大

的肃反斗争，反而有意夸大肃反缺点，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要求平反。他说：“肃反扩大化了，一下子集中了一百多人，超过中央所指示的百分数”；“集中学习的方式对知识分子不适合。”在肃反工作取得伟大胜利后，他对一教授说：“肃反搞得过火了，当时我就想不通，不过当时我不敢讲，讲了会不得了。”他甚至公然在理科教师座谈会上说：“毛主席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我院主要是纠正错误平反的问题。”

方向明也反对文字改革。他说：“拉丁化，简直是瞎搞，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容易，日本鬼子改了几十年都没有成功。”甚至还造谣说：“郭沫若也反对文字改革。”不仅如此，方向明还经常散布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言论，当有人看了苏联画报后，羡慕和赞扬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时，方说：“你们太天真了，这是宣传嘛。”又曾说：“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后，苏联威信大大降低了，后来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才挽救了自己。”

四、方向明在政治上一贯右倾，不参加历次的政治运动，坚持资产阶级办学观点，反对作政治思想工作，一向主张办学要“安安静静，不要人为的忙乱。”他说“学校里主要应当是静，一个接着一个（指政治运动）怎么能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在实际上他都没参加。同时他还经常说：“在运动中做积极分子容易，在工作中做积极分子难。”

方向明很不愿意参加党的会议，他对省委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都表示冷淡的态度，有时便借口“有病”，“身体不好”或说“学校很忙”来逃避会议。即是参加了会议，回校后也是很少传达。方向明从不愿意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几年来只参加一次小组会；也不愿看党刊，甚至公然说：“我那有这些时间看那些东西。”

方向明特别欣赏“士为知己者死”的论调。他说：“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对知识分子一味迁就，不讲原则，甚至说：

“这些人搞翻了，他們不幹，你去上課呀！”“学生是人家教出来的，学生会听他們話的，会罢課鬧事的。”同时，方向明一向坚持資產階級办学路綫，反对做思想工作。他認為学校应当強調法制，否認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

五、方向明經常玩弄两面派手法，作風極不正派，經常打击別人，抬高自己，挑拨离間，包庇坏人坏事。他經常吹噓自己是“专家”“內行”，並以“方博士”自居；而对其他的領導幹部則肆意打击、誣蔑。他經常說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都不懂知識分子心里，游击習气太重，脾气太坏；只有“我懂得知識分子的心里，所以他們都听我的話，教師發生了問題，只要我一句話，就可以解決問題。”甚至他还不知羞恥地說：“由于我懂得知識分子心理，教師都同情我，所以右派进攻时，我沒有遭到攻击。”

方向明經常玩弄两面派手法，把自己放在机动的位置上，开会时，不發言，不表态，平日工作又極不負責，經常关門睡覺。当工作做好了，有他的功劳；当工作沒有做好时，他就以第三者的面孔出現，指手划脚，評头品足，說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都是他們（指其他党委）搞的，推卸責任，嫁禍于人。同时，方向明还經常挑拨离間，破坏党委团結。

方向明一向縱容和包庇其爱人刘文（右派分子）为非作歹。在方向明的包庇縱容下，当总务处沒有給刘文配备沙發，刘便破口大罵；刘文在調动工作时，还私带亲信幹部，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方向明对其爱人刘文这些行为，不仅不加批評，反說：“刘文有她自己的群众基础”，“刘文可厉害哩！在皖南区党委工作时，除步新同志外，其他任何人都无可奈何她”。方向明还經常拉攏一批思想落后和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他曾千方百計为反革命分子謝汝鎮（現已判刑，緩期执行）增加工資，曾亲自乘汽車登門拜訪反革命分子陈鵬（現控制使用），並說：“我是代表党来訪問你，来安慰你。”同时还对別人說：

“安师人情实在复杂，我的一些朋友，到我这里很痛苦，鬼鬼祟祟都不敢出門，等到沒有人时，才敢出門”。

此外，方向明在生活上也是極其腐化的。他一貫矫柔做作，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为生活朴素，廉潔奉公的正人君子；而实际上曾盜窃公家大批圖書，用公家的款子給自己买收音机。平日对保姆極端苛刻，甚至一个月換五、六次保姆。更卑鄙的是他經常用公款購買“丙酸睾丸素”，以刺激其性的生活，还經常打嗎啡針。

在斗争中，方向明極不老实。在省委扩大会上，为了挽救他，省委和学校負責同志曾几次找他个别談話，要他檢討交代，但他却一概拒絕，不肯檢討，甚至要党組織派一个人帮助他写檢討；繼則装病、不吃飯，以示抵抗。回校后不仅不老实交代，檢討自己的錯誤，反而进行活动，与党对立，並說：“我活了五十岁，今天才如梦初醒，我心也寒了。”“反党么！現在又不是我一个，大头脑多得很呢！”，还說：“我是无所謂的”，以此来表示他的滿不在乎。同时，他还布置其爱人刘文到其亲信××家中說：“老方回来了，他們搞他，我要告到中央去。”又說：“你們与我們接近較多，講話要留意，要当心！”当省委批准划为右派，对其展开斗争时，起初他拒絕参加，甚至蛮橫的說：“就是你們把我丢到水里去，我也不参加。”；以后勉强参加了，又借口有病拒絕檢討。經批評后，他写了的所謂“交代”，仍拒絕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机，不肯进行思想批判。在核对材料时又百般抵賴。

根据方向明的犯罪事实及其一貫頑固的态度来看，方向明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右派，而且也是一个極右分子。

为此，根据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則，經院党委討論，並报請省委和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由9級降为14級），另行分配工作。